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0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第 十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09,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1001·636 定价 0.92 元

(只限国内发行)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一次尝试

——论伯恩斯坦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经验

问题上同马克思的对立 殷叙彝(1)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工农联盟问题..... 孙 炯(19)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第一国际..... 汤润千(33)

可能派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批判(1881—1882年)..... 辛 庚(51)

盖得从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陈双范(70)

新经济政策时期工农结合的几个问题..... 蔡恺民(86)

关于路标转换派 刘彦章(104)

国外一些著作关于共产国际的评论 夏道源(122)

人 物 传 记

亚·米·柯伦泰 杨彦君(137)

报 刊 介 绍

马克思恩格斯与《平等报》 彭 光(156)

回 忆 录

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张 报(170)

文献和资料

- 《平等报》发刊词 [法]茹尔·盖得著 (178)
彭光译
- 可能主义 [法]保尔·拉法格著 (181)
陈双范译
- 财产公有 [德]卡·沙佩尔著 (187)
赵小军译
- 热月的道路 [俄]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著 (196)
刘彦章译
- 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俄]尼·布哈林著 (203)
郑异凡译
- 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 [俄]列·格·捷依奇著 (235)
宋洪训译

书刊简介

- 《社会史文库》 晓军 (264)
-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汇编》 闻坚 (267)

国外研究机构介绍

- 西德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 袁廷明 (270)
- 关于两个译名的商榷 商鼎 (273)
-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9辑总目录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最早的一次尝试

——论伯恩施坦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
经验问题上同马克思的对立

殷叙彝

—

一八四八年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马克思不仅亲自参加了德国的革命斗争，而且在革命进行中和革命失败以后写了一系列著作，论述德、法等国革命的进程、经验和教训。1895年，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请求，将马克思在1850年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组论述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文章编辑成小册子出版，这就是著名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通常简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①马克思分析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论述了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后果。马克思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革命的策略，指出今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公开搏斗，无产阶级应当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孤立和战胜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虽然恩格斯在他为此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证明，马克思当时对资本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且从那时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传统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有所发展，但是这并不影响此书对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伟大指导作用，它在1895年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各党内部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伯恩斯坦从1896年起陆续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原则进行了攻击，也就必然要涉及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书中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1898年，他写了《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寄给《新时代》杂志。当时考茨基建议他暂缓发表此文，先把《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写出。^①于是他把文章的主要内容收入《前提》第二章的《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一节，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书中阐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都攻击成“布朗基主义”，认为在这些书关于法国的事变的叙述中，“对于实际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高明的分析同已经被布朗基主义者大加精制过的传说混杂在一起”。^②他认为，一八四八年革命以来的历史不仅证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暴露了马

①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80页。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79页。

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缺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①

《前提》中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在发表后立即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判,但实际上,在这以前两三年,伯恩施坦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同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针锋相对的论点,不过由于他采用了对一部关于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历史著作进行评注的方式,不那么引人注目,也由于他正是在这同时发表了《社会主义问题》这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正面的攻击,因此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他时并没有提到这些评注,多年以来,研究伯恩施坦思想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学者也没有加以注意。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法、德、瑞典的一些有关著作才逐渐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瑞士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埃里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的德文译本起初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卡尔·威廉·艾希霍夫翻译的。1895年艾希霍夫去世,伯恩施坦接手把它译完,于1897年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出版。伯恩施坦在德译本中加了不少评注,并且写了一篇后记,题为《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这本书我们迄今还未见到。但是伯恩施坦在1921年把这篇后记的第一节《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失败的?》加上一部分评注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书名是《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我们从这本书可以了解到伯恩施坦在1895年时的观点的基本内容。

伯恩施坦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题为《历史和传说》的序言,肯定埃里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81页。

同时批评它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作者在描绘二月革命的阶级斗争时基本上遵循法国社会革命家的传统叙述，并且认为只要在一些地方加上从马克思著作中吸取来的评论就算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了。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那些评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二月革命的传说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一传说贯串在马克思以后的全部文献中，大大地妨碍了人们对有关斗争的真正历史性质及其政治意义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已日益成为必要的了。”^①因此伯恩施坦感到必须在埃里梯尔的书中那些由于这种传说而容易“引导读者作出错误判断的某些地方”^②加上注释或补充。伯恩施坦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工作彻底粉碎主要从这一传说引伸出来的口号和论据，从而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有益的影响。这篇序言虽然是1921年写的，却为我们分析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年时的思想和评价这一著作在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

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二月街垒战推翻了七月王朝，无产阶级又迫使临时政府宣布实行共和制度并且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普选权，出版和集会自由，缩短工时等等。这样，“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③它提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已经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但是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

①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1921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级斗争充分展开，中间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并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没有具备争得自身解放的条件，它的那些要求只可能是空想、幻想。总之，“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①

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它在共和国成立时被迫向无产阶级作出的那些让步已成为它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为了正式确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它必须摆脱这些让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这只有动用武器才能做到。为此，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使用了许多阴谋、挑拨和挑衅手段，迫使无产阶级在缺乏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因此，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正是由于六月起义的失败，工人阶级才摆脱了一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一些人物（路易·勃朗等）、幻想、观念和方案。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获得了以最公开、最直接的形式进行的可能，这就为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②

马克思对二月共和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历史地位的分析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论述历史事件的光辉范例，对此伯恩斯坦是不得不承认的。他也声称自己的观点是立足于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他却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批评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② 同上，第418页。

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①只不过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伯恩施坦在这里为六月起义的敌人所作的辩护是相当自觉的。

伯恩施坦强调这一情况: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纯粹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甚至象临时政府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混合物至多也只是符合大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却不符合全民族的社会结构”。^②因此,二月政府在当时可能出现的政府组成中是一个“最高点”,比它再激进的政府是绝对不会有的。当然,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甘心承认这样的共和国了,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之间已经没有斗争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乃至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著作也好,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说明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但是在伯恩施坦笔下,这个共和国、这个政府却成了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政府,在其中“政治特权的基座已被摧毁,现在应当不是由三十万凭财产资格的选民,而是由九百万成年法国人,由全体人民,不分财产和生活地位的差别,决定立法的方针和性质了”;^③整个民族和沉睡在其中的全部力量被唤醒了,登上了公共舞台,“要通过自己的活动,通过有力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意向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努力从事使社会获得新生的事业”;^④“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布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目前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恰当地使用已有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时候把已经在原则上确定的事物付诸实现”。^⑤总之,同马克思关于二月共和国的矛盾性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43页。

③④⑤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13页。

的精辟分析相反，伯恩施坦对它采取了无保留的歌颂态度：“1848年2月24日实际上宣告了欧洲民主制的纪元”。^①

临时政府和执委会中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代表之所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保皇派、封建势力、金融资本家，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是反映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由于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宁可与反动势力妥协，甚至不惜血腥镇压无产阶级。但也正是由于镇压了无产阶级，他们就失去了共和制最可靠的支柱，从而使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是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但伯恩施坦只是用法国的经济关系来论证“六月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谈到波拿巴的政变时却把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抛在一边，几乎把事情说成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起来革命，波拿巴政变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败，它被路易·波拿巴扼杀，却不是那么绝对必然的。对于这一失败，特别是对于这一失败实现的方式，一些人的失误和另一些人的老练的阴谋起了巨大的作用。”^② 他使用“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这样模糊的说法，是为了掩饰这场斗争的阶级性。他实际上是认为，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成功地实行政变，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误。他指责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揭露不够客观，带有“战斗的党人”的仇恨和激情，因此需要作一些补充和纠正。在这一借口下，他专门写了《临时政府的窘境》这一节，竭力为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反动措施进行辩护。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13页。

② 同上，第15页。

伯恩施坦认为,人们对四十五生丁附加税“批评得太过分了”,说政府“通过这项税收牺牲农民而讨好资产阶级是极度的夸大”,其实这项税收的本意是针对“财产”的,“凡是在它侵犯了贫苦小农的地方,都是违背税收倡议人的意图和原则的”,^①它只是被地主利用,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已。其次,他认为,制宪议会的选举是十分民主的,选举日正好是复活节,“没有一个工人在投票时受到阻碍。即使各党派在选举斗争中不惜采用任何中伤甚至毁谤手段,但毕竟说不上在选举中施加经济压力”,^②因此由这次选举产生的议会是完全符合法国的社会结构的。对于资产阶级收买别动队的说法他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在六月战斗中区分阵营的标准不是“财产关系”,而是“就业状态”。别动队作为“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物”自然而然会在战斗中反对起义者。^③按照他的这种看法,临时政府处心积虑招募别动队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罪行就根本不能成立了。伯恩施坦的这些论点显然不仅是针对埃里梯尔,而首先是反对马克思的。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伯恩施坦对于代表革命力量的、由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各个俱乐部却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当然,那时还说不上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们就自己的利益提出的要求只能是模糊的,甚至就内容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这毕竟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反映这些要求的俱乐部不管有多大缺点,总的来说是起革命作用的。伯恩施坦却根本否认这一点。他认为甚至布朗基派的中央共和社“也不应称为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④至于其他的社会革命派俱乐部,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26—27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同上,第37页。

④ 同上,第18页。

“那里是愚蠢女神‘以议会方式’实行统治”，^①幼稚、荒唐的演说散发毒气，“它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在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时期就发挥了重大影响——它们使巴黎的舆论恐怖化了”。^②他攻击这些俱乐部是“各个政府成员和政府觊觎者的代理人的练兵场”，^③它们“仅仅在言语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革命的唐·吉珂德精神的培养所”。^④

伯恩施坦认为，当时的营业危机对巩固共和国是不利的，因此，对无产阶级也是不利的。他指责俱乐部“尽一切可能做了恐吓商业界的事，从而使危机无止境地加剧。它们设想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实际上却更加迅速地把它推向反革命的航道”，^⑤“由于危机持续，资产阶级本来已经很激动，俱乐部大人物的煽动演说和煽动文章把他们弄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在愤怒中把一切社会主义者看成一丘之貉。流血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⑥

伯恩施坦还进一步强调，使流血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利益。他以国家工厂为例着重论述了这一观点。他一字不提政府设立国家工厂的原因和目的，却强调由于俱乐部的煽动，营业不振，失业工人不断增多，有些工人在老板不能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时自动离职，进入国家工厂，因此使它们成了“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集合所和罢工工人舒适的避难所”，它们“归根到底只是加剧了它们本应制止的弊端，因此它们的继续存在同样严重地威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⑦相反，“在取消国家工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28 页。

③ 同上，第 28 页。

④⑤ 同上，第 29 页。

⑥ 同上，第 31 页。

⑦ 同上，第 32—33 页。

厂以后，营业大大好转，因此它们对于原先在其中栖身的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多余的了”。^①他认为要继续维持国家工厂，需要实行聚集在这些工厂中的工人的专政，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由于他们的代言人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②这就是说，这次不可避免的失败的主要罪责应由革命派承担。

伯恩施坦对革命派的态度如此，他对路易·勃朗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勃朗领导的卢森堡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虚弱无能的“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它忙于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所起的作用只是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但伯恩施坦却对路易·勃朗赞扬备至。他说：“在我们看来，1848年法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是‘卢森堡宫’即路易·勃朗和他的追随者，而不是布朗基派”。^③他把卢森堡宫同革命俱乐部作了对比，指出前者“力图避免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任何暴力冲突，因为他们明智地认为，根据客观情况，这样的冲突对工人没有好处，而对年青的共和国只能有害”。^④尽管卢森堡宫有教条主义、空谈理论、钻牛角尖等等缺点，但是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完全切实可行的提高工人经济地位的建议，它的空想主义决不比俱乐部的空想主义更大，在俱乐部里人们设想通过袭击不仅能够推翻一个政府，而且立即就能推翻整个社会制度”。^⑤他认为卢森堡宫的代言人阿尔贝·勃朗、孔西得朗等等是“向前看的”，他们和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研究了现实关系，以便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⑥与此相反，俱

①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3页。

③ 同上，第19页。

④ 同上，第20页。

⑤ 同上，第19页。

⑥ 同上，第19—20页。

乐部中的人们却“向后看，从过去吸取灵感”，“力图模仿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①在这里，伯恩施坦的爱憎是十分鲜明的。他虽然也承认：“在巴黎所有的激进派团体中，卢森堡宫的一派恐怕是最愿意进行调停的”，^②但他这样说是为了褒，而不是为了贬。关于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所起的有害作用，从伯恩施坦的论述中是丝毫看不出来的。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当时达到的发展程度，工人阶级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具备取得解放的条件，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巩固这个共和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通过以普选权为主的合法手段逐步争取改良。这实际上就是他不久后提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按照这种理论，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如示威和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行动都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都应当坚决加以反对。

那么武装起义呢？当然更是不必要的，有害的了。马克思认为，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③伯恩施坦却认为，仅仅说这是一次发展到流血搏斗的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它不是一次纯真的阶级斗争。……它是一次由各种刺激协同引起的阶级斗争，这些刺激很大一部分不是以阶级对立为根源的，或者至少不是以六月战斗所表现的而且在历史上也将永远被视为其表现的那种阶级对立为根源的”。^④各俱乐部的激进主义决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它们的政策不能用工人阶级的利益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20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④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4页。

来说明，而应当用“多半根本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大人物的幻想和野心来说明”。^① 政府解散国家工厂的行动在当时的形势下固然只可能起挑战的作用，但也不能把这看成政府单方面的蓄意挑衅，“它是一整套挑衅和反挑衅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其中个人诡计、标新立异的虚荣心、冒险主义的阴谋几乎同真正的阶级对立起同等重大的作用。除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以外，还有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它们互相激荡，使冲突加剧了”。^② 这样，伯恩施坦就把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说成是“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这些集团”和“那些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把阶级利益的矛盾归结为一些党派和人物的政治野心的矛盾。他甚至根本反对把六月搏斗解释成以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搏斗。他否认资产阶级政府有计划地迫使工人进行决战，认为甚至发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的呼声的人^③也未必真正设想一次大屠杀，他们也许考虑到遭到武力抵抗的可能，但不可能预料到规模有多大。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有党派立场的人”在那一革命时期的报道。他说：“法国人由于禀赋了容易激动的、由轻信和不信任的奇特混合构成的天性，不能如实地看待事物。事变、激情和偏见逐步推动一些人做出一些事情，而他们的敌人却认为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行动。世界似乎住满了马基雅弗利们。极不可能的事被信以为真，合情合理的解释被当成迷信而遭到嘲笑。”^④

在伯恩施坦看来，六月起义并不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而是本应竭力避免的不幸。它打乱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因而成了社会的灾难。伯恩施坦实际上已经站到了维护资产阶级统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0页。

② 同上，第3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页。

④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5页。

治秩序的立场上了。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政府眼中,“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①伯恩施坦也是这样。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镇压起义是必要的。承认了这一必要性,对六月起义刽子手卡芬雅克的军事措施就只能从军事角度来判断。何况有许多事实证明,卡芬雅克不是1848年民主派和革命家所说的那种“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的功名欲望而冷酷无情地把千万人的生命当作儿戏的、具有魔鬼心肠的暴徒”。^②也应当摆脱那种感伤剧式的设想,“不要把从街垒发出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英雄行为,把朝街垒打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谋杀罪行”。^③同样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生性就是懦怯的,无产阶级生性就是敢于战斗的”。^④伯恩施坦还引用了一些官方材料和数字,如塞纳省长迪古的报告,力图证明六月战斗牺牲者的人数不如革命派方面所说的那么多。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伯恩施坦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开始,企图宣扬阶级调和,最后却发展到颠倒敌我、为无产阶级的敌人镇压无产阶级的暴行辩护的地步。这恰恰证明,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的,而伯恩施坦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伯恩施坦曾在这一著作里多次直接批评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一方面根据法国经济关系的不发达状态论证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状态,另一方面又把革命的俱乐部看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这是一个矛盾,对于这一矛盾不应当放过不提。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这句话是否正确,要看情况而定,“恰恰在现代社会,它的各种关系十分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1、417页。

②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5页。

③ 同上,第36页。

④ 同上,第37页。

综复杂,各种生产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增加了,很难允许有这样设想的余地,工人在一定时候对于使一切轮子停止转动可能会感兴趣,但永远不会对一切轮子生锈发生兴趣”。^①他指责马克思说:“马克思自己还必须认清那些日子的社会革命家的教条的错误,这一点后来他在英国也确实做到了。”^②所有这些对马克思的批评都说明,伯恩施坦在1895—96年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改良社会主义理论,下面就谈这一问题。

三

伯恩施坦在着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时特别注意一八四八年革命历史的经验,这不是偶然的。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说:“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订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在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并且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③他歪曲解释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是企图把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却没有消除二者的对立,而只是达到一种妥协,因而马克思的理论“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④伯恩施坦声称要消除这种二元论,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彻底的建设性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此除了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批判外,还必须重新评价无产阶级革命的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30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80页。

④ 同上,第81页。

历史经验,修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法国 1848 年革命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对于这次斗争的经验的研究自然会在伯恩施坦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上述 1921 年写的序言中终于明确地说:“对修正主义概念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它力图作为一种彻底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理论上提供论证,并且描绘出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的大概轮廓。就这一方面来说,修正主义是我对 1848 年二月革命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①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伯恩施坦在这一方面的论点进行研究,大大有助于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

伯恩施坦的上述修正主义观点的最主要的根源是他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绝对崇拜思想。伯恩施坦曾经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在 1878—1890 年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曾经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担任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方面起过光辉作用,他自己也因此被迫在国外流亡多年。但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后期,特别是在这一法律行将废除的时候,他就暴露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崇拜。他在激烈抨击德国半封建的反动政治时常常流露出对欧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十分向往的心情。对于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政治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他也抱有极大的幻想。1888 年他移居英国后,通过耳濡目染,对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和议会政治日益发生兴趣,对之赞尝不已,他的改良社会主义思想就逐渐形成了。他固然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认为只有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主义时暴力才是必需的,对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无须运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 9 页。

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因此暴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对有害。他完全忽视了,是否用暴力进行革命,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即使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也不例外。伯恩施坦实际上是认为,只要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一观点是贯穿他对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全部分析的。

伯恩施坦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另一个根源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的要长,无产阶级不能指望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来发动革命和夺取政权,反而应当通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逐步改善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为最后掌握政权和管理经济作好准备。因此他认为扰乱资本主义经济的秩序是对无产阶级不利的。

上述两点思想使伯恩施坦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者,成了一个“秩序党人”。他当然无法正确地认识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本质以及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发生生死搏斗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思想也阻碍他正确地看待在他发表这些评论时德国的政治现实。德国尽管已经废除了非常法,但正是在1895年,政府还曾经力图通过一项以镇压社会民主党为目标的所谓“反颠覆法案”。在这一企图失败后,德皇和政府仍旧多次叫嚷要用武力对付社会民主党。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面前,伯恩施坦也没有认识到战争有可能使社会主义遭到一次重大挫折,更没有想到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进行革命。但是,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宣告了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幻想的破灭。因此,甚至西方有一些同情伯恩施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脱离当

时的政治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这当然只是轻微的谴责,却从另一方面相当有力地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伯恩施坦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分歧,一度转到中派立场,但是他对革命和改良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后,他认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又有了实现的机会。他实际上认为,十一月革命既已宣布了德意志共和国,革命的任务就已完成,今后的问题只是在这一国家内如何逐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了。于是他又一次想到要通过历史的对比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在1921年重印这本书的目的。他在序言中说:“尽管我们今天的德国同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差别,尽管二者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阶级组织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但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进程同德国1918年革命迄今的进程仍旧存在相似之处。”^①事实上,他正是以他在书中对待二月临时政府的态度来对待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及其镇压无产阶级起义、镇压共产党人的行为的。但是,历史又一次教训了他,魏玛共和国并没有带来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创造了条件。伯恩施坦本人恰恰在这以前去世,但是他的一些朋友如考茨基、希法亭都没有逃脱流亡乃至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伯恩施坦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他在一味鼓吹改良道路时忘记了,恰恰是历史上无产阶级的无数次英勇的流血斗争一步一步地为后代争得了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改善自己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条件。没有1848年的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不会有法兰西共和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制造革命,反对盲动,但是在群众的革命起义爆发后也从来是热烈支持和

① 《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第8—9页。

积极引导群众；在革命失败以后则热情歌颂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且科学地总结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宝库正是这样丰富起来的。伯恩斯坦由于背弃马克思主义，就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甚至发展到不惜为镇压革命的屠夫辩护的地步。这就又一次向我们说明，修正主义理论将在实践上带来多大的危害。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 工农联盟问题

孙 炯

一

1848年2月，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奋战，推翻了代表金融寡头利益的七月王朝，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了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虽有工人代表参加，但它实行的政策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准绳。政权掌握在工业资产阶级手中。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统治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上升为首位。马克思在分析二月革命后的形势时指出：“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①第一次决战发生在1848年6月。2月至6月是双方走向决战的酝酿时期，是一个准备阶段。

法国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接受无产阶级提出的某些要求，实行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措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对立起来，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处于孤立地位；与此同时，又在无产阶级当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2页。

制造分裂，以削弱无产阶级本身统一的战斗力量。

二月革命后，法国工人提出了保障劳动权的要求。临时政府迫于工人的强大压力，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便通过法令承认工人享有劳动权。2月26日，临时政府通过了成立国家工厂的法令。失业工人去国家工厂登记，可以在国家工厂领到工作。国家工厂规定，工人做一天工可得工资两法郎，如无工作时，每日可得一法郎的补贴。到4月中旬，国家工厂工人达六万六千人，临时政府平均每日必须为国家工厂支付九万四千五百法郎。临时政府成立国家工厂表面上是为了保证工人的劳动权，实际上企图通过这一措施达到下述三个目的：即企图通过国家工厂控制失业工人；进行歪曲宣传，使人们误以为国家工厂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而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同时又可以用国家需要负担国家工厂中的工人为借口，开征新税。

3月16日，临时政府通过了对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征收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法令。马克思揭露说：“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十亿巨款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①临时政府同时又在农村中开展宣传，说开征新税是为了养活巴黎工人。因此，“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②

为了对付工人，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便通过了组织别动队的法令。它由十五至二十岁的年轻人组成，每营一千人，共二十四个营，二万四千人，其中大多数为流氓无产者。他们身着特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7页。

② 同上，第408页。

制服，每日领军饷一点五法郎，享受着特殊待遇。临时政府成立别动队是为了“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①以此对付巴黎工人。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识破资产阶级的这个诡计，而“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②

在2月至6月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改变了它在二月革命时的立场，逐渐向资产阶级靠拢，破坏了它在二月革命中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结成的同盟。结果对无产阶级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无产阶级逐渐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利于它自身阶级觉悟的提高；另一方面，巴黎工人失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使它在与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完全处于孤立境地，不利于争取斗争的胜利。

从无产阶级本身来说，它提出的组织劳动、保证劳动权的社会要求没有得到解决。政治上，4月份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也使它大失所望。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获得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一些著名的工人领袖如布朗基、德萨米、卡贝等人皆落选了。制宪议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替了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中没有工人代表。2月至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无产阶级对临时政府、制宪议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的资产阶级本质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促进了它的思想觉悟的急速提高。加之资产阶级又步步紧逼。6月22日，政府公布解散国家工厂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国家工厂的单身工人必须立即参军，其余工人派往索伦省做工。索伦是一个沼泽地区，流行疟疾。工人们气愤异常，表示“宁愿在巴黎被子弹打死，也不愿去索伦生疟疾病死”。6月23日，巴黎工人毅然决然举行了起义。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

六月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资产阶级给卡芬雅克将军委以独裁权力，残酷镇压了起义。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他写道：“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②马克思总结六月起义得出的历史教训是，“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③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地指出，六月失败不是毫无意义的，无产阶级的失败“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④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为达此目的，工人阶级光凭自己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寻求同盟者。

二

从十八世纪初起，农业中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农业经营方式的变更、资本主义改造进程的加剧，农民开始分化。到1848年统一的传统农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610页。

③ 同上，第403页。

④ 同上，第417页。

已经消失，他们分成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各个农民阶层。

共和国成立之后，富裕农民对共和国持观望态度，他们对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十分欢迎。七月王朝时，小农对农村公社土地享有的集体权益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侵犯。大土地所有者的所作所为得到当政者的支持。小农憎恨七月王朝，因而对新成立的共和国寄予无限希望。农业工人兴高彩烈、欢欣鼓舞迎接共和国的诞生，热烈响应巴黎工人提出的组织劳动的要求。他们也积极组织起来，不经农场主的同意，甚至不顾他们的反对，擅自耕种农场土地。1848年5月，在埃罗省的吕内尔区许多农业工人不管农场主雇佣与否，自动到农场主的地里劳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便要求主人付给两法郎五十生丁工资，比原先的日工资增加五十生丁。^①

临时政府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可供选择。一种是不损害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采取征收累进所得税、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要求原流亡贵族偿还在复辟王朝时期获得的十亿法郎，向最富有的资本家强行借款措施。这些措施对资产阶级不利，临时政府当然不愿采取。它实行了另一种办法，即对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四十五生丁税虽是向全体所有者征收的赋税，但对小农说来，负担更为沉重。实质是让农民为资产阶级做出牺牲。临时政府对征收四十五生丁税的后果早有所料，临时政府成员杜蓬·德累尔曾预言，四十五生丁税将使农民憎恨共和国。^② 临时政府之所以敢于作出如此抉择，是因为它早已作好打算，把征收四十五生丁税的罪责转嫁到

① 阿·索布尔《1789年和1848年革命中的农民问题》1976年巴黎法文版第321页。

② 热拉尔·瓦尔特《法国农民史》1963年巴黎法文版第414页。

巴黎工人身上，通过这一措施离间工农。

四十五生丁税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使原来对共和国抱不同态度的贫农和富裕农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共和国，反对这个收税的共和国；二是造成了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四十五生丁税使农民状况更趋恶化，农民视之为洪水猛兽。马克思认为：“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①农民群起而攻之，抗税运动遍及西南、东南和中部等小农业区。农民抗拒四十五生丁税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向制宪议会递交请愿书，恳请政府免除。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常达数千人。在科雷兹省流传的请愿书提出，要原流亡者偿还十亿法郎以顶替四十五生丁税，并在三年内对小有产者减收百分之五十的直接税。农民提出的这个要求的实质就是把临时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重负转嫁到原贵族身上。

农民除向议会和政府通过合法途径反对四十五生丁税之外，还加强内部的统一行动。克勒兹省盖雷附近的达安区的一些民主协会的会员咒骂缴纳四十五生丁税者是“叛徒”。有些农民在一块小牌上写着：告纳税人：谁敢于第一个站出来缴纳强征的赋税，就请他上绞架。在下夏朗德张贴的“告民众书”中写道：“你们已经接到了缴纳四十五生丁税的通知。谁纳税就会大祸临头。你们自信已经种植了自由树，但对于敢缴纳四十五生丁税的人来说，它将是绞架。”^②

有些地区农民抗拒四十五生丁税的运动达到了武装冲突的程度。1848年6月初，在克勒兹省盖雷附近的达安区发生的事件最为典型，它同时还生动地说明了由四十五生丁税而造成的工农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

② 热拉尔·瓦尔特《法国农民史》第413页。

间的对立。事件的经过是这样：当税吏到达安区的达让村去收税时，农民们高声喊道：“人们没有权利向我们要钱，不会再有国王了，打倒政府！”。宪兵队夜间进入该村，逮捕了领头人。次日晨，农民们集合起来准备去盖雷，要求释放逮捕人，并向政府表示抗税到底的决心。邻村的农民配合达让村农民的行动也武装起来向省城进发。当省长获悉这个消息后，下令集合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工人们不愿从命。省长向他们解释道：农民不愿缴纳的是四十五生丁税，政府正需要用这笔税款来举办国家工厂和支付国家工厂里工人的薪金，抗拒纳税的只是一些富裕的纳税人，并非全体农民。工人们信以为真。他们集合起来，迎击前来省城的农民。农民和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结果死十二人，伤约三十人。克勒兹法院审理这一事件，判处四人一至四个月的监禁。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在资产阶级政府的挑拨下，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裂痕加深了。

三

1848年12月选举共和国总统时，农民们手举旗子，奏着乐曲，欢欣鼓舞地走向票箱，给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不仅是在法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

法国农民为何如此热忱地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马克思对这种令人惊讶的现象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法国小农的特点是，从一个方面说来，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来，他们又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说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阶级，是因为每个农户都有一小块土地，各自在这块地盘上进行生产，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基

本相同,这种共同性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①但正因为他们是各自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进行耕作,“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关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②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③

因此,农民们必须在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中选择能够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

当时法国存在的政治派别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波旁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1848年二月革命后至12月总统选举前,法国实际的政治权力操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手中。他们实行的政策表明,他们不仅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而且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尤其是四十五生丁税更激起农民的憎恨,农民视他们为仇敌。波旁派意味着正统王朝的复辟。1848年4月27日,在洛特—加龙的图尔农一名叫博纳富的正统主义者公开宣称:“不久,将要恢复什一税和地租”。^④农民现有的一小块土地是十八世纪末大革命摧毁封建制度获取的,他们惧怕的正是正统王朝。他们绝不会选择波旁派的人物作自己的代表。奥尔良派在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在他们统治时期,尤其是1840—1848年,小农的状况迅速恶化。小农们依靠一小块土地难以维持温饱,常利用农村公社的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④ 阿·索布尔《1789年和1848年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第317页。

公有土地以补不足。小农们曾希望平分公地。政府于1836年研究此问题时，主张出租公地，使富裕农民受惠。到1851年，从一百九十六个村社中，有一百二十二个村社将公有土地出租了。农民们十分了解，奥尔良派不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合适的代表人选。剩下的就是波拿巴派了。拿破仑这个名字对于法国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马克思指出：“拿破仑是充分体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①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十分了解其伯父在农民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总统竞选中，他把自己和拿破仑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大肆宣传。农民们充分利用第一次获得的普选权，把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选上总统的宝座。

农民拥护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另一原因是农民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848年秋冬，农民状况的恶化不是由于歉收，主要是由于生产过剩，价格下跌，缺乏销路。1847年一百公升小麦平均价格为二十九法郎四十六生丁，1848年只值十六法郎二十七生丁。1847年一百公升的葡萄酒值四十法郎八十五生丁，而1848年只值二十八法郎四十五生丁。^② 个别地区葡萄酒猛跌到令人吃惊的地步。1848年9—10月间恩格斯在法国作徒步旅行。他在勃艮第的奥克萨里看到当地葡萄空前大丰收，质量又好。许多人来到此地，只须花两法郎就能够购买一百四十公升一桶的1847年的剩余葡萄酒。^③ 与此同时，赋税增加很多。丰收带来的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农民们将此归咎于二月革命后成立的共和国。当时法国农民怀有两种感情：一种是受资产阶级的挑唆对巴黎尤其是对巴黎工人的仇恨，一种是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热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9页。

② 阿·索布尔《1789年—1848年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第3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7—568页。

这两种感情同等强烈。他们认为能解救他们的唯一人物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当总统四年后，加冕称帝了。

实际上，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能代表农民的真正利益。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①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政后，遵循着一条既定的方针，即遵照所谓的“拿破仑观念”行事。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竭力维护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保存“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就是老拿破仑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利用他们从十八世纪末革命中得到的小块土地，并满足其私有欲。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能够补充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这种所有制是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在十九世纪初是保证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②到十九世纪中期，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农民受尽奴役，“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已成为农民贫困的原因。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竭尽全力维持这种所有制，从根本上违背了小农的真正利益。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随之便产生了一大批富贵荣华的官僚。政府机构的一切费用和官僚的优厚俸禄都出自繁重的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人是小农。拿破仑一世时虽也强征赋税，但他借助于新开辟的市场和对大陆的掠夺，偿还了他强征的赋税。马克思指出，拿破仑一世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到拿破仑三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② 同上，第695页。

时，“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①

1849年5月16日，制宪议会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曾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1849年12月10日，即波拿巴任总统一周年纪念日，立法议会又宣布恢复葡萄酒税。人民对葡萄酒税恨之入骨，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试验政府的倾向。得到农民支持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非但没有减轻赋税，反而加重了。恢复葡萄酒税使波拿巴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农民开始转向社会主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三个“拿破仑观念”是教士的统治。在拿破仑一世时，小块土地刚刚出现，它和社会还相协调，它既对自然力处于依赖地位，对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它相信宗教、教士作为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也接受教士的统治。到拿破仑三世时，小土地所有者经不起资本主义向农村侵入，负债累累。高利贷剥削十分严重，小农受现实生活所迫而成为反宗教的了。拿破仑三世仍要加强教士统治必然会遭到小农的反对。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坚持的第四个“拿破仑观念”就是军队必须占压倒优势。拿破仑一世时，军队主要由刚获得土地的小农组成，军队是小农的光荣。他们英勇奋战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小块土地免遭本国逃亡贵族和外国封建势力的侵犯，是为了捍卫民族统一和保卫祖国，在他们的想象中，祖国就是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而到拿破仑三世时，已是时过境迁。军队的组成已经完全变了，军队大都是招募来的新兵，它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②农民现在面临的危险不是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② 同上，第698页。

敌的入侵和逃亡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是本国的法警和税吏,加强军队只会加重小农的负担,与小农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小农支持拿破仑三世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四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法国农民支持他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其原因除了前面已经讲到的沉重的赋税之外,高利贷和抵押债务的压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农民纳税需要现金,而物价下跌,工商业危机对农产品需求减少,销路停滞,农民无法以农产品换取现金,被迫借贷。法国信贷机构只贷款给大土地所有者,利率百分之五,拒绝向小农提供贷款。小农向高利贷者借钱,利率百分之十五。马克思指出:“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①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②农民受到的沉重剥削和压榨促进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醒悟。1849—1850年在小农业区的小农当中,先进的共和主义思想传播起来了。四十五生丁税、葡萄酒税以及使对农民阶级有影响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的教师法,使农村公社的市长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的市长法案,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的教育法等等使“革命在每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6页。

② 同上,第473页。

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① 1850年10月在埃罗省的圣德雷泽里流传的传单上写着：“资产者、高利贷者、各种色彩的君主派，你们的统治应该结束”。^② 农民的思想发展简要概括为：赋税和高利贷的重压使农民开始觉醒，政府为对付农民的这种觉醒而加强镇压措施，其结果是加强了农民的革命化。

但是，农民要摆脱赋税的重压和高利贷的盘剥不是依靠推翻单个的统治者和高利贷者所能奏效的。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是，高利贷者代替了先前的封建领主，抵押制代替了先前的封建义务，资产阶级的资本代替了先前的贵族地产。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农民的利益还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和资本相协调，那么到十九世纪中叶，他们之间就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农民现在面对的敌人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农民和工人便具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利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③ 所以只有资本的瓦解，农民才能求得解放。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指农民。——本文作者）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④ 所以“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⑤

从无产阶级方面来看，根据六月起义的教训，光凭无产阶级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5页。

② 阿·索布尔《1789—1848年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第3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④ 同上，第487页。

⑤ 同上，第697页。

枪匹马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难以实现的。马克思在1852年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精辟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农民起义的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的教训，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光辉结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和第一国际

汤 润 千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国际及其总委员会反对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时期，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成了为在德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培养干部的中心。本文拟就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与第一国际的相互关系，略加论述。

一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由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等人建立的，不久成为秘密的正义者同盟伦敦支部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团体。协会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起初，其成员大多是流亡伦敦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组织发展缓慢；到四十年代后期，它开始具有国际性质，“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切民族的代表，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

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① 正义者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工人教育协会成为同盟的一个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和1849—1850年参加了它的活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生分裂，协会的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了协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复苏。这也反映到协会的活动上来。到五十年代末，协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埃卡留斯、列斯纳、普芬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他们努力克服宗派主义错误，并使协会同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其他民族的工人建立了颇为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接受了列斯纳的劝告，恢复了在协会中的活动，他还敦促沙佩尔重新参加协会并负起领导责任。^② 马克思在协会中的活动，旨在使工人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桎梏。为此，马克思1859年10月在这里向经过挑选的工人小组讲授了政治经济学。^③ 从此，协会的活动逐渐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当马克思为反击波拿巴密探卡·福格特的诽谤运动和捍卫自己的原则而斗争时，协会站到了马克思一边。1860年1月，协会为表彰他“在发展共产主义原理方面的功绩”，^④ 邀请他参加在2月6日举行的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宴会。宴会共有八十人出席，一致通过了谴责福格特的决议。^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5页。协会会员到1844年尚不足30人，1846年6月达到250人，其中有30名德国人，40名斯堪的纳维亚人，20名匈牙利人，以及波、俄、意、比、法、英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康捷尔《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102、108页。）

② 《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70、605页；第30卷第480页。

④⑤ 同上书第30卷第13、33页。

在协会活动中,马克思竭力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1861年年中,因为布朗基在马扎斯监狱里遭受虐待,协会召开了有德、法工人参加的会议,并就此事通过了抗议书,^①随后,协会还组织了募捐,捐款由马克思转给了布朗基的近友瓦托(德农维耳)博士,他当时正在为布朗基一案准备出版一本小册子。^②

协会会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力求使协会成为组织各国无产阶级联合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中心。协会的代表参加了英、法工人维护波兰的活动,出席了1863年7月22日圣詹姆斯大厅的大会,^③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一次预备会。同年10月底,协会还接受马克思的建议,发表了由他起草的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号召在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德意志工人为波兰组织募捐。呼吁书于当年11月印成了传单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中散发,^④还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尤·瓦耳泰希的要求,寄给了在德国的威·李卜克内西,供他在工人组织中散发。^⑤

马克思在协会中的活动,推动了它同英、法工人运动组织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协会经受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考验,从五十年代末起又不断受到马克思思想的熏陶,已经成为各国流亡的无产者和民主派的联络中心之一。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如埃卡留斯、列斯纳、罗赫纳、普芬德、施佩耶尔、考布和吕耳等人,同英国工

① 列斯纳《纪念奥古斯特·布朗基》,转引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1—612页。

③ 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4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14—615页。

⑤ 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第458页;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56页。

人运动和工联运动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协会也就不言而喻地被邀请参加 1864 年 9 月 28 日伦敦圣马丁堂大会的筹备活动。

二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对于促使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确实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协会积极地参加了圣马丁堂大会的筹备工作。协会的主席弗·列斯纳是最早把准备举行成立国际性协会的大会这件事通知马克思并邀请他出席的。列斯纳写道：“同我相识的法国人要我去找熟悉工人运动问题和捍卫过工人运动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邀请他们参加建立这样的协会。我去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当时还住在曼彻斯特，不过这时候正好在伦敦。我请求他们参加，他们答应我照办。”^①这期间，恩格斯在伦敦的时间是 9 月 8 日或 9 日^②。可见，列斯纳比勒·吕贝早好几天邀请马克思参加圣马丁堂大会。当然，可以想得到，在得到列斯纳的通知之前，马克思早就从 1864 年 9 月 3 日《蜂房报》的报道中知道了将要举行国际大会这件事。^③

马克思和埃卡留斯、列斯纳、以及教育协会的其他活动家作为该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圣马丁堂大会。协会的合唱团在大会上演唱了革命歌曲。马克思参加了主席团，埃卡留斯向大会发表了演说。他为了准备这次演说，在 9 月 26 日即在大会召开前两天写信给马克思征求了意见。^④马克思和埃卡留斯被大会选进了临时委员会。圣马丁堂大会结束后，当即在附近的亨利希·博勒特的小酒馆即

① 列斯纳《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转引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 1964 年第 6 期第 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16、421 页。

③ 明斯编《第一国际的建立》1964 年三联书店版第 38 页。

④ 同上，第 40 页。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总部所在地举行了庆祝会，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法国代表团、以及英国和国外的著名活动家约五十人参加。^①

马克思最初是由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推举为国际临时委员会的德国通讯书记的。^② 在1864年10月11日临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会委员、德意志工人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埃卡留斯是“国际工人协会”命名这一提案的附议人。^③ 马克思和埃卡留斯最积极地参加了制定国际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的活动。^④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国际《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起草人。

协会也是最早参加国际的团体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在1865年1月10日的会议上正式接纳协会和它的两个分会——伦敦东区的“条顿尼亚”和南区的“和谐”协会加入国际作为支部。会上宣读了由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书记和财务委员、“和谐”协会的代表和“条顿尼亚”的代表签署的致国际总委员会的公开信：“工人同志们：索荷区拿骚街2号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1865年1月4日举行的、有伦敦东区和南区两个同胞团体的代表出席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如下决议：‘三个团体——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条顿尼亚和和谐协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为一个支部。’伦敦教育协会成立于1840年2月7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在其存在的最初年代，就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有过经常的联系。1846到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本协会曾联合在一起。借助于这些国际联系，本协会得以完成了伟大的任务——在德意志联邦境内一切关于社

① 明斯编《第一国际的建立》1964年三联书店版第55页。

② 《总委员会记录》莫斯科英文版（下同）第1卷第37页。

③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40页。

④ 同上，第35—4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17页。

会和政治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在德国工人中宣传了那些激荡了英国和法国的原则和思想。这样，我们起到了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环节的作用；我们竭尽绵薄来破除德国工人中的以为立宪政府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是人民的幸福的幻想。我们为过于疏远的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间建立持久的国际联系的前景而欢呼；我们确信，只有整个文明欧洲的工人的联合行动，才能抵抗得住欧洲全体压迫者的联合行动。”^①

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后，总委员会接着通过了决议，接纳这三个团体为附属团体，它们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②

协会加入国际后，作为一个支部，仍然保持了它的组织的国际性质，会员不只是德国人。例如，匈牙利流亡者腊毕叶在1866年一度担任过协会的主席，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年9月返回匈牙利，受权代表国际进行活动；英国香料工人卡特也是协会的会员，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一位相当积极的委员，一度担任过意大利通讯书记；另一位总委员会委员、英国人斯特普尼，也于1869年经列斯纳介绍加入了协会；^③巴黎公社的战士、匈牙利人列奥·弗兰克尔1871年8月到伦敦后也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并且起了重要作用。^④在国际的活动中，在贯彻马克思的路线方面，协会是最积极的支部之一。

三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同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63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B·库尼娜《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56页。

④ M·艾兰约西《列奥·弗兰克尔》1957年柏林版第77页。

总委员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协会积极贯彻执行了总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指示,帮助了总委员会的实际活动,坚决支持和积极宣传了马克思的路线。总委员会也给了协会的活动以积极支持。

协会向总委员会输送了干部,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腊毕叶、卡特等人,在总委员会开始活动的初期,马克思就使协会里的一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战士,如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考布等加入了总委员会。^①这些老战士是总委员会里无产阶级革命核心的重要成员,是马克思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和坚定的捍卫者。协会的另一些活动家,如博勒特、沙佩尔、豪费等也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他们都是马克思路线的拥护者。埃卡留斯和列斯纳是协会和总委员会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协会还派有专门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协会不仅经常支持总委员会的各种实际活动,而且也经常对总委员会给予物质援助。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总委员会开始活动之初,为了给租赁会址用房提供保证金,在1864年11月22日会议上,与会的二十人共捐款十三镑十五先令,其中属于协会的五人——马克思、埃卡留斯、博勒特、列斯纳和考布共捐款四镑。^②1865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为筹集活动经费,举办了发售入场券的娱乐晚会,协会的合唱团参加了演出。^③列斯纳在1866年5月2日写信告诉马克思,协会已作出决定,要求每个会员每周拿出一便士,作为支援国际的经费。^④1867年3月12日,列斯纳代表国际德国人支部即工人教育协会向总委员会交付了一镑七先令九便士。^⑤在总委员会1865年3月29日至1866年4月28日的财务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43、45等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同上,第57、58、65等页。

④ 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58页。

⑤ 《总委员会记录》第2卷第102页。

报告中,在总委员会给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把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年度捐款列入了经常性进款项目。^①

协会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支援罢工、反对工贼行为和争取工人的国际联合行动的斗争。1866年3月,伦敦和爱丁堡的裁缝工人相继罢工,业主派代理人去欧洲大陆招募工人来破坏罢工。4月间,从德国运进五十七名裁缝到爱丁堡,还有一些德国工人要陆续到英国来。为了支援罢工的裁缝工人,打破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协会会员中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为主席、豪费为书记的委员会,以便同国际总委员会联合行动。应列斯纳和豪费的请求和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材料,马克思在1866年5月4日写了致德国裁缝工人的一篇短文《警告》^②,并在当天把它寄给了李卜克内西。这篇文章在德国好几家报纸上发表了。同一天,伦敦德国裁缝声援罢工的委员会发表了由列斯纳和豪费联署的公开信,阐明了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呼吁德国工人不要到英国来破坏自己兄弟的斗争,并呼吁给罢工者物质援助。^③豪费还受国际总委员会的派遣,偕同另一位委员、丹麦裁缝工人汉森去爱丁堡,劝大陆来的工人不要受英国业主的骗,并为国际作了宣传。^④1867年,协会对于1月间巴黎铜器工人的罢工,对于巴黎裁缝、伦敦火车司机、伦敦裁缝工人的罢工,都给予了援助。^⑤1868年春,协会为日内瓦罢工的建筑工人募了捐。^⑥1869年协会尽管由于会员大多陷于失业,仍然对遭到同盟歇业的巴塞尔的织带工人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2卷第2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4—185页。

③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186,413—414页。

④ 同上,第1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17页。

⑤ 《列斯纳致约·菲·贝克尔》(1867年4月8日),转引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59页。

⑥ 《总委员会记录》第2卷第205页。

和丝绸染色工人组织了物质支援；2月9日，列斯纳将协会在周年纪念日为此募集的两镑六先令转交给了总委员会。^① 1871年5月，协会为支援佩斯裁缝工人的罢工组织了募捐。^② 同年8月，协会也为开姆尼茨的罢工工人组织了募捐。^③

国际总委员会也经常支持协会的各种活动。协会每年都举行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并邀请各民族的工人代表出席。总委员会支持这个好传统，还分担过举行这种大会的费用。^④ 协会每年举行其成立周年的纪念活动，总结一年来的工作，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应邀参加。例如，1865年2月，马克思应邀参加了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其中批判了拉萨尔派的观点，尤其是他们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教条。^⑤ 在协会于1867年2月28日举行的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上，马克思、埃卡留斯和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福克斯，以及另几位与会者应邀讲了话。列斯纳所写的关于这次纪念会的报道刊登在1867年《先驱》杂志第三期上。马克思在演说中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问题，以及德国社会关系。^⑥ 此外，马克思还多次在协会作报告，如1867年12月16日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⑦；1868年5月20日作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⑧ 1866年3月，协会的总部由拿骚街2号博勒特大酒馆迁到路珀王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3卷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77—278页。

③ 《列斯纳致马克思》（1871年8月），转引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59页。

④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1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83,453—454页。

⑥ 同上书第16卷第604—605页。

⑦ 同上，第506—522,637—639页。

⑧ 同上书第32卷第92页。

子大街草市 40 号以后,设立了图书室,藏有英、法、德各种文字的图书共六百卷,^①还有英国各地方及大陆各国的杂志。马克思利用过这个图书室。^②

对于协会的全部工作,马克思了如指掌。除了列斯纳和埃卡留斯经常就协会的工作向他作详细报告和请求指示外,协会的其他领导人和活动家如施佩耶尔、吕耳、罗赫纳、普芬德、沙佩尔等,都同马克思有经常联系。协会如发生了重大事件,协会的书记,如施佩耶尔,还及时写信向马克思报告。^③作为国际总委员会的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在协会里德高望重,他对协会工作的指导,他在协会里的报告,影响很大,推动了协会的会员团结在国际的周围。

四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工作。尽管向大陆派遣代表的费用很大,而协会的财政状况又经常拮据,但它还是派代表出席了各次代表大会。协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都是遵循马克思的意见、建议和指示进行活动,坚决捍卫了马克思的路线。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结束时,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有相当规模、气氛热烈的庆祝晚会。协会全力支持了这次晚会,它的合唱团在晚会上演唱了革命歌曲,并为舞会伴奏。^④在 1866 年日内瓦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 5 卷第 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12、396 页;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 1964 年第 6 期,第 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98 页。

④ 《总委员会记录》第 1 卷第 307—309 页。

代表大会上,协会因经费缺乏而未能专门派代表出席,但它资助了总委员会,使总委员会的代表得以成行,其中埃卡留斯和卡特同时也是协会的会员,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活动,当然可以代表协会的观点。^①

此后的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列斯纳作为协会的代表和埃卡留斯都出席了。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开始了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辩论,埃卡留斯和列斯纳同约·菲·贝克尔、施土姆普弗以及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支持了德·巴普的意见,反对了蒲鲁东派的代表关于土地只应归个人所有的主张,拥护土地集体所有制。^②列斯纳在9月5日和7日写信向马克思报告了代表大会进行的情况。^③

1868年9月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协会因缺乏派代表所需的经费,决定呼吁伦敦的德国工人捐款。为此,协会发表了由列斯纳起草并经马克思过目了的《告伦敦德国工人书》。^④列斯纳用这次募集到的钱作川资前往比利时。马克思通过埃卡留斯和列斯纳了解和指导了大会的工作,^⑤列斯纳差不多每天向马克思报告大会进程。在9月9日的会议上,列斯纳就使用机器问题发了言,并“宣读《资本论》的引文博得了掌声”。^⑥在讨论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埃卡留斯和列斯纳也象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一样,坚决支持了德·巴普对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的批判。^⑦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废除私有制的决议,这是蒲鲁东派的严重失败,他们在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1卷第424—426页。

② 巴赫等《第一国际》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1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5,348页。

④ 同上书第16卷第644—645页;第32卷第545页。

⑤ 同上书第32卷第546—547页。

⑥ 同上,第737页。

⑦ 巴赫等《第一国际》第1卷第142页。

国际内从此一蹶不振了。根据德国代表团的坚决要求，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列斯纳起草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了这部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对于世界工人运动的意义，并建议把它译成各种文字。^①

列斯纳代表协会出席了1869年9月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②也象前两次代表大会一样，列斯纳接连几天写信给马克思详细报告了大会的工作情况。^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斯纳是土地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再一次发言拥护土地集体所有制。^④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列斯纳和埃卡留斯两人在发言中阐明了马克思拥护者的立场，显示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把农民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争取实现工农联盟，乃是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任务。^⑤列斯纳还就工会问题发了言。他的发言，反映了马克思的立场。他坚决反对了英国工联派关于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只限于争取日常的经济要求的斗争、而忘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等等改良主义观点。^⑥代表大会期间，列斯纳和埃卡留斯还在每天晚上举行工人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由于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其意义尤为重大。在德国，由于警察统治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政策，国际的宣传和组织发展，困难重重。当时，能够派代表出席象国际代表大会这类会议的，大多只有舒尔茨—德里奇的团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36页。

② 巴赫等《第一国际》第1卷第164页。

③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1977年三联书店版第479—480页。

④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9页。

⑤ 巴赫等《第一国际》第1卷第166—167页。

⑥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第87页。

⑦ 《总委员会记录》第3卷第159页。

和拉萨尔派的工会组织。只有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来的代表，因为受到马克思的思想熏陶，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坚持马克思路线和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战士。他们同来自德国本土的代表交流情况，交换意见，这对于促进国际在德国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并宣布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这个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工人政党。

在马克思为国际制定无产阶级纲领的斗争中，协会给了很大帮助。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得以通过，给巴黎公社革命所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协会的会员弗兰克尔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列斯纳作为总委员会十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之一，^①在代表会议上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有力的支持。1872年8月27日，协会选举列斯纳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②在代表大会上，他和杜邦、拉法格、约·菲·贝克尔等组成了坚强的无产阶级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依靠了这个核心才得以使代表大会把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列入共同章程，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粉碎了巴枯宁派，从而在国际的纲领中确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五

在第一国际时期，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犹如一滴

① 巴赫等《第一国际》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117页。

② 《列斯纳致恩格斯》（1872年8月29日），转引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63页。

水,反映了马克思这个时期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所进行的复杂的、有成效的斗争。协会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反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为反对混进了协会和在伦敦德国流亡者中宣传机会主义观点的拉萨尔分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反复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列斯纳起了突出的作用。

1865年3月22日,即紧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同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之后,协会就根据列斯纳的建议,同拉萨尔派断绝了关系。^①3月22日这一天,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在该会汉堡分会发表讲话,诽谤了国际,也诽谤了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九号刊登了伯·贝克尔的这篇讲话。为此,协会同它的两个分会“条顿尼亚”和“和谐”协会在4月5日联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报纸编辑部和伯·贝克尔的行为,并通过了决议,予以谴责。然而,在伦敦德国流亡者中进行拉萨尔主义宣传的组织者之一路·维贝尔说什么个别党派代表的政治态度是个人的事,协会会员不应该干预,并企图强使会议通过这类内容的决议。这种错误立场遭到了与会者的否决。马克思在4月8日给《柏林改革报》写了一篇题为《人类的主席》一文,驳斥了伯·贝克尔的攻讦。但是,路·维贝尔继续坚持其拉萨尔主义的立场,他在4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十号上发表了一篇歪曲4月5日会议情况的报道,并且在“条顿尼亚”里造谣生事,制造分裂,因而被协会开除了。^②

1868年11月6日和7日,协会的领导人施佩耶尔、吕耳和列斯纳写信邀请马克思参加协会举办的罗·勃鲁姆的纪念会,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是:协会的会员在对待路·维贝尔的问题上采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37页。

② 同上,第113—114页;第16卷第100—105页。

了正确的立场，这就有资格邀请马克思出席他们的集会。^① 不过，当时协会里青年人多，他们并非全都立场坚定。这在对待施韦泽派同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纽伦堡派之间的关系的态度上反映出来了。列斯纳当时在协会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他未能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协会决定写信给德国工人，实际上是要表示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反对在纽伦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国际的决议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在得悉这个消息后，马克思于 1868 年 11 月 23 日写信给协会的书记施佩耶尔郑重声明，鉴于这种情况，他将不得不退出协会。^② 关于这件事，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从巴黎和德国进口的拉萨尔分子——他们同施韦泽有秘密的来往——利用列斯纳由于妻子生病而未能出席的机会，强使这里对施韦泽投信任票而反对纽伦堡派。自然，他们想让我对此承担责任，因为我是这个协会的知名会员。我认为这就是全部阴谋的目的。因此，我要立即写信给施佩耶尔，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宣布退出协会的理由。”^③ 协会的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的意见，后来发表在《先驱》杂志 1868 年第十二期和 1869 年第一期上的协会致施韦泽的信，体现了马克思上述声明中的精神，加进了呼吁德国工人组织加入国际的内容。马克思同协会之间的分歧乃告消除。^④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协会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当战争在德国方面由民族防御战争转变为掠夺战争的时候，协会面临着俾斯麦的代理人在伦敦德国流亡工人中进行沙文

①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463 页；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 1964 年第 6 期第 6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80—381 页。

③ 同上书第 32 卷第 198 页。

④ 《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第 464 页；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 1964 年第 6 期第 61—62 页。

主义宣传的严重挑战。1870年10月11日和18日，伦敦的俾斯麦派报纸《海尔曼》的编辑、普鲁士的密探海奈曼，操纵在伦敦的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团体“友爱会”组织了两次集会，以德国工人的名义提出了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并且将两次会议的决议作为伦敦德国工人的宣言发表在《海尔曼》上。作为答复，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它的分会“条顿尼亚”联合发表了声明，揭露了兼并政策的拥护者的荒唐无稽。这篇声明刊载于1870年《先驱》杂志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上，并且在日内瓦印成了传单。1870年11月，《先驱》和《人民国家报》详细报道了这件事，并且明确指出，为了获得别国的领土而以战争方式来改变国界的任何企图都是一种罪行。^①

1871年1月24日的《伦敦报》（一家德文周报）发表了一个俾斯麦警探的一封信，诽谤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并进行沙文主义的鼓噪。协会在3月8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对这位警探的信的公开答复。复信中写道：“德国军队开到巴黎，并不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也不是为了使德国免遭法国的攻击，而只不过是满足一位政治冒险家称霸的野心……不是为了解放德意志民族，而是给她带上新的锁链。最近的将来——可惜太晚了一点——会使德意志民族睁开双眼，让她看清楚究竟是谁真正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报纸上刊登的这封复信中的删节号接二连三，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标上删节号的地方，是德意志帝国出版自由的结果。”^②

在1871年和1872年，协会组织对在不伦瑞克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属的援助。这些人是因为反对战争拨款和反对普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4卷第79—80页；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62页。

② 同上。

鲁士兼并法国领土而被控犯了叛国罪。马克思在1871年1月13日一次就给李卜克内西的夫人寄去了协会捐赠的七塔勒。^①协会也经常帮助巴黎公社流亡者，同时，它也从公社流亡者中获得了新的力量，例如弗兰克尔，他是在协会因遭到拉萨尔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处于困境时加入协会的，并且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1871年秋冬，协会中的拉萨尔分子同巴枯宁分子和1871年法国人支部中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相勾结，反对9月召开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反对总委员会。1871年12月3日和8日的拉萨尔派《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十七号和六十九号上，刊登了施奈德尔和维贝尔的一些诽谤性文章。他们指责伦敦代表会议是“非法的”，说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没有法律效力”。拉萨尔分子企图使协会脱离国际。以列斯纳、吕耳和弗兰克尔为首的协会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同拉萨尔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以拉萨尔分子的失败结束。协会于12月开除了拉萨尔分子，并声明完全支持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②在1872年1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总书记黑尔斯宣读了拉萨尔分子盗用协会的名义给总委员会的一个通知。通知旨在吊销协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吕耳的代表证书。与会的吕耳、弗兰克尔、埃卡留斯（全是协会的会员），还有荣克，当即揭露了拉萨尔分子的阴谋，指出了他们因为替德国的侵略政策张目，大搞分裂活动，已被协会开除。拉萨尔分子的阴谋破产了。^③恩格斯1872年2月15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对此高兴地说：“正如你知道的，这里把拉萨尔分子赶走了。”^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1页。

② 同上，第380页。

③ 《总委员会记录》第5卷第86—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04页。

1872—1873年，协会的活动同英国工人运动的联系十分密切。协会的领导人列斯纳和吕耳，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于1871年10月开始成立时，就是它的成员。^①作为协会的主席，列斯纳出席了1872年6月20日在诺丁昂召开的不列颠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杜邦、琼斯等马克思的拥护者。^②列斯纳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了大会领导的机会主义。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后，列斯纳等协会的领导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翼。

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协会在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拉萨尔分子的影响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在国际解散以后，协会继续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这些年代里，协会仍然遵循了它的老传统，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和多方面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采取了符合当时条件下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要求的正确政策。恩格斯在1893年12月1日答谢协会对他七十三岁寿辰的贺信中写道：“祝协会永久繁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第一次举起的老的红旗！”^③

① 《总委员会记录》第5卷第520页。

② 亨·柯林斯和奇·阿勃拉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年代》1965年伦敦英文版第2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6页。

可能派和马克思恩格斯 对它的批判

(1881—1882年)

辛 庚

可能派,又称布鲁斯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鲁斯、马隆、若夫兰和符尼埃尔。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党内以盖得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革命派反对可能派的斗争,并且在斗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策略上给以热情的帮助。他们揭露了可能派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并且指出:可能派充当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毫不留情地批评盖得和拉法格等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醉心于革命空谈等错误。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帮助下,以盖得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革命派终于粉碎了可能派的阴谋活动,在组织上与之彻底决裂,继续引导法国工人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今天,我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回顾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03页。

一、可能派的形成

布鲁斯派和盖得派之间的分歧,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布鲁斯派反对把哈佛尔纲领作为全党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纲领,主张党的各地方组织有制定各自的竞选纲领的自由;盖得派则坚持全党必须有统一的纲领,反对布鲁斯派对哈佛尔纲领的诬蔑和攻击。

其次,布鲁斯派反对党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主张建立结构松散的、各地方组织实行自治的党,鼓吹所谓“联邦制”的建党原则;盖得派则要求建立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实行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布鲁斯派竭力宣扬的所谓“自治制”和“联邦制”。

第三,布鲁斯派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行动夺取政权,鼓吹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的合法改良,宣扬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盖得派则明确宣布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剥夺资本家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布鲁斯派的“市政社会主义”。

第四,除了上述这些原则分歧之外,布鲁斯派还对盖得、拉法格等进行人身攻击。布鲁斯和马隆对于盖得和拉法格在1880年5月拒绝邀请他们去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制定党的纲领极为不满,始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们攻击哈佛尔纲领是在“泰晤士河的大雾”^①中炮制出来的“私人纲领”,诽谤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想要充当法国工人党的独裁者,等等。

1881年是法国的选举年。在1月的市镇选举中,工人党只得

^① 转引自安贝尔《可能派》1911年巴黎法文版第9页。

到四万张选票；而在8月的立法选举中，工人在巴黎和外省总共只得到六万张选票，约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一。^①盖得在鲁贝也参加了竞选，只获得四百九十四票，而他的对手波拿巴派候选人获得五千一百四十七票，另外两位共和派候选人分别获得三千八百八十一票和一千七百二十二票。^②

工人在选举中的失利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布鲁斯派把这归咎于盖得和哈佛尔纲领。他们散布说，由于哈佛尔纲领的导言过于严格和死板，使许多工人无法接受。他们还指责盖得背信弃义。早在1880年8月，盖得曾同马隆、布鲁斯一起在里昂创办了《解放报》，当时根据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不参加选举的保证书。《解放报》在1880年11月停刊后，这一保证书也就失去了效力，盖得被推举为工人党的候选人在鲁贝参加竞选。马隆和布鲁斯等利用这一件事对盖得大肆攻击。

布鲁斯和马隆过去都是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巴枯宁主义的密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积极成员。为了把盖得和拉法格等排挤出党的领导岗位，布鲁斯和马隆等策划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党的全国委员会。根据他们提出的方案，每个联合会派遣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全国委员会，而在当时党的六个联合会中，只有中部、北部和东部三个联合会是实际存在的，其余的都只是纸上的东西。1881年10月中旬，在兰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布鲁斯和马隆等急不可待地成立了全国委员会。除了北部联合会的代表外，这个委员会的其余成员都是布鲁斯派。这样，布鲁斯和马隆等人就为在兰斯代表大会上夺取党的领导权作好了准备。

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法国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

① 《盖得文选》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31页。

② 勒夫朗《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1963年巴黎法文版第45页。

会在兰斯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四十四名代表，其中一半以上是马隆和布鲁斯所控制的中部联合会联盟的代表，盖得派的代表只占少数。这一力量对比决定了整个大会的倾向。11月1日，布鲁斯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尽管盖得等坚决反对成立这样的全国委员会，大会还是以三十票赞同、九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布鲁斯的提案。在新成立的全国委员会中，只有五名盖得派的成员，其余的二十五名都是布鲁斯和马隆的追随者。这样，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布鲁斯派的手里。

布鲁斯等人在会上要求赋予各联合会制定竞选纲领的自由。马隆、布鲁斯、符尼埃尔、若夫兰等提出了一项提案，其中说：“鉴于最低纲领^①只是不完全地体现劳动者的各种愿望；鉴于它使更多的没有加入工人党的劳动者同工人党疏远了，特别是同工人党候选人疏远了；鉴于一个省或一个区的劳动者有着不同的愿望；我们要求每个选区的社会主义工人委员会有权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②这个提案以二十六票获得通过。

但是代表大会接着以二十八票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宣布哈佛尔纲领继续有效，其中说：“鉴于存在一个共同的党纲和各地方的竞选纲领是有益的；建议各地区的工人联合会研究这个问题。在通过新的党纲之前最低纲领继续有效。”^③

这样，大会一方面赋予各地方联合会制定各自的竞选纲领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承认哈佛尔纲领仍然有效。这两项决议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这恰恰表明布鲁斯派力图采取迂回的策略击败盖得派。大会还通过了符尼埃尔提出的决议案，宣布布鲁斯派操纵的《无产者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恩格斯尖锐指

① 指哈佛尔纲领。

② 泽瓦埃斯《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53页。

③ 《平等报》1881年12月11日。

出,兰斯代表大会“是个骗局”,“已经完全被马隆和布鲁斯抓到手的《无产者报》,之所以如此匆匆忙忙地被宣布为正式机关报,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事先同不久就要出版的《平等报》捣乱。”^①

兰斯代表大会之后,布鲁斯派进一步采取行动来修改党的基本纲领,宣扬改良主义观点。1881年11月19日,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了《再论社会主义的团结》一文,要求工人党放弃“一种学说的狭隘眼界”,而为各种学说的拥护者打开大门。他写道:“我们宁可放弃迄今采取的‘一下子全部解决’、通常以‘一无所成’告终的方法,而把理想目标划分成若干重要阶段,以某种方式直接争取我们的某些要求,使之终于可能实现,以免徒劳地踏步不前。”^②他把这种政策称作“可能的政策”。这篇文章可说是布鲁斯派的正式宣言,它公开宣布抛弃革命的学说而只争取实现某些可能的细小的改良。因此布鲁斯派被称作可能派。

可能派的这一政策同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政策十分相似。英国工联的领袖豪威尔在《新旧工会主义》一书中说,工会的任务“只限于切实可行的问题和可能达到的目标”,^③这同布鲁斯的论调如出一辙。因此恩格斯非常中肯地指出:可能派把自己“降低到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④

为了在法国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同布鲁斯派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盖得同拉法格、杰维尔、马萨尔等一起积极筹备恢复《平等报》。1881年12月11日,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第一号问世,其中发表了盖得写的社论《告朋友和敌人书》和《兰斯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1页。

② 安贝尔《可能派》第6页。

③ 豪威尔《新旧工会主义》1973年伦敦英文版第22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4页。

表大会》一文，此外还有拉法格的《德国社会主义党》以及杰维尔、马萨尔等人的文章。盖得在社论中宣布，《平等报》的任务就在于维护党的纲领，决不容许某些候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这个纲领的原则。他驳斥了布鲁斯等人散布的改良主义观点，并指出：“在我们的队伍里，不容许有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①如果说在这之前“机会主义”一词通常用来说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那么，盖得在这里第一次把反对哈佛尔纲领的布鲁斯派称作机会主义派。后来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借用了这个术语，来说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的观点。^②

二、从若夫兰的竞选纲领 到圣亚田代表大会

1881年12月18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市政选举中，第十八选区的工人党小组推举若夫兰为候选人。他是布鲁斯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是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若夫兰在选举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哈佛尔纲领的竞选纲领。

若夫兰的竞选纲领同哈佛尔纲领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若夫兰的竞选纲领完全删去了哈佛尔纲领的导言部分，而代之以经过篡改的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导言。

哈佛尔纲领的导言是马克思亲自口授的，由拉法格记录下来，然后马克思对记录稿再作了一些修改。^③这个导言规定了工人党的奋斗目标——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同时指明

① 《平等报》1881年12月11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③ 《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47页。

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无产阶级组成独立的政党，采取革命行动，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这个导言是整个纲领的灵魂。布鲁斯派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这个导言，是毫不奇怪的。

若夫兰的竞选纲领采取了同 1866 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导言相类似的提法，但是删去了原章程中关于“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重要论述，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平等”和“真正的自由”，甚至还玩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口号。

1866 年的国际章程虽然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由于当时参加国际的许多工人还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为了使他们也能接受，章程不得不采取一般的表述。恩格斯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1866 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摒除在外。”^①若夫兰抛弃哈佛尔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导言，而用六十年代的国际章程的导言来加以代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

第二，若夫兰的竞选纲领删掉了哈佛尔纲领实践部分有关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而代之以“必须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这样的含糊的提法；此外，它还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纲领那里抄袭了“修改宪法”、“取消参议院和总统职位”等条款。

总之，若夫兰的竞选纲领完全阉割了党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可是，布鲁斯派控制的全国委员会竟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若夫兰的竞选纲领比哈佛尔纲领更加激进，批准把它作为向全党推荐的纲领。

1881 年 12 月 25 日，盖得在《平等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弃权》一文，阐明了对若夫兰竞选纲领的立场。他指出，决不能为了在选举中争取选票而放弃统一的纲领。他写道：“一旦统一的纲领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69 页。

破坏,一旦各团体在竞选中宣布自治,那么,无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就会失去一切保障!”^①盖得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可能主义”这个词来称呼布鲁斯派的观点。他说:“在统一的纲领之外,就不再有工人党。剩下的只是一个名称,但仅仅是作为掩饰一切资产阶级货色、一切保守的‘可能主义’的幌子。”^②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苏联和法国出版的一些研究法国工人党史的著作中,认为盖得在1881年12月11日发表在《平等报》上的文章就已经使用了“可能主义”一词。有些作者还引用了据说是盖得的一段话:“怎么?难道要我们只提出可能的要求吗?难道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能够容许这种新的形式的机会主义吗?难道能够以选举的胜利作为借口在可能主义的形式下对马赛代表大会和哈佛尔代表大会以来三年中革命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表示怀疑吗?”^③据我们查证,1881年12月11日《平等报》上盖得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的话,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段话最早出现在1911年出版的安贝尔《可能派》^④一书中,但没有加引号,显然是该书作者对盖得的论述的概括,而不是盖得的原话。后来这段话经过辗转引用,被说成是盖得文章中的话,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盖得在1882年1月1日发表的《权威主义者》^⑤一文中,还驳斥了可能派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权威主义者的谬论。盖得要求只

① 《平等报》1881年12月25日。

② 同上。

③ 别尔金《茹尔·盖得和争取建立法国工人党的斗争》195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1页;勒夫朗《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第46页;利古《法国社会主义史(1871—1961)》1962年巴黎法文版第47页。

④ 安贝尔《可能派》第6页。

⑤ 《平等报》1882年1月1日。

承认那些接受党纲、缴纳党费的人为党的成员；他还指出，党的机关报必须接受党的监督，党有权任命和撤销它的编辑。

拉法格也在《平等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同可能派进行论战。他在题为《自治》的一组文章中，批判了可能派竭力鼓吹的各地方联合会实行自治的论调，^①在《可能主义》一文中驳斥了可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攻击，并且指出：“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合作社主义和合作社主义者；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而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同样，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将批判可能主义和可能主义者。”^②1882年4月拉法格从伦敦回到巴黎后，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同可能派的斗争。他在同年6月写的《工人党的目标》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可能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根本对立。他说：“可能派和革命派这两个派别在互相斗争。可能派想要通过和平的市政改良达到工人的解放；革命派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力量才能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获得拯救。”^③他指出：工人党的目标就是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从资产者那里夺取过来的生产资料交给集体或国家占有，手段是革命力量”。^④

1882年1月7日，若夫兰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盖得的公开信，^⑤竭力为自己的蒙马特尔竞选纲领辩护，并且攻击盖得违背党的纪律，因为他反对全国委员会作出的向全党推荐若夫兰竞选纲领的决议。接着，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举行的工人党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占据多数的可能派强行通过了一项决

① 《平等报》1881年12月25日，1882年1月1日和1月15日。

② 同上报1882年2月5日。

③ 同上报1882年6月18日。

④ 同上。

⑤ 这封信是由布鲁斯和马隆起草的。

议，宣布开除《平等报》编辑部及其拥护者。此后，被开除的盖得派成员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会，称作中部的联合会。^①这样，可能派和盖得派在组织上开始分裂，在188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在代表大会之前，可能派采取种种卑鄙手段，伪造代表资格证书，以达到控制大会的目的。仅马隆一人就拥有十六张全权委托书。盖得在《工人党代表大会》和《再论我们的代表大会》等文章中揭露了可能派的这些卑劣伎俩。他要求“在代表大会上，表决权只能给予那些真正加入工人党的团体”。^②但是可能派拒绝了这一要求。

1882年9月25日，法国工人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开幕。出席大会的一百一十二名代表中，八十六名属于可能派，只有二十三名是盖得派，其余的三名代表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

可能派完全控制了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盖得派在会上提出了两项有关会议程序的提案，但都遭到否决。接着大会开始宣读全国委员会关于党内纪律问题的报告。可能派力图把违反党纪的罪名加到盖得、拉法格等人的头上，从而达到把他们开除出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盖得和他的战友们决定退出会场，到里昂召开另一个代表大会。

对于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盖得和拉法格是早已预料到的。他们在大会召开前在里昂、蒙吕松、贝兹内和圣夏蒙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演讲会。拉法格曾写信告诉恩格斯：“所经之地，我们都做了工作，使各小组对于我们预料会发生的分裂作好准备。在

① 1882年里昂代表大会之后，中部的联合会改称工人党巴黎集体。

② 《平等报》1882年9月3日。

罗昂，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如有必要，就举行对抗性代表大会。”^①

盖得派的代表退出圣亚田代表大会之后，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明他们之所以同可能派决裂是为了捍卫马赛大会和哈佛尔大会制定的纲领和革命集体主义原则，并且呼吁“那些不愿受工人机会主义蒙蔽并且与之同流合污的人参加我们拯救和改组党的事业。”^②

罗昂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全国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它背叛了党的原则并宣布剥夺其权力，另外成立新的全国理事会。大会确认哈佛尔纲领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组织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纲领，并对它作了若干补充。大会还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其中指出：“夺取国家即中央政权应是党的唯一政治目标”，并且强调：“我们把夺取国家理解为不是保持而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一个工人革命政权，直至在经济上完全剥夺资本家阶级。”^③ 罗昂代表大会决定党的正式名称是法国工人党。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在此期间还举行了三次群众大会，每次都座无虚席，受到罗昂工人的热烈欢迎。

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的可能派通过了一项开除盖得等人的决议，其中说：“鉴于他们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统治（这种统治曾使国际遭到瓦解）的利益，力图迫使公众接受一个私人纲领和一个小集团的组织和行动方式；鉴于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诽谤党的遵守纪律的团体和成员；鉴于他们留在党内会使党的存在和正常发展遭到威胁……”，大会决定将《平等报》集团的成员盖得、拉法格、巴赞、马萨尔、杰维尔和弗雷雅克开除出党。^④ 这项决议毫不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62页。

② 泽瓦埃斯《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60页。

③ 《平等报》1882年10月8日。

④ 《1882年9月在圣亚田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2年巴黎法文版第34—35页。

掩饰地表露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同时也说明了可能派的卑鄙和愚蠢。

圣亚田大会完全抛弃了哈佛尔纲领，并且通过了以若夫兰的蒙马特尔竞选纲领为基础的新纲领。大会还根据夏贝尔的提案，允许每个选区制定单独的竞选纲领。大会确定党的名称是“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副称是“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从1883年起，可能派正式采用了后一名称。

从此盖得派和可能派在组织上实行了彻底的决裂。盖得派的力量集中在工业较发达的法国北部地区(利尔、鲁贝、加来、圣康坦)和中部地区(里昂、罗昂、蒙吕松、科芒特里)。在东部地区也有一些小组(特鲁瓦和兰斯)。这些工业中心的纺织工人、冶金工人和矿工是盖得派的基本群众。可能派的势力主要在巴黎地区、阿登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布雷斯特、图尔、夏特洛)。八十年代初，他们在建筑业、小手工业和服装业的一部分工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

三、可能派的理论基础—— 市政社会主义

1883年，布鲁斯出版了《集体财产和公用事业》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政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所谓“公用事业”论。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可能派的理论基础。

布鲁斯在这本小册子里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说什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必须剥夺私有财产的理论也是以私有财产的非正义性这一思想为依据的。布鲁斯认为，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所有制是否符合博爱或正义的思想，是否应当剥夺资产阶级和实行公有制，而在于“社会通

过何种方式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就可以改造所有制形式”。^①

布鲁斯是这样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导致装备最好、势力最大的少数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了辛迪加等垄断组织；这种垄断逐渐扩展到各个部门，变得非常强大，以致威胁到国家的权威，于是国家不得不加以干涉；国家把私人的垄断企业，如铁路、矿山、自来水、煤气、电车等公司变为公用事业；当这种公用事业发展到把所有生产部门都包括进去的时候，也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

布鲁斯以邮政作为例子，他写道：“用同一数额的邮票，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代价，就可以根据寄信人的愿望把信寄往任何街区，甚至寄往法国任何地方。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文明的普遍传播，所有居民都将利用邮局的服务。那时，就会取消监督，因为监督所花的代价超过它带来的利益。于是寄信，同乘车、公共场所的照明、教育等一样，都将是免费的。当所有设施都实行免费的时候，那就是共产主义。”^② 因此，在布鲁斯看来，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过程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和公有制的到来，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只在于加快这一过程。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在一些市镇代议机构中获得多数后，就可以将一些大的垄断企业（例如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变为工人自己管理的公用事业。此外，还可以设立一些市有企业，以便消灭失业现象。其他城市也会仿照这些市镇的做法。于是，用不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就可以和平地、逐步地代替资本主义。由于工人们通过管理这些公用事业获得了必要的经验，这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会更加容易。

根据布鲁斯的这一理论，可能派把活动的重点放在竞选上，以

① 布鲁斯《集体财产和公用事业》1883年巴黎法文版第9—10页。

② 同上，第20—21页。

争取在市镇代议机构中有尽可能多的席位，通过立法实施各种改良措施。布鲁斯声称：“市政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大半。”^①

最能说明可能派的市政社会主义的特点的，是1882年5月中部联合会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夺取市政机构》的决议。它是由马隆起草的。

这个决议中说：“资产阶级曾经通过革命方式夺取市政机构，从而开始了自己的解放事业，它从那里给予封建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尽管历史的形势从来不会丝毫不差地重复，但是在各个时代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这是每个政党必须加以考虑的。

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同盟者，如同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一样，还不可能通过普遍的革命行动来改变旧社会，他们必须从夺取可以立即占领的阵地开始：他们必须占领最民主的中心——市政机构。”这样，“无产阶级就可以逐渐获得自己的解放”。^②

可能派宣扬的这种市政社会主义，同工联主义、费边主义、拉萨尔主义以及后来的伯恩斯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拉法格在1882年写的一封信中指出：“其实他们（指可能派。——引者）只是拉萨尔派，因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把各个集中的工业部门改变为公用事业和国家工业部门（例如邮政）。”^③列宁后来在谈到这种市政社会主义时也指出，可能派同工联分子、费边派以及伯恩斯坦派一样，“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使社会忽视全部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结构的根本问题，而去注意地方自治的细小问题。”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市政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

① 转引自维拉尔《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78年巴黎法文版第71页。

② 转引自别尔金《茹尔·盖得和争取建立法国工人党的斗争》俄文版第301—302页。

③ 参看《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中文版第1卷第164页。

源”。^① 因此列宁把市政社会主义称作“市侩的机会主义”^②，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可能派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法国工人党建立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他们清楚地看到，马隆和布鲁斯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③ 他们相信，事情的进程将会使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得到暴露。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马隆和布鲁斯等愈来愈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愈来愈激烈，甚至不惜采取造谣中伤和诽谤的卑劣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可能派的这种行为表示极大的蔑视。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臭名远扬的同盟式党徒——马隆、布鲁斯等人——‘悄悄地’诽谤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也就是‘普鲁士人’，所以法国的‘马克思派’是祖国的叛徒，他们以为这似乎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个希望‘完全’落空了。”^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盖得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因此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并经常给予热情的帮助。在1882年4月拉法格从伦敦回到巴黎之前，马克思和

①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35—3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页。

④ 同上，第97页。

恩格斯通过他同盖得保持联系，及时向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提出忠告。1881年底马克思虽然患了重病，但仍然密切注视法国工人运动的进展。1882年2月和8月，马克思在去疗养地治病的途中，曾在巴黎两次会见盖得和杰维尔等，商谈法国工人党内的情况。这一年夏天马克思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逗留期间，经常同拉法格会晤。这些商谈和会晤给了马克思很深的印象，他认为：“盖得和他那一派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①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明确表示了支持盖得派的立场，他写道：“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③

法国工人党分裂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已经完全抛弃了党的无产阶级纲领，因此，“这个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向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了大量解释工作。他们曾先后写信给倍倍尔、贝克尔、伯恩斯坦和左尔格等，详细介绍了法国工人党内斗争的情况，并且呼吁各国党同可能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82页。

② 同上，第267页。

③ 同上，第380页。

④ 同上，第369—370页。

划清界线。从1882年9月到12月这短短几个月中，恩格斯就给伯恩施坦写了八封长信，提供了有关盖得派同可能派斗争的详细信息。1882年10月，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总标题为《圣亚田还是罗昂？》^①，其中引用了恩格斯提供的材料，对法国工人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了基本上正确的分析。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11月又发表了福尔马尔的文章《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②，为可能派进行辩护，完全歪曲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非常生气。恩格斯指出：“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展了维护马隆的运动；在文章结尾甜蜜蜜的辩护腔调中，明显地可以听到马隆的低声细语。”^③此时伯恩施坦也听信了福尔马尔所散布的对盖得派的诽谤。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指福尔马尔。——引者）一再要我相信，圣亚田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而罗昂党在巴黎只是逐渐消失的一小撮人，在外省也人数不多。各方面的人都对我这样说。”^④恩格斯立即写了回信，批评了伯恩施坦的动摇，指出可能派直接背叛了法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伯恩施坦认为马隆—布鲁斯组织规模庞大的看法。他指出：“盖得当时对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人数众多的’（1）代表团所作的分析并没有被驳倒。”^⑤他强调说：“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马隆当时在瑞士，布鲁斯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而《无产者报》——以及它的工团——采取了否定的立场。”^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10月5、12、26日。伯恩施坦用了“莱奥”的笔名。

② 同上报 1882年11月9、16、30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04页。

④ 《伯恩施坦与恩格斯通信集》1970年阿森德文版第163—164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党分裂后,可能派表面上似乎很强大,实际上是十分虚弱的,因为它把自己的纲领降低到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盖得派虽然暂时处于少数,但有正确的纲领,这“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①他们相信,随着斗争的深入,以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一定会日益壮大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力支持盖得和拉法格等反对可能派的斗争的同时,也经常批评他们在策略上的笨拙和幼稚,以及在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醉心于革命空谈等不良习气。恩格斯在谈到盖得和拉法格时说:“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近两年来由于过分热心、有小组习气、喜欢夸夸其谈等等,干了许多蠢事,但他们还以为干得太少。”^②马克思也一再批评拉法格“预言说得太多了”,“总是在增加新的不必要的事端”,^③以致常常落入可能派的圈套。

盖得和拉法格等在同可能派进行争论时过于急躁,缺乏灵活性,不善于等待,选择最好的时机出击,迫使可能派自己把自己弄得声誉扫地。例如,马隆和布鲁斯在开始时用暗示来造谣中伤,而不公开指名。盖得和拉法格却指名道姓地回击。于是布鲁斯等抓住这一点指责他们搞分裂活动,违背党纪。此外,盖得等人由于缺乏对法国局势的具体分析,往往采取教条主义立场,作出一些抽象的、公式化的推论,对工人们提出的一些实际要求不够重视。盖得本人在八十年代初往往把党的最终目的同当前的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对立起来,忽视议会斗争,片面地否定争取改革的意义^④。这样就势必脱离群众。陷于自我孤立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02页。

② 同上,第216页。

③ 同上,第39、38页。

④ 盖得在1893年当选为众议员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夸大议会斗争的意义。

于盖得等在理论和策略上的这些错误很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深刻领会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有一次马克思生气地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有的西方学者歪曲马克思的这句话，认为马克思自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实际上，马克思反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狭隘的、片面的解释。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对盖得和拉法格等人的批评完全是出于爱护。他们对盖得派反对可能派的总的路线是坚决支持的，并深信“他们会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派’的领导地位是不会长久的”。^②正是在两位革命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以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终于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扩大了在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使自己的队伍得到发展和加强。而可能派不久就陷于四分五裂，他们在法国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缩小，在政治上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

② 同上，第411页。

盖得从无政府主义向 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陈 双 苑

盖得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是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年轻时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共和主义者，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十八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拉萨尔主义某些观点的影响。根据他的思想发展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他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拥护无政府主义阶段（1871—1873年）；二、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阶段（1873—1879年）；三、转变过程的完成阶段（1879—1880年）。

一、拥护无政府主义阶段

巴黎公社以前，盖得是激进派的报纸《人权报》的主编。他激烈地反对第二帝国、拥护共和制，在埃罗省和邻近各省的共和派中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巴黎公社运动开始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对它表示支持，但并非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的起义和阶级运动，而是看作保卫共和国和反对凡尔赛分子复辟企图斗争。公社失败以后，他由于在报上发表了赞扬公社的文章，并试图促使外省

对它进行援助，被埃罗省法院判处五年监禁和四千法郎的罚款。为了逃避刑罚，他于1871年6月15日离开法国，流亡到了瑞士。

瑞士在当时是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斗争中心。巴枯宁主义者极力想把法国流亡者拉到他们一边去。盖得那时年仅26岁，他在瑞士首先并经常接触的是巴枯宁主义者，所以受到了巴枯宁主义的很大影响。他由于本身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很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言词”和冒险策略，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法国反动势力异常猖獗的形势认为在法国需要做长时间、耐心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盖得对此感到失望，因而很快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产生反感情绪，并谴责第一国际的“权威主义”和对国际各支部的“控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盖得于1871年9月6日，在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前领导人茹科夫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它一成立便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并在章程中声明说要“保留充分的行动和首创的自由”。^①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质是要“保留同盟事业继续下去的充分自由”。^② 它实际上是1871年8月6日宣布解散的同盟用另外名称的重新恢复，因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它提出要加入国际的要求，并宣布禁止任何支部再以宣传支部等名义建立分裂的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的企图虽然落空，但并不甘心，于1871年11月12日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所谓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妄图再一次大规模地破坏国际的组织。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六人。盖得和茹科夫斯基作为“宣传和行动支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2页。

② 同上。

得被选为大会秘书，并为大会起草了一个声明（即桑维耳耶通告）。声明竭力否认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合法性和诋毁它所通过的决议，要求国际内部实行无政府主义原则，并以反对“任何权威”为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进行攻击，妄图解散总委员会，篡夺国际的领导权。这个声明是个信号，它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公开宣战。为了彻底揭露无政府主义者的真实面目，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72 年 8 月向国际各联合会发布了一个内部通告，阐述了巴枯宁主义者与总委员会的关系的全部历史，全面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学说，从理论上粉碎和孤立了巴枯宁分子，保证了国际的团结。

桑维耳耶通告尽管是盖得起草的，但他那时受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还不是很全面和深刻的，他始终反对的是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想要实现国际各支部的“完全自治”。他在 1872 年 9 月 22 日给蒙彼利埃国际支部的信中“指责总委员会妨碍工人们‘在每个国家自由地、自发地、按照自己精神的特点和地方习惯组织起来’”。^①当他在法国的代理人布鲁斯（盖得想通过他控制蒙彼利埃国际支部）因为“行为不老实，引起支部的分裂”^②而被蒙彼利埃支部开除时，他“在 10 月从罗马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一篇通讯^③中竟大骂这是对布鲁斯的权威主义的谋害行为”。^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28 页。

② 同上，第 429 页。

③ 正是由于这篇通讯，马克思把盖得看作是告密者，因为盖得在“通讯中指名道姓地称蒙彼利埃的卡拉斯是挑拨离间分子，而对布鲁斯却只写出姓名的缩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29 页）。警察局正是利用了这一线索，从邮局截获得总委员会委员、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寄给蒙彼利埃支部书记卡拉斯的信中，多处发现国际土鲁斯支部成员丹特雷格的名字，便将丹抓捕。而丹在被捕后表现懦弱，出卖了自己的同志，致使二十二名法国的国际会员在土鲁斯受到审讯，并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和罚款。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29 页。

土鲁斯事件发生后，盖得在1873年4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上发表的他于3月29日从罗马寄给汝拉国际会员的一封信中，通过对这个法国南部的“马克思代理人”即丹特雷格的揭露，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他指出，这次土鲁斯事件是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所支持的专制的组织系统的控诉”。^①他认为，只要“让各国工人阶级以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无政府形式组织起来，就不会再出现丹特雷格式的人物”，并且“支部的自治、联合会的自治不仅应是国际的精神，而且也是安全的保障”。^②

盖得在罗马期间(1872—1873年)，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不仅与“宣传和行动支部”保持着通信联系、经常为无政府主义者在纽沙特尔创办的《人民年鉴》撰稿，而且始终以这个支部和“汝拉联合会”成员自居。1872年7月，他还与尼约基-维亚尼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熟练工人和手工业者同盟”的工人组织，并为它制定了一个通篇渗透了桑维耳耶通告思想的章程。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很快就汇入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逆流中。^③盖得这时不仅反对马克思的“权威主义”，而且也反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他赞成无政府式的组织形式，反对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组织方面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不能、也不应该建立自己的政党，而应按符合它利益的无政府的形式组织起来。他同时也反对工人参加普选，认为普选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无产阶级绝不能通过争取投票权而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无产阶级以任何形式参加选举都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另外，他也反对国家制，认为革命就是消灭国家。从盖得在罗马这一段时间内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思想观点来看，他这时已完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无政府

①② 泽瓦埃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1947年巴黎法文版第63页。

③ 参看别尔金《茹尔·盖得和争取建立法国工人党的斗争》195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3—74页。

主义者。

二、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阶段

盖得自 1873 年至 1875 年一直住在米兰。这几年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在米兰,他经常接触的是社会主义者,并为比尼亚米^①创办的《人民报》撰写文章。他还重读了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的著作,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俄国的伟大学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怎么办?》一书则对盖得产生更大的影响。

盖得最初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他在 1875 和 1876 年相继发表的《社会主义教义问答》和《论财产》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这方面的思想。1912 年他在《问答》一书的再版序言中认为,他最初写这本书时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共和主义者。他在这本书中从人的可完善性这个定义出发,对人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类所追求的目的——幸福,靠逐步满足它的全部需要来实现。^②他在这时虽然通过对公社社员的经验 and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研究已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却戴着超阶级的有色眼镜,脱离了人的阶级内容、社会环境和生产活动来看待人。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的抽象的和孤立的分析,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强调人的可完善性、个人的权利、社会的目的和人类的幸福,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建立一种正义(指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和互利的关系,^③也

①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自 1871 年与恩格斯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系。

② 泽瓦埃斯《盖得传》1929 年巴黎法文版第 30 页。

③ 同上,第 30 页。

就是说,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法律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都应当是平等的。而社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可完善性和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发展,实现人类所追求的目的——幸福。不难看出,盖得这时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阶级社会的特点以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还不十分了解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必然处于一定的经济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产品分配上所处的地位决定的。盖得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去抽象地谈人类的幸福、权利、平等和自由,是不切实际的。

《论财产》一书主要论述私有制问题。盖得引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论证私有制的弊病和危害,指出私有制把人“分为财产的占有者和非占有者”,^①是社会贫困的根源。另外,盖得还从生产的角度论述了私有制所带来的恶果,认为私有制“不但使那些仅以两只手为财产的人不能依靠劳动过富裕的日子”,^②而且生产越发展,他们就越贫困,即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为“随着机器的采用、改善和普及,用于生产的资本的效用就会越来越大,因此,资本家占为已有的那部分产品的数量也就会越来越多”。^③盖得在书中最后得出了把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的结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要废除私有制是想维护和保证每个人对财产的权利。”^④但是,由于他对私有制的分析只从正义与非正义出发,脱离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只从道德观念出发,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分析,因此,他既看不到私有制的历史意义,也认识不到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在资

① 盖得《这里和那里》1914年巴黎法文版第18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21页。

④ 同上,第30页。

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能改变的。这就使得他的集体主义思想缺乏科学的理论作依据，而只能看作是由正义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他这时不知道如何废除私有制和实现财产的集体所有，只能使它成为一种愿望。他在《问答》一书中曾提出通过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把被某些人所垄断的生产工具变为大家所有和保证发挥同样作用的人得到相同的购买力^①来实现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与互利的关系。但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先决条件下，这同样只是一种愿望。这只能说明盖得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对资产阶级法律抱有幻想。

盖得在1876年把实现财产集体占有的主张带回法国进行宣传。他把他的理论称为集体主义。他在1891年3月7日“经济和政治问题研究协会”的一次演说中解释说，他在当时之所以没有使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称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是为了与法国过去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但他认为他的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一回事。^②而实际上，它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他初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而言。他的集体主义思想后来有了改变，特别是马赛代表大会（1879年）以后，已逐步摒弃了空想成分，成为科学的理论。而它在最初形成阶段不但未与法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完全区别开来，而且还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集体主义一词最初是由比利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科兰提出来的，他主张把国家占有地租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后来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反对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使用了它。盖得承袭了这个词，一方面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迎合了某些受科兰或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的口味，以便他们对新出现的理论不感到陌生和畏惧。另

① 译瓦埃斯《盖得传》第30页。

② 译瓦埃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第74页。

一方面也说明盖得这一时期的思想或多或少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和共同之处。拉法格在1880年2月写给盖得的信中建议他改变这一提法，认为它对于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毫无益处。^①

盖得在1873至1876年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没有受到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本人的直接影响，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还几乎是空白。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法国后，通过与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思想不同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杰维尔，他于1877年与马克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德国的革命者卡尔·希尔施（他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法国政治避难期间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着联系）的接触，才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他没有看过一本马克思的著作（尽管那时已有法文版《资本论》）。在希尔施的帮助下，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逐步把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使他的集体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论作依据。

他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他于1877年11月创办并领导的《平等报》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盖得和编辑部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并且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平等报》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公社以后的法国社会主义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了法国现实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行动。盖得在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对私有制与生产、集体主义与生产以及工资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盖得和《平等报》为1878年1月28日在里昂召开的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做了

① 参看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编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拉法格资料专辑》第45页。

一些准备工作。尽管这次大会仍与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一样，自始至终被主张合作制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者控制着，但在这次大会上有一名代表提出一个集体主义提案，要求所有的工人协会共同研究实现土地和生产工具集体所有原则的实际方法。这个提案是盖得起草的，它标志着集体主义思想第一次在工人代表大会上得到表现。在这次大会后，盖得和他的朋友由于不顾政府的反对坚持按照大会的决定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而遭到逮捕。盖得在法庭上谴责了司法机关和政府的非法行为，揭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阶级本性以及它所宣扬的权利的虚伪性。他把法庭变为讲坛，对集体主义理论作了详细的阐述，痛斥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是财产和家庭的大敌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诬蔑。

为了普及社会主义理论，使更多的人了解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内容，盖得在狱中向法国工人发表了一个社会主义宣言，题为《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和宣言》。他在这篇宣言中阐述了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确定了社会主义者目前和今后要完成的任务。并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不同程度剥削的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及未来前景作了评述。

继《纲领和宣言》之后，盖得在狱中撰写了一本题为《集体主义与革命》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在被捕之前于1878年9月所写的另一本小册子《工资制及其后果》的续集或姐妹篇。《工资制及其后果》主要是论述废除工资制的必要性。《集体主义与革命》主要论述废除工资制的条件和手段。两本书的写作时间相隔不算长，但后一书的思想比前一书有了很大进步。

在《集体主义与革命》中，盖得认为，工资制是资本和劳动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实现劳动和资本的统一，即劳动者同时占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时，它才能被消灭。^①他在对废除工资制的可能

手段进行阐述的同时，批判了把财产平均和按行业分配的方式，指出行会占有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害处，以及实行财产平均主义的分配所要导致的普遍贫困的后果。^②他在这本书中肯定了集体占有财产的方式，但反对通过赎买和有补偿的剥夺手段实现这种占有方式，认为这两种手段都是幻想。他主张使用暴力手段夺回某些人占有的属于大家的财产，^③但他并不因此而反对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他认为，只要能使人民获得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权利，不管是选票还是步枪都是革命的力量。^④他既反对把暴力剥夺当作唯一的手段，同时也不赞成那种既无充分准备、又没有成功希望甚至是盲目的起义。^⑤盖得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布朗基主义者的批判。他把这种暴力手段称为革命，但认为这一革命不同于1789年的革命，因为先前的革命都只是以一种统治代替另一种统治，而“法国工人或者说第四等级^⑥所要进行的革命，不是要在土地和资本的占有上，以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而是要使所有的阶级组成唯一的一个劳动阶级，并且要使全部生产资料为劳动者服务”。^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影响，盖得的集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接近了。但他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不时受到残存在他头脑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干扰，并且一直没有丢掉受到马克思批判的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错误观点。他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仍把实现人类

① 盖得《集体主义与革命》1945年巴黎法文版第61—62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④⑤ 同上，第74页。

⑥ 拉法格在1881年7月12日写给盖得的信中，要盖得别这样称呼无产阶级，他认为这个荒谬的称呼出自拉萨尔之口。

⑦ 盖得《集体主义与革命》第79页。

的自由、平等当作它的目的，并且把人的各种权利称为天赋的。他在对私有制的认识上，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到道德观念的束缚，认为它不但违背整个社会利益，也是违背正义的，因而在法国实现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既是物质方面的要求，也是道德方面的要求。

正是由于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存在着这种错误认识，所以盖得没有把社会革命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当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的最后解决办法，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而把它看作是由共同的利益和正义所决定的。这样，他尽管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进行的革命与其他任何阶级的根本不同点，即废除私有、消灭剥削，但却否认这是一场阶级的革命，而认为它是正义的革命。^①并且，由于他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看成是自发的，他的推理是抽象的，因而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命定的事件，认为它不仅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发生，而且发生之日不会很遥远。

在工人阶级的组织问题上，他尽管认识到把无产阶级力量（包括各种行业的工会、抵抗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起来是革命的必需条件之一，但没有明确提出建立政党，而是想把工人阶级按协会（联合会）和联盟的形式组织起来，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是使工人阶级摆脱分散状态而发挥作用的手段。^②

在工资制问题上，盖得表现出拉萨尔主义对他的影响。他认为工人工资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上是现实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工人只有在对那些拥有资本而垄断了他们生命的一小撮人有用的情况下，才能生存或者说允许生存”。^③另外，他对工资制进行阐述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放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面，而是商品的流通

① 盖得《集体主义与革命》第79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第34—35页。

领域，从而赋予供求规律一种特殊的意义。他认为供求规律决定和支配着生产，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①他把工资率同样看成是受供求关系支配的，^②把劳动力看作是商品（这一点是对的），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将通过供求关系之间的波动越来越靠近产品的价格或者说成本”。^③很明显，盖得在这里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了，也可以说还并未完全掌握马克思关于价值的理论，不明确“供给和要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④，而决定产品的生产、商品的交换和工资率的是价值规律。

尽管盖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和对集体主义的阐述中有很多缺陷和不足，并且还有很多错误的观点，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⑤他的小册子和文章也“是用法文发表的小册子和文章之中最好的”。^⑥特别是他的《集体主义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不但受到拉法格的赞扬，马克思也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盖得在完成《集体主义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前后这段时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过书信往来。尽管这种联系不是经常的，而且多属于事务性的，但它却能使盖得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直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没有保留下来，也可能尚未被发现，现在仅有的一封是盖得写给马克思的回信^⑦。盖得在

① 维拉尔编《盖得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67页。

② 盖得《集体主义与革命》第37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2页。

⑥ 同上，第223页。

⑦ 这封信曾发表在1935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杂志上。盖得没有具体标明他写这封信的时间，泽瓦埃斯判定它是盖得1879年4月或5月写的。

回信中阐明了他对无政府主义和建党必要性认识上的基本观点。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冒险策略。在1879年3月给马隆的一封信中，他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最无结果、最危险的手段，^①对它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从理论上与它彻底决裂了。他这时尽管相信“暴力解决社会矛盾的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只要简单地打碎现有的一切，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也反对那种毫无意义的、盲目的破坏行动。他认为“在想要行动之前，应该首先通过积极的和不间断的宣传，建立一个政党”，也就是说，使那些“具有更多知识的”社会主义者中的先进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力。从盖得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无政府主义和建党问题上完全拥护马克思的观点，也可以说，他的认识已与马克思一致，已符合马克思主义。另外，他在信中还对马克思本人和他的著作表示了十分敬重和相见恨晚之情，并希望能见到马克思和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这表明盖得已深深感到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并反映了他渴望尽快全面、深刻地掌握马克思的理论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盖得在这一时期，除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往来，还从1879年6月起与拉法格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系。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盖得给拉法格的信的内容不十分清楚，但对拉法格给盖得的信的内容却略知一二，并在某些问题上通过拉法格向盖得提过一些建议。所有这些无疑对盖得系统全面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大帮助，并能加速他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的完成。

三、转变过程的完成阶段

盖得获释后，便开始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而进行“积极的和不

^① 维拉尔编《盖得选集》第93页。

间断的宣传”工作。在他的号召下,第一批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以“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出现了,它们在1879年10月召开的马赛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大会上,以盖得为首的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马克思认为“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①它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次大会最后通过了以一切手段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

1880年5月,盖得为了给新建立的工人党制定一个纲领而来到伦敦,请求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在这两位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的指导和帮助下,法国工人党纲领问世了,它分导言和最低纲领两部分。导言部分是马克思口授的,它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最低纲领部分是盖得预先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某些增减(马克思对法定最低工资一条表示了异议,但由于盖得的坚持,它还是被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完全肯定了它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要求,是使法国工人摆脱含混不清的空洞语句回到现实中的一个有力的步骤。^②导言部分尽管是马克思口授的,但盖得是完全赞同的,也可以说它是符合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而1880年1月21日重新出版的《平等报》正是由于盖得正确的理论观点的确立以及拉法格的积极合作而成为革命集体主义的喉舌。马克思称这第二次问世的《平等报》“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③并认为盖得已转到科学共产主义一边来了。

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制定标志着盖得这一转变过程的最后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1页。

②③ 同上书第34卷第450页。

成。他这时已不再脱离社会和生产来对人进行分析，而是把人置于现实的客观环境中，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他明确了人与人之间所以会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完全是由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人剥削人的现象决定的。^①他把革命看作是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指出任何时候、任何阶级都把暴力或者说革命当作获得解放的手段（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只有进行革命，除此之外，决无其他道路。另外，他把对资产阶级实行暴力剥夺也看作是由现实所决定的。他认为，在小生产阶段，工具是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它体现了个人占有的形式，而到了大规模的集体的生产阶段，这种生产工具个人占有的形式就不复存在了，它只能让位于集体的形式；或者是只对某些人有利的资本主义所有形式，或者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所有形式，而为了实现有利于一切人的社会主义所有形式，只能求助于暴力——这个社会的助产婆，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而不能寄希望于和平的手段，因为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自愿地放弃它的特权和利益。

尽管盖得在 1879—1880 年这段时间里已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直至 1914 年始终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活动在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上，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掌握并不是很全面和彻底的，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政治经济学方面，而对马克思的哲学并未给以应有的重视，没有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不了解一般与特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了解一般是对各种事物抽象的概括，反映了它们的共性，而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区别于其他不同事物的各自本身的特性，因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而是看成教条和框框。他不

^① 维拉尔编《盖得选集》第 109 页。

是把它当作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所应遵循的原则，而是当成能开一切锁的万能钥匙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原则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论断生搬硬套在法国的现实社会上，或者只是根据马克思的个别论断作机械的抽象的推理，而并未对法国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看不到它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盖得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所犯的教条主义，使他的思想多少染上一些宿命论的色彩，因而低估了人和阶级的作用，忽视了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所应发挥的先锋队作用，在策略上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只知道“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①，看不到工人日常斗争（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和某些改良措施的意义，不懂得把劳动者的最终目的与他们的直接要求结合起来，并且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一些政治事件的认识处理上有时甚至犯了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这一切丝毫不能抹杀盖得为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法国无产阶级揭示了革命的前景，通过工人阶级政党的创立，赋予法国工人运动过去所没有的新的面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3页。

新经济政策时期 工农结合的几个问题*

蔡 恺 民

一 列宁的工农结合思想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不仅要实现工农的政治联盟，而且要实现工农的经济结合。工农结合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和途径。

首先，列宁认为必须从工农结合的角度来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速度，即由直接过渡的冲击方法改为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包围”方法。列宁在阐述工农携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时指出：“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①

其次，列宁强调必须发展大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商品流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 1921 年在理论上的重

* 本文只分析 1921—1926 年的问题。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21 页。

大突破。在此以前列宁持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点：商品货币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内，商品货币关系应当逐渐消亡。可以不要商业，而在有计划的国家同农民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在随后向产品直接交换过渡的基础上，实行城乡交换。所以列宁说，在1918年春天“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①经过三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对商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把商业看成是社会主义成分的组成部分，看成工农联系的主要形式，看成“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②列宁强调“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农经济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否则它便不能生存”。^③又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实行周转自由，否则，……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④

此外，列宁主张在国营经济掌握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私人商业参加商品流转，同时，要求国营企业学会经商，学会同私人商业竞赛。

列宁在1923年初所写的《论合作制》一文找到了合作社这种使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形式，找到了引导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二 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俄国反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到了1920年，工业总产值降为战前（1913年）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② 同上，第143页。

③ 同上书第32卷第177页。

④ 同上，第214—215页。

百分之十三点八，铁的产量约为战前的百分之三，钢——百分之五。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少百分之三十三。^① 纺织工业的总产值为战前的百分之九点四。^②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由于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农结合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1926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八，农业总产值超过战前的百分之十八。^③

工农生活也有所改善。由于废除余粮收集制和改行粮食税，又允许农民贸易自由，农民应交的新税额比以前的税额减半，余下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买进工业品。这一政策促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在国家没有采取强迫手段的情况下，1921 至 1922 年向国家交售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④ 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也提高了。农产品总额中的商品部分，1923—1924 年为十二亿九百万卢布，1925—1926 年为十六亿七千五百万卢布^⑤。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村中农化的现象在这个时期比较明显，革命前农村百分之六十五是贫农，1924—1925 年度，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一是中农。^⑥ 贫农和中农的收入比 1913 年有所提高。1913 年按农村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贫农户为四十一一点六卢布，中农户为七十一卢布，而 1925—1926 年度则分别为七十九点一卢布和一百一十五点五切尔文卢布。^⑦

工人的工资不断提高，到 1925—1926 年度，整个工业中工人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2 分册第 134 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80 年三联书店版第 2 卷第 403—404 页。

③ 《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2 分册第 139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64 页。

⑤ Д. И. 柴尔诺莫尔吉克《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政策》，载《苏联新经济政策参考文献辑》1953 年东北财经出版社中文版第 51 页。

⑥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文版第 2 卷第 462 页。

⑦ 同上，第 575 页。

的实际工资平均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在恢复时期头几年,由于某些轻工业部门的市场销售情况较好和赢利较高,这些部门工人的报酬比其它部门要高。^①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发展较快,轻工业次之,重工业遇到了暂时的困难。1922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业恢复到战前产量的四分之三,工业达到战前总产量的四分之一。^②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初期,轻工业由于原料供应困难而开工不足,故暂时不能生产足够的日用品来同农民进行交换,也就不能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在工业结构中,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不够发达,工业还没有能力向农业提供必需的农机、农具和化肥等等,城乡交换的物资主要是消费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这是结合中有待解决的问题;重工业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重工业企业是亏损的企业,靠国家拨款。

二,在工农业产品价格上出现了“剪刀差”。由于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俄国工业落后状况和战争造成的破坏,苏维埃工业不能满足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在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由于工农业发展速度不协调,市场上农产品比工业品更快地充裕起来,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明显脱节,出现了价格“剪刀差”,这种现象到1923年秋达到了顶点,出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生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销售危机),也就是工农结合的危机。这时,农民为了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城市工业品而付出的粮食要比1913年多一点七五倍。^③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文版第2卷第573—574页。

②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政治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1923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文版第20页。

③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业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第7号。

农机和农具更贵。1913年农民买一付犁要出售二十普特谷物，1923年则要出售一百五十普特，买一台收割机早先只要一百二十普特谷物，这时要七百零四普特。^①这样，农民买不起农机具，虽然这些东西很缺，但却滞留在仓库里无法售出。结果工业资金也周转不灵。

三，私商在零售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对工业的资金积累和工农结合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如何对待私商的问题。与这个问题有关，农村小手工业一时比工厂工业显得活跃，因此也产生了如何对待农村小手工业的问题。

三 党内的争论

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列宁的主持下，党内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对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就也是大家公认的。后来列宁病重并去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上，在俄共（布）党内则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争论。当时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在党内占支配地位，另一派为反对派。前一派以李可夫（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编辑）、费·埃·捷尔任斯基（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4年6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为代表，斯大林当时是支持他们的。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中央政治局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首，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任中央书记、《真理报》编辑、直属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文版第2卷第48页。

皮达可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苏维埃银行董事长,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一,在工农业关系的问题上的分歧。

对于农业发展快,农村开始富裕起来,而重工业遇到暂时困难,反对派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托洛茨基说:“如果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产阶级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① 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认为“工作搞糟了,庄稼汉富起来了”并因此而掉泪。^② 他们的论据是农民富裕会给私人资本提供“营养液”^③,在小生产基础上会产生出资本主义。

因此,他们主张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是实行“工业专政”。托洛茨基说:“在国营经济综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财政金融手里。”(《新方针》)^④ 他的意思是:第一,财政应当服从工业,不应该单纯注意平衡预算,而应该增加对工业的拨款。当时财政部主张平衡预算,减少对工业的补贴,国家计委主张增加拨款来发展工业。托洛茨基采取支持计委的立场。^⑤ 第二,财政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包括运输、商业、外贸等等,而且还包括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即农业。因此,托洛茨基实际上是主张以上所有各个部门都要服从工业的发展,主张工业要“从国民收入中捞取最大最好的部分,需要有一双贪得无厌的手,把什么都捞过来”。^⑥ 因此,托洛茨基的“工业专政”的主张同普列奥布拉斯基的“原始积累规律”,即主张国

① 《托洛茨基言论》1979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638页。

② 《捷尔任斯基选集》197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04页。

③ 托洛茨基《工业报告》。

④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476页。

⑤ 参看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英文版第4卷第13页。

⑥ 托洛茨基《工业报告》。

家利用垄断地位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并依靠通货膨胀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①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托洛茨基说：“对农民市场进行预测无论如何不能精确。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领导推行到国营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么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②在托洛茨基的视野中没有农业的地位，在他看来，只要注意国营工业内部的比例协调，就能使工业本身赢得高速度的发展，就能克服工农业之间的不协调。皮达可夫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也反对李可夫提出的制定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主张加强国营工业的计划。

再就是对工业进行改组。托洛茨基主张在几年内在设备最好、地理和商业位置最好的企业里实行工业的高度集中和生产的高度集中，并主张坚决关闭勉强开工，半开工的工厂，并裁减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意见则不同。他把社会主义比作一口“大锅”，认为“在工厂开工不足和亏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部分的生产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反正应当养活工人和负担工厂停工的开支。工厂开工，生产的产品亏损为一百，比工厂关闭时亏损为二百或五百更有利”。^③

占主导地位的一派对当时出现的工农关系中的问题的看法和采取的对策同反对派不同。首先，他们认为，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脱离农业的发展速度，工业暂时的爬行速度以后就会变成“梦想不

①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1926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1卷第1分册第2章。

②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475页。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俄文版第130页。

到的速度”。而农村富裕起来正是工业化的基础。针对皮达可夫关于农村富裕起来和工业落后于农业是极大的危险的说法，捷尔任斯基说：“真不幸，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竟害怕农村富裕起来！”^①他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富裕同工业化的关系：“农村过去是贫穷的，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而现在农村的商品率一天天在提高，作业正在专业化；技术作物越来越发展，城乡商品流转日益发展，因此我说，应当使国家工业化，如果得不到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因为我们需要农村的原料，需要粮食、皮革、土豆、羊毛。如果害怕提农村富裕，就不能实现工业化。”^②显然，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完全不必害怕农村富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用经济手段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农民富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恰恰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他们批判“工业专政”的错误主张。布哈林根据马克思的再生理论驳斥了托洛茨基的高速度高积累的观点。他认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类只有平衡发展，互相促进，紧密结合，工业才能高速度发展，才能打破纪录，这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的积累为前提。“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的函数”，^③“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④

布哈林指出，反对派要“从国民经济收入中捞取最大最好的部分”和从农民那里“拿得越多越好”的政策只是从静止的眼光“瓜分现有的国民收入”，这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⑤。采取这种

①② 《捷尔任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507页。

③ 《布哈林文选》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233页。

④ 同上，第299—300页。

⑤ 同上，第232、233页。

政策必然会造成农民经济衰竭，农民无法进行积累，农村市场缩小，需求缩减，出现销售危机，工业凋蔽，以致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缓慢，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工农联盟破裂。

同时，他们认为，决不可能有自成体系的工业计划，而必须有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计划。因为制定经济计划必须考虑税收，确定税收额就应当对收成进行估计；制定工业计划必须考虑农民的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又同价格有密切关系。在财政预算不平衡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核算，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国民经济计划。总之，他认为国营工业内部的相互关系决定于同农民市场的关系，当然，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带有一定的预测性，要给国营工业企业以一定的灵活性。

在他们看来，农业发展速度快，工业遇到暂时困难，正是反映了原来工农结合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通和商品交换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发展工农业之间的等价交换，才能促使工业改善管理，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不仅向农民提供消费资料，而且提供生产资料，以促进工农业的共同高涨，工业在薄利多销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取得更多的积累，同时，在农民有积累的基础上，国家也完全有可能用税收等经济手段为工业化取得资金，用以发展重工业。为了扭转当时存在的某些国营企业经营不善，发生亏损的现象，他们主张采取以下的对策：

1、国营企业应按目的在于获得利润的商业原则进行活动，取消企业的经费预算拨款，实行国家贷款制。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按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企业（托拉斯）》法令，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停止由预算拨给它们经费开支，企业拥有的物资和货币基金作为企业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保留下来，预算拨给工业的资金限于扩大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除了对国家具有首要意义的某些亏损企业

无须偿还拨款和对国家的长期借款外，其他企业必须偿付贷款，并且支付利息。

2、国营企业组织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自治权的联合企业，在采购、生产和销售方面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们将作为交换单位出现在市场上，为了国家积累而取得并实现利润。

8、在企业赢利和农民积累的基础上，不按市场的途径，而依靠国家集中资金，有计划地保证和发展煤炭、石油、五金等这样一些重工业部门。

4、改组企业的总原则是保证国营工业有必需的流动资金，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取得利润。既不象托洛茨基主张的那样一刀砍，也不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的那样一概保留，而是强调要考虑各企业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它们在地理分布上的相互关系以及与运输和市场的关系，必须倾听和考虑各有关托拉斯和个别工厂的意见等等。

工业改行经济核算制，扩大了企业的权限，刺激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杂费开支，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扩大了市场，按新经济政策原则组织社会主义工业的形式和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轻工业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源泉。1924—1925年度，轻工业在工业企业上交国家预算的利润提成总额中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三。^①

二、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上的分歧。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到1923年秋达到了顶点。形成新经济政策下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销售危机）。首先，当时对“剪刀差”形成的原因有不同看法。

反对派认为其原因，一是“缺乏计划性”^②，二是私商提高零售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418页。

② 参看《四十六人声明》，载《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409页；《真理报》1924年1月1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价格。

占主导地位的一派则认为原因是：第一，工业落后，工业品成本高而造成工业品价格高，遇到购买力低的农民，产品销售困难。另一方面，农民找不到在出售谷物方面有利的相当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就决定了谷物的价格很低。第二，商业关系发展不够，辛迪加的高价政策，工业方面和商业方面的杂费高。第三，两种币制同时存在促使销售危机尖锐化。工业得到的贷款是稳定的通货——切尔文，农民出售农产品得到的是纸卢布，^①这就打击了农民经济，降低了农民的购买力，扩大了“剪刀差”。

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工业品销售危机的原因的看法不同，采取的对策也就不一样。

反对派主张采取的对策，一是加强“计划性”，二是打击私商。他们认为整个国营经济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就可以打击以较低的价格争取买者的竞争对手——私商，从而保持工业品的较高的价格。反对派为了实行高速度、高积累的工业化方针，一直把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当作重要手段，他们认为通过这种价格政策进行积累，比向农民征收直接税更有利^②。

持另一种意见的人断定，反对派的主张会造成工农的脱离。他们主张采取全面治理的对策：1、降低工业品价格。从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10月1日，国营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③2、给农民发放低利信贷。1924年2月成立了中央农业银行，在银行的三年活动中，国家贷给农民约四亿卢布，首先发放给贫农、中农和合作社。^④3、1923年4月俄共（布）

① C·Г·斯特鲁米林《在计划战线上》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1页。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24页。

③ 《苏联共产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5页。

④ 同上，第86—87页。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税收政策”，决定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并实行单一农业税。实行这种直接税，使每个农户的赋税负担同它的收入和财产数量相适应，因此贫农、中农得益最多。^①改进税收工作加速了农业商品率的提高。4、实行币制改革。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完成币制改革的计划，1924年2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法令通过发行票面值为1、3、5金卢布的国库券。2月22日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银辅币和铜辅币，3月7日政府规定收回苏维埃纸币。1924年6月1日，苏维埃纸币完全停止流通，货币流通中完全是稳定的通货。5、加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党的经济政策中的首要任务是扶助合作社，发展国营商业，使它们通过竞争来夺取私人商业资本的阵地，并使它们在经济上利用私人商业资本。^②

这一系列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销售困难逐渐消除，从1923年12月起，产品销售额开始增加，过了半年，仓库积存的商品基本上都找到了销路。

三，在如何对待私人商业和私人手工业问题上的分歧。

1923年秋发生销售危机之后，如何对待私人商业便成为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反对派在危机发生以前就视私商为苏维埃的“敌人”^③，他们担心“商业资本同手工业和富农结合可能第二次产生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④，销售危机发生后，他们断言这是私商任意加价的结果，认为私商不仅妨碍资金从农民那里流入社会主义积累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册第277—278页。

② 同上，第381页。

③④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业报告》和《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

中，而且还“吞食了国民经济的部分剩余产品”。按照普列奥布拉斯基的计算，如果国营企业生产了价值为十亿卢布的商品，而在零售中这些商品卖了十五亿，那么五亿就是私商从社会主义工业那里剥夺的剩余产品^①。

据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估计，当时私人资本有四亿二千六百万卢布，同时有四亿卢布的利润^②。他们不相信国营商业能象私商那样缩减流通费用从而在经济竞赛中战胜私商，所以他们主张利用国家垄断地位，采用经济手段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办法^③来扼杀私商的政策。他们提出“同耐普曼的积累作斗争”，^④向私人资本的积累作全线的有组织的斗争。

占主导地位的一派首先在对私商的积累和力量的估计上同反对派有分歧，他们不同意皮达可夫和加米涅夫的这种观点：似乎私人资本的积累已威胁到苏联整个经济生活，他们反驳皮达可夫等举出的私商获得了四亿卢布的纯利润的数字，据捷尔任斯基的统计，这是几十万私人企业的总收入。布哈林算了一笔细账，他说：“如果用来养活每个私人企业家家庭的费用每月为八十卢布（一年需一千卢布），这就需要三亿二千三百万卢布，因此纯利润等于四亿减去三亿二千三百万，即七千七百万卢布。这个数目同苏维埃经济的总收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⑤他们驳斥托洛茨基等人所谓的私营商业会把国营经济“吞噬掉”的观点，论述了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有可能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① 普列奥布拉斯基《新经济学》第114页。

② 《捷尔任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501页。

③ 普列奥布拉斯基《新经济学》第147页。

④ 《真理报》1924年5月28日。

⑤ 转引自瓦连廷斯基《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1971年斯坦福大学俄文版第106页。

其次，他们肯定了私商的积极作用，认为私人商业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补充，并提出了对待私商的政策。捷尔任斯基提出，党应当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决不能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去消灭它，他反对在大、中批发商业中的私人资本，但在当时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构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他坚持不能没有基层的私商，他说过，在那些要走二十至二十五里地去买一磅白糖或一瓶煤油的地方设立的每个商业点都是一个进步。所以他大声疾呼必须使私商，特别是农村的私商受到行政当局的保护，坚决反对地方行政人员执行扼杀私商的政策。捷尔任斯基还指出私商善于经营，其商品费用比合作社要低，他要求合作社改进工作，响应列宁“学会经商”的号召。^①

布哈林驳斥了“私商积累越多，国家就损失越大，私商剥夺了国营经济的剩余产品”的观点，指出这是一种静止的观点。他认为私商积累愈多，国家愈能巩固，因为国家完全可以用征税的办法，用抽取私商利润的办法，把私商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布哈林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应当实行利用一切经济力量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对待私商的任务是：1、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2、利用私人资本因素，尤其是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不能胜任自己承担的任务，更没有力量把一切都包下来的时候，更应如此；3、通过市场竞争同他们进行经济斗争。^② 他特别强调同私商的斗争不是用脚踩他们和关闭他们的店铺，而是自己努力生产，东西比他们卖得更便宜，质量更高，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③ 他要求进一步突破战时共产主

① 转引自瓦连廷斯基《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第109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5页。

③ 同上，第365页。

义的框框来管理经济以实行这一套设想，在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下，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们提出了加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来同私商争夺市场的任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也一再重申这一政策。

不过，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还进一步提出了排挤私人商业资本的口号，并指出合作社是排挤私商的有效武器。

在贯彻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时，许多辛迪加和托拉斯缩减或停止向私商发放商品，或者要私商立即付现金。1924年4月皮革辛迪加通过私人出售的商品比上月减少百分之三十四点四，贷款期限和规模也缩小了。结果私人商业机构和流转额大为减少。^①

地方在贯彻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时，在实践中犯了错误，在排挤私商时没有相应扩大公有成分的流转额，国营机构特别是合作社的零售网发展速度不够快，不能顶替被排挤的私商，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商业沙漠”。

到了1925年1月，排挤私商政策为“新商业政策”代替，取消了对私商的种种行政限制，同时实行税收政策，这样，既发挥了私商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又限制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积累了资金。

在对待手工业的问题上，两派争论的情况大体相同。反对派尽量夸大手工业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大工业造成的危险，而另一派认为恢复和发展小手工业对系统地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是有利的。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采取了鼓励发展手工业的政策，

① B·A·柴布爾斯基《新经济政策和商业问题》，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2期。

小手工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大工业恢复比较慢，小工业恢复比较容易，手工业为农民提供农具和消费品，也为城市居民提供日用消费品。在商品荒的情况下，手工业的作用更为突出。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农闲季节，农民可以从事各种手工业，在一些地区，手工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四 分歧的实质和几点经验教训

经过俄共(布)党内两派的激烈争论，俄共(布)中央基本上采纳了占主导地位的一派的对策，坚持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工农结合，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在执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苏联工农业开始走上了振兴的道路。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究竟如何看待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反对派正是忽视了俄国的这一根本特点，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当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暂时困难时，往往想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托洛茨基虽然强调要采取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新方针”，而实际上却是要采取旧方针。1923年4月托洛茨基并非偶然地说：“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加速了这一政策的结束，加速了用最新经济政策来代替这一政策，而这种最新经济政策将是社会主义的政策。”^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紧紧跟上说：“现在更正确、更恰当地说，代替‘新经济政策’的是社会主义的积累政策。”^②显然，这里的“社会主义政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13页。

② Б·И·马卡罗夫《就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1页。

策”或者“社会主义的积累政策”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另一派则牢牢抓住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把新经济政策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把它当作列宁提出的工农携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和战略计划，也就是改变了那种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即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老观念，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俄国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子。因此，在遇到一些困难时，他们能从工农结合的角度寻找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采取有利于工农结合的种种措施，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比较正确的。

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出现的问题和有关的争论，提供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当时在工农业发展不协调，重工业遇到了困难的情况下，俄共(布)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调整工业的措施，在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使企业成为在供、产、销方面享有广泛自治权的联合企业，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特别是轻工业恢复比较快，为重工业积累了资金，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是，在工农关系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农业、消费品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些关系，在理论上人们可以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当重工业遇到困难或轻工业积累了较多的资金时，又容易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事实证明，重工业不应单纯依靠轻工业积累资金，而它本身必须很好地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为农村市场服务，否则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就容易出现反复，就容易又搞成自成体系的工业计划。

其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是工农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表现。不应实行高速度、高积累的工业化方针，不能搞自成体系的工业计划，而必须考虑农民的市场容量和农民积累的负担能力，否则

势必要采取同农民不等价交换的政策。当时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在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稳妥的综合性措施,使一些困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些经验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最后,要实现工农的结合,商业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应当保持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流通渠道,即发挥农村私人商业和农村私人小手工业的积极作用,同时采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它们加强调节和监督,这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出现反复,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看来,这是同对私人小商业和小手工业的性质的认识有关,实际上,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把它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没有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以上这些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路标转换派

刘彦章

一 路标转换派的概貌

路标转换派是俄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主要是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派别。

路标转换派这一名称来源于俄国一些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这个文集以尤·弗·克柳奇尼科夫的纲领性文章《路标转换》开头，接着刊登了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等人的文章。

所谓“路标转换”，其基本含义是由用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转而支持苏维埃政权，为建设新的俄国社会进行积极的工作，从而达到使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的目的。

路标转换派出版的报刊有十多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在巴黎出版的《路标转换》杂志，在柏林出版的《前夜报》，在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新闻报》和在俄国境内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的《新俄罗斯》杂志。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尤·弗·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和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①他们是一些仇恨苏维埃政权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

① 克柳奇尼科夫是立宪民主党人，国际法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18年曾参与雅罗斯拉夫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在1918年成立的白卫“乌法督政府”里任顾问和副部长，后来在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府”任外交部长。1919

人。

为什么这些人竟要“转换路标”，放弃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转而支持它并与它进行合作呢？这是当时客观形势决定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连不断地击败外国武装干涉者以及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1920年底结束国内战争，在1921年初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开始了和平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的地位日益巩固，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使反苏维埃阵营发生严重的分化，立宪民主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以及教会都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还顽固地坚持过去的斗争方式即妄图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另外一部分人目睹外国干涉者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武装力量在国内战争中的失败，认识到用武力不可能消灭苏维埃政权，又看到苏维埃政权即将开始和平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需要，需要大批善于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人才，所以他们主张放弃武装斗争，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回国参加建设。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有的是真心实意地愿意转向苏维埃政权一边，愿意为人民服务，有的（主要是上层人物）则是根本立场不变，最终目的不变，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正如1922年8月4日至7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所指出的：“他们企图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机会来为自己的反革命利益服务，并抱着‘钻进’苏维埃制度的方针，他们希望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来逐渐改变这个制

年起流亡国外，1922年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国际法律顾问应邀参加热那亚会议。1923年回国从事科学教育工作。乌斯特里亚洛夫是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1918年住在西伯利亚，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主任，在高尔察克政府里曾领导出版局的工作。高尔察克匪帮被粉碎后，逃往哈尔滨。1935年回国，任经济地理学教授。1937年被判刑。博勃里舍夫-普希金是律师，十月十七日同盟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后流亡国外。1923年回国，从事律师工作。

度，并且按照他们的估计，这个制度本身必然会向资产阶级蜕化。”^①

路标转换派所代表的思潮虽然得名于1921年，但这种思潮早在1920年春天就已经出现了。

乌斯特里亚洛夫1920年底在哈尔滨出版的《在为了俄罗斯的斗争中》一书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潮。这本书是在高尔察克垮台以后，在1920年春夏为报纸写的文章的文集，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接连遭到失败的条件下对自己今后出路的探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某些上层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当然爱国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查霍金的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流亡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绪。他写道，俄国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人们象躲开鼠疫患者一样躲开我们，我们俄国人几乎是最被人看不起、最被人憎恨的奴隶，人们象看待某种传染病发源地一样看待我们不幸的祖国，他们一旦有可能，就会把我们地球上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向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声呼吁：‘够了！回去！我们在这里是异乡人’”。^② 这些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要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国家。过去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高尔察克、邓尼金之流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者身上。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干涉者失败了，苏维埃政权胜利了，而且地位日益巩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办？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这些文章，就是为他们寻找新道路、制定新策略而写的。乌斯特里亚洛夫认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屡遭失败、苏维埃政权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是使俄罗斯成为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5页。

② 《路标转换》文集1922年俄文第2版第158—159页。

世界强国的最好的工具。所以，他主张把与苏维埃政权的分歧暂时放在一边，承认它并回到俄国去与它合作。但这种承认与合作不是真正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是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他写道：承认苏维埃政权“绝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与它完全和解，只是彻底改变战胜它的方法。在国内战争中没能用武力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将要通过演变的方式把它消灭……不管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人物自己怎么说，它内部从本质上发生演变的过程无疑已经开始。我们当前的共同任务，就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①他认为，完成这一任务就会实现民族复兴，逐渐消除苏维埃政权的缺陷；承认苏维埃政权表面上看来是向它投降，但促进它蜕化，使它蜕化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胜利。

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早在1920年就提出的与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和解的“新策略”。

在白俄流亡者中间，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思想不是唯一的，不少知识分子有类似的思想。早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发表与工农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徒劳无益的见解之前，曾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委员的弗·别·斯坦凯维奇就曾撰文主张与人民和解，主张承认十月革命和回国工作。曾进行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原立宪民主党首领之一的尼·安·格烈迭斯库尔教授1920年在《消息报》上撰文，号召知识分子完全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与苏维埃政权和解。

《路标转换》文集把这种思潮总结起来，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从此，这种思潮也就以“路标转换”思潮为名了。

^① 转引自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7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2—103页。

二 路标转换派的内部分歧

路标转换派内部很不一致，存在着许多分歧，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例如克柳奇尼科夫说过，他们自己没有统一的世界观，各人都有各人的出发点。在《路标转换》文集出版后，在路标转换派中间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两派，两个中心。一派是以哈尔滨出版的《俄国生活》丛刊和《生活新闻报》为代表^①，另一派开始以《路标转换》杂志为代表，在它停刊后，以柏林出版的《前夜报》为代表^②。两派都认为需要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停止对它进行毫无意义的武装斗争，以便回国建设大俄罗斯强国，都同意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论点——苏维埃政权正在演变。但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乌斯特里亚洛夫一派是路标转换派中的右翼。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是整个苏维埃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演变的标志。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如下论据：苏维埃政权“过去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现在正恢复私有制，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现实成就的顶点。过去是‘立即实行世界革命’；——现在把‘面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提到日程上来，并放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斗争方法。过去是好战的无神论；——现在盛行‘同教会妥协’。过去是不可遏止的国际主义；——现在‘要考虑爱国情绪’，并适应这种情绪。过去是最正统的反军国主义；——但是如今红军早已成为

①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E·雅什诺夫、Д·切尔尼亚夫斯基、С·乌赫托姆斯基等。

② 这一派的最著名的政论家是斯·鲁基亚诺夫、Т·基尔杰佐夫、斯·查霍金、尤·波切欣、亚·博勃里舍夫-普希金、А·古罗维奇、尤·克柳奇尼科夫等。

革命的骄傲。”^①他认为：苏维埃资产阶级日益成熟，农民、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同样与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革命的俄国就其社会实质来说，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国家。”^②这种国家与旧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是一种“小萝卜式的”社会，“外面是红色，里面是白色”，“旧资产阶级灭亡了，——新资产阶级正在产生”，“新的贵族，新的资产阶级，新的官僚阶级”^③居于统治地位，“人们要消灭这种力量，而它却增长着，发展着”。^④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没有力量，正在“为了拯救苏维埃而牺牲共产主义”^⑤，向生活妥协，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一旦作出重大让步，一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要想‘退回到共产主义’，那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⑥布尔什维克自己认为这种“温和的和妥协的路线”只是暂时的，只是策略上的，但事实终究是事实。^⑦在经济上的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必然要作让步。

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的蜕化过程取得成果，必须促进而不是妨碍这一过程。但促进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用暴力、饥饿、干涉来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另一种是通过帮助苏维埃政权恢复生产力、巩固国家制度、提高它的国际威望来促进它蜕变的办法，也就是通过他所概括的“热月的道路”，即不是暴动的道路，而是“革命组织的蜕化”道路，是革命“代表人物的心灵的改变”道路。^⑧总之，他认为，要依靠革命力量本身，而不是依

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名义下》1925年哈尔滨俄文版第44—45页。

② 同上，第96页。

③ 同上，第15、16页。

④ 同上，第16页。

⑤ 同上，第9页。

⑥ 同上，第53页。

⑦ 同上，第9页。

⑧ 同上，第23—24页。

靠反革命力量去战胜革命。

乌斯特里亚洛夫及其同伙由于认为苏维埃政权自己会消灭革命的一切“过火行为”并最终要演变成资产阶级政权，所以选择了“热月的道路”，主张放弃军事进攻、武装暴动和恐怖活动，认为必须转向建设性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在苏维埃政权下积极参加恢复俄国的建设事业。这就是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路标转换派右翼思想的基本特点。他们的出发点是大国沙文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开始蜕化。他们是新老资产阶级利益的卫道士和代表者。

以柏林出版的《前夜报》为代表的一派是路标转换派中的左翼。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与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右翼不同，其中之一是对新经济政策本质问题的看法。乌斯特里亚洛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政权演变和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表现。柏林的路标转换派则得出另外的结论：新经济政策的任务不是用“生活的要求”来代替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在他们中间寻找某种合力。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会威胁苏维埃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能产生耐普曼分子，但在新经济政策下，耐普曼分子不能制订经济政策。^①他们怀疑乌斯特里亚洛夫及孟什维克的预言：苏维埃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经济基础中发生的变化，一定要立刻导致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变化。

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导致社会主义还是导致资本主义？柏林的路标转换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俄国现在建设的正是社会主义”^②；新经济政策不表明苏维埃政权放弃十月革命提出的最终

① 转引自 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 114—115 页。

② 同上，第 115 页。

目标。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与乌斯特里亚洛夫右翼在解决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农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乌斯特里亚洛夫把新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的成就直接归功于富农经济，并把发展农业的希望寄托在富农身上。柏林的路标转换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私人的个体经济总会要倾向于富农，进行剥削，搞投机倒把，所以农民经济的前途是组织合作社，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他们所说的合作社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而是小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合作社。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激烈地批评资产阶级民主制，认为“纯粹民主”、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都是虚伪的，是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俄国不能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制。他们承认俄国现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但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不可改变的，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演变，但不是向乌斯特里亚洛夫派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方面演变，而是向“劳动民主国家”方面演变。

“劳动民主国家”理论既包含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又包含社会革命党纲领的成分。柏林的路标转换派认为，在“劳动民主国家”里，与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相反，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是劳动者——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掌握政权，享受自由和平等。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阶级，甚至没有政党，只有从事不同性质劳动的三位一体的劳动人民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路标转换派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一幸福时代的到来。^①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认为，建立“劳动民主国家”是最高纲领，但

① 转引自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117页。

在实现最高纲领之前，俄国的国家政权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改造。首先要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和非共产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劳动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立群众表达自己意志的组织形式，实行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用劳动民主代替劳动专政”。^①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不能巩固革命成果和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在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以后，用抽象的、松散的、没有阶级和政党的“劳动民主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错误的，极其有害的。但柏林的路标转换派的“劳动民主国家”的思想既反对立宪民主党等极其反动党派用武力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也否定乌斯特里亚洛夫所主张的用和平方法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与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一切右翼政治流亡者不同，他们不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暴力者、篡夺政权的人，而赞扬布尔什维克，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表现了政治上的勇敢精神和对现实历史条件的清醒估计。斯·鲁基亚诺夫1922年写道：“我们认为，执政党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②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赞扬列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在列宁逝世时，《前夜报》出了号外，大字标题是：“列宁逝世了，新俄国的建设事业仍然按照他的遗训继续进行。”该报编辑部文章写道，列宁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将永远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列宁永垂不朽。他们不赞成俄共（布）内部的反对派，认为这些反对派阻止历

① 转引自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118页。

② 同上，第119页。

史车轮前进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承认俄共(布)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这在白俄流亡者诽谤列宁和俄共(布)的情况下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柏林的路标转换派并不同意俄共(布)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俄共(布)之所以得到他们的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共(布)的活动能够保证建立巩固的国家秩序,恢复国家的生产力,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劳动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斯·鲁基亚诺夫1923年说:“对于俄罗斯来说,对于建设劳动国家来说,从俄共手中夺取政权,是最大的不幸。”^①

柏林的路标转换派代表民主知识分子的情绪,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是在革命后俄国的条件下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他们害怕资产阶级复辟,但同时也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追求第三条道路——建立“劳动民主国家”。

在俄国境内也有路标转换思潮,而且国内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潮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国内路标转换派的主要刊物是《新俄罗斯》杂志,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格·列日涅夫。^②他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上看待当前的迫切问题。他于1923年3月创办《新俄罗斯》杂志,他领导的该刊编辑部宣布,它是非党民主知识分子的机关刊物,它标榜自己的宗旨是:创造性地总结过去有益的经验教训,预见革命的未来,作出相应的结论。《新俄罗斯》杂志所代表的国内路标转换派比较倾向于柏林路标转换派的观点,他们主张既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

① 转引自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120页。

② 伊·格·列日涅夫(1891—1955)早年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靠近布尔什维克,作过地下工作,反动时期脱党,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服务,1920—1921年在《消息报》工作。以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和写作。1933年加入联共(布)。

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走所谓的某种第三条道路，《新俄罗斯》杂志创刊号宣称：“不要共产主义俄国，不要白卫俄国，而要第三种真正的俄国。”^①

三 路标转换派产生的影响

路标转换派特别是它的左翼的出现，在白俄流亡者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犹如在一潭反革命死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打破了过去宁静，激起了轩然大波，促进了他们的分化和瓦解。

路标转换思潮符合许多流亡者的情绪，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流亡者的报刊都支持路标转换派。路标转换派的报刊和同情他们的报刊，经常刊登客观介绍国内生活的书信和通讯，刊登国内亲人的来信、文章和著名活动家的公开信，呼吁流亡者返回家园。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流亡者认识到，他们的位置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俄国，他们应该停止任何反对自己人民的斗争。在路标转换派思潮的影响下，大批流亡的知识分子纷纷返回俄国。据统计，1921—1931年回国的知识分子有十八万一千五百人，占流亡者人数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而在1921—1923年回国的流亡者最多。回国的流亡者的成分是复杂的，其中有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等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曾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在七月事变中镇压工人和士兵的李沃夫公爵等极其反动的人。

同时，路标转换派遭到仍然坚持用武装斗争方法在苏维埃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极端反革命分子的疯狂反对。反革命立宪民主

^① 转引自 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274页。

党的《最近新闻报》、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俄罗斯意志报》、白俄分子的《俄罗斯思想》杂志、社会革命党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现代纪事》、孟什维克的杂志《社会主义通报》等流亡者报刊，虽然它们之间也互相敌对，但对《路标转换》文集的评价却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路标转换》文集的出现是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耻辱事件，《路标转换》文集的作者是布尔什维主义政府的走狗和代理人。在这些报刊上，路标转换派成了骂人的术语和叛徒的同义词。这些反动报刊威胁要回国的知识分子说，回国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惩罚和镇压。这些极端的反革命分子甚至还迫害路标转换派及其支持者，迫害争取回国的流亡者。1922年秋天路标转换派的杂志《新俄罗斯》编辑A·M·阿格也夫由于号召返回俄国遭到弗兰格尔分子的杀害。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新闻报》的编辑Д·И·切尔尼亚夫斯基由于主张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而被杀害。

在没有回国、继续流亡国外的人当中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有的则在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例如，克柳奇尼科夫等人是一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很有经验的人，他们经常写文章、发表评论，客观地评述苏维埃政权的合理要求，论证苏维埃俄国在世界上的合法权利，批判白俄分子背叛俄国的行为。克柳奇尼科夫等人积极参加筹备热那亚和海牙国际代表会议，批驳资产阶级和白俄报刊破坏苏维埃俄国国际地位的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言论，斥责帝国主义国家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给他们赔款的要求，反对损害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尊严。《前夜报》写道：“热那亚对于俄国来说不是凡尔赛，俄国代表团到热那亚不是为了去当被告。”^①

① C·A·费久金《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第126页。

四 列宁和俄共(布)对待路标转换派的态度

在路标转换派中，尽管有竭力促进苏维埃政权演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右派和以“劳动民主国家”为政治理想的带有空想色彩的左派，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俄共(布)所遵循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许多积极的因素：

第一，他们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当时任教育人民委员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写道，路标转换派是爱国者，是积极的爱国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但都是以同样的热情关心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路标转换派号召流亡者不但不要妨碍苏维埃政权建设国家，而且要返回俄国去，“不论那里怎样困难，那里是我们的祖国”。他们认为，不管是谁掌权，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给予支持。^①

第二，他们为新生的而又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的苏维埃政权说了许多好话。例如，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说人民不支持苏维埃政权，路标转换派反驳说，这不是事实，人民尽管经常批评苏维埃政权，对它表示不满，认为它不好，但仍然认为它是自己祖国的政权，与它有共同语言，可以合作。^②

第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有技术，有搞经济建设和从事文化科技事业的才能，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这些积极的因素对于面临建设任务而又严重缺乏建设人材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共(布)很注意对这些积极因

^① 参看《路标转换》文集，1922年俄文第2版第156、159页。

^② 同上，第128页。

素的利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在此以前曾经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因此,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① 俄共(布)对《路标转换》文集的出版和传播给以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对于自己的信念和希望表现出动摇、发生深刻转变的标志,是敌人队伍中日益分化的征兆,这是一个新现象,今后还要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路标转换》文集是1921年年中出版的。在苏维埃报刊上,对《路标转换》文集的最早反映是在1921年10月。从10月开始,一直到年底,在苏维埃俄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都指出了这一文集的积极意义。《消息报》的编辑尤·斯切克洛夫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说,《路标转换》文集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他希望苏维埃俄国的报刊予以转载,这样既可以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更好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又可以教育劳动人民,使他们看到由于自己的英勇斗争甚至使敌人营垒中的人都站到了自己一边。

在苏维埃俄国,不仅在报刊上评介路标转换派的文章,而且还允许路标转换派发表讲演,举行讨论会。《消息报》刊登了克柳奇尼科夫等对回国的人的谈话。国家出版社两次再版《路标转换》文集。《前夜报》可自由出售。1922年2月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作出决定说,近期内不准妨碍路标转换派书刊的发行,因为他们在与俄国知识分子上层的反革命情绪进行斗争。根据这个决定,伊·列日涅夫被允许创办路标转换派的《新俄罗斯》杂志。

列宁在利用路标转换派的积极因素方面作出了榜样。他曾高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37—238页。

度评价路标转换派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的活动，向俄共(布)政治局委员推荐克柳奇尼科夫在《前夜报》和《路标转换》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热那亚会议的文章，他写道：“我建议：1. 同我代表团的团员共同讨论吸收克柳奇尼科夫担任专家的问题。”^① 他在1922年2月6日写给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中说：“《路标转换》杂志(第十三期)对热那亚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我们好。要敲打敲打《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编辑们。命令他们从《路标转换》杂志第十三期转载两篇文章，并就热那亚会议的所有问题发表若干水平相同或更高的文章。”^②

苏维埃政权为吸引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利用了路标转换思潮。对路标转换派的反动方面，列宁和俄共(布)则彻底加以批判。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乌斯特里亚洛夫等路标转换派分子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分析。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乌斯特里亚洛夫正在哈尔滨，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一文，发表在1921年4月6日《生活新闻报》上，以后又写了《演变与策略》等文章，一再断言：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苏维埃政权的内部蜕化；“掌权的还是原来的人，但他们本身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革命的黄昏正在到来”^③。他们的结论是：应该支持苏维埃政权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指出，这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这些立宪民主党的大头子，前高尔察克政府的部长们之所以要与苏维埃政权合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踏上了滚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就是要用和平方式得到过去用武

① 《列宁文稿》第4卷第204页。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71页。

③ 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名义下》第44、45页。

装斗争得不到的东西。^①

斯大林也深刻地批判了路标转换派，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都指出，路标转换思潮是日益成长并逐渐同富农和旧知识分子勾结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思想，其内容是：共产党必定蜕化，必定不知不觉地陷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泥潭；^② 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大俄罗斯思想，要建立邓尼金所未能建立起来的东西。^③ 斯大林又说，敌人有两种，一种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这样的敌人，他们竭力想要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另一种是路标转换派这样的敌人，他们主张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使苏维埃政权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④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指出：“一刻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抱着同样的希望，他们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⑤

苏维埃政权的许多评论家当时也揭露了路标转换派的真正本质，特别注意他们的复辟思想的危险性。例如，当时在苏维埃和党内以及科学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弗·伊·涅夫斯基在指出路标转换派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还指出了他们的阶级实质、分析了促使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因素：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已自行蜕化，布尔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2—253页。

②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2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198页。

④ 同上书第9卷第64页。

⑤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38页。

什维克停止了试验,不再相信能实现社会革命。总之,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自己在进行复辟。正是这种看法促使他们认为需要帮助苏维埃政权,以便促进它的蜕化。

关于对敌斗争策略,列宁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路标转换派是从过去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敌人中分化出来的、主张与它和解的一派。列宁把路标转换派与那些仍然顽固坚持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区别开来,把他们作为“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对他们尽量加以利用。例如,《新俄罗斯》杂志作为路标转换派左翼的刊物,当时对于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列宁不同意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在它出版第二期以后就匆忙把它查封,认为查封为时过早,应该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极其反动的、主张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经济学家》杂志,列宁则主张进行无情的斗争,主张把这个“现代农奴主的机关刊物”、“白卫分子公开的中心”的成员全部逮捕起来。^②

列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路标转换派的积极方面充分加以利用,但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了他们企图用和平手段促使苏维埃政权蜕化的危险。他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上万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② 同上,第610页;《列宁文稿》第10卷第225页。

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①列宁认识到这种危险，不害怕这种危险，而是更加提高警惕，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一步一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在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路标转换派比以前更加猖狂地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和俄共（布）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相结合，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俄共（布）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了反对路标转换派的斗争，1925—1926年就取消了他们的讲演活动，禁止他们公开在报纸上写文章，在1926年3月决定查封最后一个路标转换派刊物《新俄罗斯》杂志。从此，路标转换派作为一个派别就不复存在了。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国外一些著作关于 共产国际的评论

夏道源

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历时达二十五年之久。关于它的评价问题，历史学家写过大量专著和文章，众说纷纭。本文拟就列宁领导共产国际时期的三个问题介绍国外某些作者的一部分论点。作者有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有的是参加过共产国际活动而后来被开除的共产党人，有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这些论点都是引自他们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同时期发表的著作，东鳞西爪，很不全面。仅供我国研究共运史的同志参考。

一 关于共产国际成立的时机

西方一些著作的作者研究共产国际问题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认为成立它的时机还不成熟。

法国《东方和西方》杂志的编者拉吉希和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德拉赫科维奇认为列宁在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是“即兴之作”。他们在合写的《列宁和共产国际》（1972年）一书中提出了这种看法。

这两位作者在该书的《即兴之作的代表大会》这一章中，详细叙述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反对成立共产国际的经过，作为他们的论

据。据作者说，德共领导人罗·卢森堡虽然原则上同意列宁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倡议，但她认为当时的时机不成熟，因为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未成立共产党。她主张共产国际应当在各国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否则，它就会流于形式，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对欧洲工人运动发生作用。当时欧洲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罗·卢森堡断定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不幸的是，她在表示上述态度两三天后，就在德国1919年一月事件中被反动当局杀害了。德共中央根据她生前的意见，派了两名代表去俄国参加会议，要求推迟共产国际的成立日期。这两位代表只有一人（叫埃贝莱因）到达莫斯科，另一名代表未出国境就被当局逮捕了。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接见埃贝莱因时，曾想说服他放弃德共的建议，但未成功。接着，列宁在到会代表的预备会上，建议在开幕会上宣布成立共产国际，把这次大会开成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也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声明说，他只能根据德共中央的委托，承认这次大会是一次国际共产党人代表会议。它的任务是讨论以后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否则，他就退出会议，尽管大多数代表支持列宁的提议，但由于他是当时除俄共以外的第二个大党的代表，这次预备会只好按他的要求达成协议。所以，在第二天（1919年3月2日）开幕会上，第一项议程是就会议性质按协议通过相应的决议：“大会确认这次会议是国际共产党人代表会议”。^①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在这次会上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本来要建议在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它。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代表坚持这次代表大会只应作为一次代表会议来开，我们认为暂时同意德国共产党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页。

人的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还要声明,我们以后要为尽快建立第三国际作为正式机构而进行宣传鼓动。”^①

本来按照开幕会上就会议性质通过的决定,共产国际当时是不可能成立的,为什么后来又宣布它成立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列宁坚决要成立它。他在3月3日得到了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在3月4日会上否决了前天会上的决定而通过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才使这次大会变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

作者根据上述事实,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时机不成熟,带有偶然性质,所以称它为“即兴之作”。

有些作者认为西方革命的条件未成熟,不存在成立共产国际的前提,列宁在1919年3月急于成立共产国际,是由于他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当列宁在1918年冬得到德国发生革命危机的消息时,他认为西方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说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②在此情况下,使列宁最感到不安的问题是,他认为西方革命的主观条件还不成熟。他说:“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③而没有革命政党,革命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因此,必须立即成立共产国际,帮助欧洲各国成立共产党,将俄国革命经验运用到欧洲去,准备迎接西方革命的高潮。但是,这些作者认为西方革命的条件并未成熟,否定了列宁成立共产国际的前提。

例如,西班牙的克劳丁(西共中央委员,1965年被开除)在1969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中对西方的革命形势提出了与列宁截然相反的估计。他认为“先进资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1页。

③ 同上书第28卷第96页。

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尚未‘成熟’。这个革命当时仅仅是在敲门，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了，但比列宁预见的要复杂得多。很难设想几十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①

德国的波肯诺（1921—1929年为德共党员，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在他写的《共产国际史》中甚至认为西方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写道：“列宁深知一个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是，他不完全理解西方工人运动的心理。他的反对者说：‘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工会是毫无希望的’。列宁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永远不可能有社会革命’。他（列宁）永远不会承认情况真是这样，因而西方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②

波肯诺在书中表示赞成荷兰共产党人果特关于西方社会革命的观点。果特认为：在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各中下层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西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的人民革命不同，它将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所有其他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将是一个孤立的阶级，非常孤立。波肯诺说：“果特认为西方的社会革命困难重重。列宁则坚信只要有一个采取正确政策的革命政党，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前者的观点显得比后者更接近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果特的观点否定在这一代会发生社会革命，甚至否定它的可能性。事实再一次证明，持悲观论的果特比乐观主义的列宁更正确。”^③

英国的休·塞顿-沃森（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在他所写的《从列宁到赫鲁晓夫》（1960年）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德国在1919年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原因，否定了列宁对德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列宁在1919年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即将取得社

①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3页。

②③ 波肯诺《共产国际史》1938年伦敦英文版第192页。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他认为德国 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相当于俄国 1917 年的二月革命。既然俄国无产阶级在经过八个月的准备和斗争以后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德国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很快取得自己的“十月”革命胜利。但是，列宁的估计没有成为现实。沃森认为，德国当时没有爆发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德、俄两国的情况不同。德国的国家不象沙皇俄国的国家那样脆弱，军事失败没有导致国家的崩溃。皇帝退位了，但官僚政治仍起作用。士兵委员会不是革命机构。它们在德军撤退和复员时同军事当局合作，很少发生骚乱。

(2)在德国没有象俄国那样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准备去接管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这种新机构，并将它们变为自己的专政工具。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没有得到工人群众大多数的支持以前，不愿作任何夺取政权的尝试，他们如果这样做，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德国工人不愿意用武力夺取政权。

(3)在国际方面，德、俄两国处境不同。列宁在 1917 年能够利用人民渴望和平的情绪进行革命发动而不受外国干涉。德国当时却完全受战胜国支配，协约国政府决不会容许在法国边界上成立一个苏维埃德国。

(4)德国左派的队伍没有联合起来，力量分散。1918 年底，斯巴达克派和不来梅左派集团合并成为德国共产党时，未能说服工厂代表委员会参加进来。这是在德国革命紧要关头造成革命力量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克劳丁认为列宁对西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成立共产国际的前提，而这种估计又是同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有机地紧密相联的。他认为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没有对西方改良主义影响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

“深度”作出足够的估计。克劳丁认为这是“理论上有缺陷的症状”；“这种缺陷的根源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垄断阶级的分析”。他认为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多注重于这些矛盾的破坏方面，而很少谈及它们的推动作用”；^①在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看到了战争加速它的作用，但认为“所有这一切结构上的变化总是导致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恶化，并不可避免地令人得出局势是毫无希望的结论”；^②列宁注意到了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意义，但是低估了新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资本主义矛盾的破坏作用；列宁把工人阶级战前在经济方面和工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完全看成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具有忍受某种变化的能力，并能利用它们使经济机构合理化，同时提高它的剥削能力。

克劳丁说：“正是这种分析方法，使他（指列宁）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激进化，并极大地削弱着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影响。”^③克劳丁认为这是造成列宁在1919年对西方革命形势做出乐观估计的根本原因。

总之，上述这些作者都认为成立共产国际的前提不具备，时机还未成熟。

二 关于列宁指导共产国际的战略思想

一些学者在研究共产国际时提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思想的评价问题。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的战略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建

①②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第49页。

③ 同上，第50页。

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当时设想,十月革命会引起欧洲革命,世界革命以欧洲为中心,以西方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东方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为辅助力量。在欧洲当时出现革命高涨情况下,列宁主张西方无产阶级采取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战略和策略,组织无产阶级积极准备条件,用革命暴力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以后,列宁则主张实行退却和防御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组织“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力量,准备迎接世界革命的新高潮。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列宁的战略思想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列宁在逝世前对东方革命抱着极大的希望,把民族殖民地问题提到了决定世界革命前途的战略高度。

许多作者就列宁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

西方有一位德·波尔斯纳(政治学博士)在他写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殖民地问题》(1957年)一书中认为:“共产国际领导产业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族联合向资本主义世界帝国冲击”,“当列宁将这两个方面制订为长期实施的共产主义民族政策时,他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得更远了。他创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各个支部密切协作,因而能够使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战术活动产生一种合力。宗主国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权利进行宣传鼓动,并且积极支持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宗主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就会被殖民地的反抗削弱,甚至遭到毁灭,而殖民地人民渴望自由的要求就会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得到满足”。^①

拉吉希在他写的《共产国际》(1966年)一文中认为,列宁建立的共产国际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方化’”。这就是说,世界

① 德·波尔斯纳《布尔什维克和民族殖民地问题》英文版第270页。

革命以东方为中心,东方革命将比西方革命先取得胜利。他写道:“革命中心转到俄国和俄国变成共产国际的唯一基地实际上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孟什维主义的凯歌重新高奏。既然,尼古拉·别尔嘉也夫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代表‘俄罗斯化和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共产国际的成立就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俄罗斯化和东方化’。本来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为使命的共产国际变成了在落后国家和各大洲夺取政权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三年以前宣布正式解散的共产国际仍然活着,并在继续创造历史。”^①

克劳丁则认为列宁不但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而且把东方革命看成是西方革命的“新序幕”,修正了他们的世界革命“欧洲中心论”。但是,克劳丁认为列宁“着手修正的是世界革命的具体发展过程的概念;首先,在时间上予以延长,以相当远的前景代替一个近在眼前的前景。其次,指出在关键性阶段之前需要一个新的‘序幕’(在列宁看来,这个关键性阶段仍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即东方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

有的作者则提出了否定的评价。

例如,德国的阿瑟·罗森贝格(德共党员,后被开除出党)在他写的《布尔什维主义史》(1934年)一书中认为列宁的战略思想对德国革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认为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实行进攻的战略和策略,是“夸大了欧洲形势的紧张程度”;共产国际在1921年春德国不存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要德国共产党发起“三月行动”,是在列宁的进攻战略指导下的一次“错误行动”。他说:“1921年3月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由于

① 《三个革命的国际(1864—1943)》英文版第202页。

②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第60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夸大了欧洲形势的紧张程度而犯的 错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却没有谈到共产国际的错误,也没有谈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而把‘三月行动’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德国共产党。”^①

阿·罗森贝格还认为共产国际在“三月行动”失败以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德国革命形势的紧张程度”,否定了“德国动荡的社会经济情况仍有导致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府的可能性”。结果,共产国际只许德国共产党执行防御和退却的政策,甚至在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造成德国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也不准德共发动工人用暴力夺取政权,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却又命令它迅速组织武装起义,以致造成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

总之,阿·罗森贝格认为列宁的战略思想是造成德国革命两次遭受失败的原因。

此外,纽约工艺学院的历史系教授赫·格拉勃认为,共产国际从1921年起实行防御的战略和策略以后,就逐渐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他在《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的控制》一书中写道:“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也有惊人的连续性”,“最重要的连续性是在列宁时期,苏联已从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转向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强权政策。由于苏联的国内问题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1921年变成了阴暗的未来,列宁几乎不可能有其他的抉择”;“的确,列宁要外交人民委员部掌握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苏维埃外交策略,准备进行未来的世界革命的任务仍由共产国际承担。但是,即使这样,布尔什维克既控制了前者,又支配了后者,二者合而为一,或者更确切地说,共产国际成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具,只是时间问题。列宁的接班人继承了苏维

^① 阿瑟·罗森贝格《布尔什维主义史》1934年英文版第164页。

埃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利益之间的矛盾”，^①“从1924年起，国际运动的利益和活动主要服从于苏维埃国家的需要。‘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生前已经是一个强制性的口号，现在成了共产国际存在的最大理由。因此，共产国际由于承担捍卫一个遭受孤立的国家，……实际上一定会反对革命，也就不奇怪了。各国党还要准备最终的革命，但是要集中它们的活动来推进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各国共产党人的头等任务是阻止它们的政府采取敌视苏联的行动。只要这些政府对苏维埃政府抱友好态度，各共产党还得支持它们的政府。至于这些政府会压迫它们本国的共产党人，那是次要的问题”。^②

但是，美国的斯蒂芬·怀特在他写的《共产国际和殖民地革命》一文中认为：“共产国际对于制定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指列宁）将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各项任务概括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为殖民地世界制定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战略的尝试，曾经遇到各种困难和难题，并且遭受过各种挫折。不过，首先应当指出，共产国际的政策不管有什么缺点，它是在从事一种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事业。……共产国际的错误正如它的成就一样，都表明了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性质”。^③

三 关于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

一些作者在研究共产国际时提出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组织问题。

①② 赫·格拉勃《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序言》1974年英文版第16页。

③ 《科学和社会》杂志1976年第2期第174页。

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章程》的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共产党”。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在1928年明文规定的共产国际中央机构和各党的关系准则，因此，共产国际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它的中央机构由大会选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中央的领导，遵守和执行它的决议和指示，否则，要受“国际纪律”制裁。各党必须在其机关刊物上登载它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向它呈交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

按照《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它的主要工作由东道国的俄共（布）负责主持。它有权派五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其他十一个至十二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只能各派一名代表，小党也可派一名代表，但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在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又改变了这种组成执委会的办法。它的全部成员名单改由共产国际主席团一次总提名，然后由大会通过。这次代表大会还规定：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权派出特派代表去各支部检查和监督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他们有权参加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同意或否决它们的决议，各党的代表大会必须在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才能召开。

为了防止欧洲各国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加入共产国际，列宁在1920年亲自制订了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二十一条”）。按照“二十一条”的规定，凡是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治党派团体必须在最近四个月之内尽快召开代表大会对“二十一条”表态，并在会上通过清除中派分子和改良主义者的决议，才能被批准加入共产国际。

在组织问题上，许多作者对共产国际的评论特别尖锐。

第一，认为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确定了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导致“滥用权力”，形成“共产国际独裁的中央集权制”。

《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1964年)一书的作者E·姆肯齐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说：共产国际“经常引用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原则和纪律是确定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政治书记处)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基礎。按照这个基本原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任何一个成员党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非常明显的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①

姆肯齐还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滥用权力”和形成“共产国际独裁的中央集权制”。他说：“共产国际为了达到坚定不移地保持整个共产主义庞大队伍的正统状态的最重要目的，显然充分利用了从警告到处分和开除等符合章程的和超越章程的各种手段。某些领导人身居高位时会容许滥用这种集中在中央的权力的行为，当然就不奇怪了。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在本题研究涉及的时期(指1928—1943年)甚至比共产国际历史上第一个十年更加严重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当共产国际许多俄国官员和外国官员在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审讯时期失踪的时候，这种迅速走向共产国际独裁的中央集权制的不祥征兆已经很明显了。上述证据充分说明，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和纪律严格的组织实际上是强迫人拥护它的教条和政策”。^②

第二，认为共产国际由于权力日益“集中到俄国共产党手中”而变成了“扩大的俄国党执行委员会”。

这是英国的E·H·卡尔在《苏维埃俄国史》(1953年)一书

① E·姆肯齐《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英文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34—35页。

中提出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的决议”是“确立苏维埃政权及其缔造者俄国共产党新的威信和支配地位的反映”；“最后使权力更加高度集中到占统治地位的俄国人集团手中，因为这符合提高苏俄的威信和权力与相对地削弱共产国际其他各党的需要。从此以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更能适合苏联外交政策的框框”。作者还强调说：“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发展尽管不是任何人的蓄谋，特别是列宁在看出这种发展的某种危险后曾加以抵制，但是，它实际上是列宁未从舞台上消失的时候出现的，而斯大林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才在共产国际事务中起重大的作用。”^①

第三，认为共产国际特派员是“革命的障碍”，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受到抵制的地方才能胜利。

这是拉吉希在《共产国际》一文中对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评价。他认为共产国际中央的权力过大，派出的特派员对革命起着消极的作用。他说：“他们（指特派员）给外国各个共产党送去了关于列宁主义方法的知识，这对建立一个准备革命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组织非常重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将一套控制制度强加给它们。凡是在各国党的利益同莫斯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它就成了革命的障碍。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被吸收，克里姆林宫的控制立即受到抵制的地方才能胜利（例如，1935年以后的中国和1941年以后的南斯拉夫），这是毫不奇怪的。与此相反，凡是在传授方法和克里姆林宫控制双管齐下而同时起作用的地方，如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革命成功的机会就丧失殆尽。”^②

① 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英文版第3卷第448、451页。

② 《三个革命的国际（1864—1943）》第196页。

第四,认为共产国际实行“二十一条”,造成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分裂,孤立了自己,有利于敌人,导致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

不少作者对“二十一条”的反响特别强烈。波肯诺认为“二十一条”是“世界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使“分裂从偶然事件变成了长久的现实”。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10月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二十一条”,争论以后进行表决,以二百三十六票对一百五十六票通过决议参加共产国际。据波肯诺估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曾发展到八十万党员,但在哈雷代表大会以后只有三十万党员加入共产国际,其余的大部分党员在1922年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并,党员达一百万之多。因此,他认为“1920年10月哈雷大会的主要成就及其后果是大大增强了工人运动的右派”,^①“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为他们(指俄国共产党人)的死敌,从而使自己失去一种国外的支持,而他们要是放弃国际分裂的思想,本来是可以指望这种支持的”。^②波肯诺说:“战前的革命社会党人都认为无产阶级在分裂状态下不能取得胜利”。他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国际一变成长期进行分裂的群众组织,就等于签署了它宣誓效忠的无产阶级的死亡证。”^③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葛兰西认为“二十一条”在意大利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由于“二十一条”指名必须清除屠拉梯等机会主义分子,意大利社会党在1921年1月在里窝那召开代表大会对“二十一条”表态,引起了严重的分裂。表决结果:塞拉蒂派主张有条件地接受“二十一条”,得九万多票;屠拉梯派反对接受“二十一条”,得一万四千多票;博尔迪加派主张立即开除屠拉梯,加入共

① 波肯诺《共产国际史》第200页。

② 同上,第187页。

③ 同上,第17页。

产国际,得五万多票。从此时起,意大利社会党分裂成为三部分,塞拉蒂得票虽多,但被排除在共产国际门外。葛兰西后来在评述意大利社会党发生的这次分裂时曾经说:“反动势力的目的是想把工人们推向他们在资本主义早期看到的那种状态。那时工人们是分散的、孤立的,是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他们没有任何阶级觉悟,也没有夺取政权的任何理想。里窝那的分裂(它使绝大部分意大利无产者离开了共产国际),毫无疑问,是反动势力赢得的最大一次胜利。”^①

拉吉希甚至认为“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要对分裂社会党和削弱左派政治力量的共同战线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在1921年1月所造成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分裂,使工人运动陷于停顿,结果导致法西斯最后取得胜利”。他说:“以为分裂意大利社会党,‘坚决反对塞拉蒂机会主义政策’,支持工人群众的工会及其罢工和反对反革命法西斯运动的斗争,就会使共产主义在意大利变成群众力量,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这种错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②

总之,西方一些学者对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① 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期第20页。

② 《三个革命的国际(1864—1943)》第168页。

人物传记

亚·米·柯伦泰

杨彦君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是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世界上的第一位女大使。

将军的女儿

柯伦泰于1872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父亲米·亚·杰蒙托维奇是乌克兰的显赫的贵族,沙俄的将军、俄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母亲是芬兰的一个富裕的木材商人的女儿,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杰蒙托维奇,与他只生下柯伦泰这个独生女。由于害怕她接受“不良分子”的影响,父母不让她上旧制中学和女子学院,而是通过聘请家庭教师等方式使她受到了中等和高等教育。柯伦泰年青的时候,曾随同父母和同母异父的姐姐出入宫廷剧院、参加宫廷舞会,甚至曾与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桌进餐。这样一位“名门闺秀”后来竟然投身革命,这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追求婚姻自主、同情妇女的命运、接近和了解工人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进步朋友的影响等等。

1889年,柯伦泰十七岁时,随父亲到雅尔塔。在那里,她坚决

拒绝了沙皇的副官、当时最年轻的将军图托尔明公爵的求婚。她说：我要嫁一个我所爱的人，我决不在乎他的地位。两年以后，父亲带着她去梯弗里斯出差。在那里，她认识并且爱上了她父亲的表姊妹的儿子，一个贫穷的下级军官——弗拉基米尔·柯伦泰。不久，弗·柯伦泰来到彼得堡上军官学校，她同他的爱情进一步发展了。但是，父母坚决反对她同弗·柯伦泰结婚；先是不让他上门，使这一对爱侣没有机会接触；接着又叫她的姐姐带她去巴黎，让她的感情淡漠下来。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增添了新的麻烦：她在柏林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巴黎又参加了社会主义者召开的会议。她回国以后，父母拗不过掌上明珠的脾气，只好同意她于1893年春同弗·柯伦泰结了婚。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柯伦泰的第一次婚姻并不美满，丈夫是一个一心想往上爬而且爬得很快的人，可是妻子却日益厌倦贵妇人的寄生生活。矛盾日益尖锐。1895年，柯伦泰已经生了一个男孩，但她感到这个“幸福”的家庭把她束缚起来了，她要求自由，她要冲破这个狭小的天地去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经她老师的介绍，她参加了当时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作家尼·鲁巴金等人创办的“教材流动博物馆”等文化团体的工作。那些团体是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下活动作掩护的。她在那些团体中开始给工人讲课，为“政治红十字会”募捐，并且同被关押在什吕谢尔堡的政治犯建立了联系。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她结识了著名的女革命家叶·德·斯塔索娃等人，在与她们的共同工作中受到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柯伦泰在《自传》中说：1896年是她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她随丈夫一起去纳尔瓦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厂，那里一

万二千名男女纺织工人的受奴役的处境，给她以触目惊心的印象；从那以后，她就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来了。^①同年，彼得堡发生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在斯塔索娃的引导下，她参加了散发传单、募捐等援助罢工者的活动。她说：正是无产阶级的英勇的革命行动“使我坚决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来了”。

1898年8月，柯伦泰决心离开丈夫去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不久之后，她虽曾短时期地回到过丈夫身旁，但是这一对情投而意不合的年青夫妇终于在这年年底或次年年初离婚了，而且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出身寒微的丈夫在追求名利地位的阶梯上步步高升，最后当上了俄军的少将；出身于贵族的妻子却义无反顾地决心去追求真理，终于成了著名的革命家。在苏黎世，柯伦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她在《自传》中说：当时，“我在研究经济规律方面日益深入，我也就随之而越来越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正是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②

柯伦泰去苏黎世大学学习，是慕亨·赫克纳教授之名而去的。她原来读过赫克纳所著《工人问题》一书的第二版，认为赫克纳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但是，当她到苏黎世大学时，由伯恩施坦开始的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各个领域内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股思潮，正在席卷欧洲。赫克纳在《工人问题》的修订第五版中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所宣传的是与伯恩施坦主义同样的货色，他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必须有“批评马克思的自由”。结果，他经常同柯伦泰发生争论。他

① 参看《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莫斯科俄文版第41卷第1册附录第195页。

② 柯伦泰在《二十二人声明》上签名时，注明自己的入党时间是1898年，见《真理报》1922年3月7日。

认为,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已经证明,工人无需进行革命,通过工会和合作社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于是他介绍柯伦泰去英国找费边社的著名活动家韦伯夫妇,请他们指导她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1899年夏,柯伦泰带着赫克纳写的“亲启”介绍信去伦敦,她一见到韦伯夫妇,就感到与他们毫无共同语言,于是她就决定不要他们指导,自己去了解和研究工人运动。她深入工人区和工人俱乐部去接触工人,并且参加工联的会议等等。经过调查研究,她认为:英国现存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改良主义者想用工联主义的策略来医治社会的弊病,是根本行不通的。她决定不再去苏黎世向赫克纳请教了,而于同年秋天回到了俄国。

此时的俄国与一年以前她出国时的情况已大大不同。“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秘密马克思主义联姻的蜜月已告终结”。合法马克思主义已公开转到维护大工业资本的方面去了。修正主义的瘟疫也已传到俄国。在知识分子中,对马克思的迷恋被一种同样热烈的对伯恩施坦的迷恋取代了。柯伦泰刚刚回国不久,在一个报告会上,当报告人——合法马克思主义即俄国修正主义的思想领袖司徒卢威鼓吹伯恩施坦主义时,她即席发言,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作为武器,对这位名噪一时的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她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第一次洗礼。1901年,柯伦泰再次出国期间,在苏黎世结识了卢森堡,在巴黎结识了拉法格夫妇,在日内瓦结识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并且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当时,他们都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给了柯伦泰很大的影响。此后,柯伦泰写了《关于阶级斗争问题》(1904年)、《社会民主党人是什么人以及他们希望什么?》(1906年)等著作,积极参加了反对国际的和俄国的修正主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他指名道姓地痛斥各国修正主义者宣扬“超阶级”的思想、抹煞阶级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谬论。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

远是正统派的学生们的指路明灯，使他们能在最复杂混乱的历史时刻找到接近无产阶级的总的最终目的可靠道路”。^①

柯伦泰对芬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写出了《芬兰工人的生活》(1903年)、《芬兰和社会主义》(1906年)等著作。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芬兰工人阶级的状况，说明在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芬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怎样在芬兰的工业和农业中表现出来。她的这些著作当时就引起了列宁的重视。同时，柯伦泰还进行了许多实际工作，以促进俄国社会民主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联合行动。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

柯伦泰是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03年起，她就经常在工人、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在1905年1月9日那个“流血星期日”，她参加了工人们前往冬宫的游行，目睹了宪兵枪杀工人、妇女和儿童的惨状。随后，她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司库，还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许多秘密刊物的写稿、出版和传播工作，并且到工厂、学校和农村去进行了宣传鼓动。

1905年11月上旬，柯伦泰在彼得堡的一个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列宁，听了列宁的报告。同月中旬，她在《新生活报》编辑部再次见到列宁，转交了党内同志给列宁的信，从此以后就认识了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以后，柯伦泰在两个派别中都有自己的朋友；起先，她的观点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但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她的影响，她没有谴责孟什维

^① 柯伦泰《文章和讲话选集》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6页。

义,而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参加党内的任何一个集团,让党内的两个派别利用我充当鼓动员,去写传单和完成其他日常任务。”^①

1906年,在国家杜马和工会作用的问题上,柯伦泰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分歧。她成了孟什维克的立宪幻想的俘虏,认为国家杜马是能够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的“全国政治中心”。她主张工会脱离党的领导。此外,她赞成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武装起义的错误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因此,正如她自己承认的那样:“1906至1915年间,我属于孟什维克派”。^②但是,在此期间她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流 亡 国 外

1908年,由于柯伦泰进行了把纺织女工组织起来的工作,而且,其小册子《芬兰和社会主义》中有号召实行武装起义的言论,沙皇政府对她提出了起诉。她被迫转入地下,最后,于年底亡命国外。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之时为止,她在海外连续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在国外,她孑然一身,萍踪浪迹,迫害频仍。当她的儿子在假期中去柏林看望她时,竟遭德国政府逮捕,由于威·李卜克内西竭力营救才被释放。尽管在日记中她常常自叹形单影只,但是,她在参加各国的革命斗争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所以,苏联作家埃·明德林把自己的一部描写柯伦泰的传记体小说命名为《四海为家》。在国外,柯伦泰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蔡特金、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饶勒斯等等。她参加了德国、比利时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为鼓动员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

① 《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41卷第1册附录第199页。

② 同上,第200页。

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和美国的工厂、农村、学校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仅仅在美国的四个多月（1915年10月至1916年2月）当中，她就在八十多个城市和工人中心用四种语言作了一百二十三个报告！她参加了组织法国罢工运动、英国争取选举权运动、德国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运动的工作。她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她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此外，她参加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和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会议。她曾被德国和瑞典政府逮捕并驱逐出境。1912年出版的她的著作《在工人的欧洲》，反映了她这一时期的一部分经历和斗争。

当柯伦泰处于孟什维克营垒中时，她支持过取消派，参加过反对列宁的“八月联盟”，而且她的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也带有孟什维主义的烙印。例如，她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言论，就有和平主义的味道，因为她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有到1915年，即她的长期流亡生活快要结束，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时，她的著作和活动才真正闪耀出革命的光辉。这一年，列宁给她写了十来封信。在收入了1914年8月至1917年10月列宁书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九卷中，列宁提到柯伦泰的名字达八十多次！她自己这样写道：“我对于为建设新社会而斗争所作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我的国际的工作，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的宣传鼓动，而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大战年代在美国进行的宣传鼓动。按照列宁的指示进行工作，使左派脱离第二国际，为第三国际奠定基础。”^①

① 柯伦泰《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197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6页。

“走到了阳光下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已成了一具僵尸。普列汉诺夫主张对德国进行战争，号召革命者参加协约国的军队。柯伦泰后来回忆她当时的心情说：那时她还以为可以使第二国际积极行动起来，去反对那场世界性的大屠杀；可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她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她如同在森林里迷失了道路一般。恰恰在这个时刻，传来了列宁的宏亮的声音——她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读到了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特别是明确地指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谁希望和平，谁就应向机会主义宣战，应同妥协主义、同本国资产阶级决裂。柯伦泰懂得了：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革命运动的过去，而列宁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现在和将来，只有列宁才是俄国革命运动的真正领袖。1915年秋，柯伦泰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年我感觉到，同革命派的有机联系紧密了。如同越过了某一条卢比康河一般。”^①后来，她又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列宁的文章把碰破了我的头的墙壁砸得粉碎。我觉得，我从一口阴暗的深井中重新走到了阳光下面，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从此时起，我就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②

在列宁的领导下，柯伦泰为团结国际社会主义舞台上左派的力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她积极筹备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她负责安排列宁和党中央通过斯塔的纳维亚国家

① 转引自莫斯科《新世界》杂志1982年第5期第195页。

② 柯伦泰《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第172—173页。

同国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联系。她积极宣传列宁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观点。她接受列宁的委托写了《谁需要战争?》。这本小册子经列宁亲自审定、修改,用多种语言多次大量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以通俗的吸引人的笔调阐述了列宁的思想。其中说:“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资本家、银行家、地主以及他们的保护人和朋友——沙皇、皇帝、凯撒和部长们、外交家们。他们全是一伙强盗。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是人民需要战争,而是他们的口袋需要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各国工人之间要达成协议,要共同进行反对资本家、争取社会主义社会胜利的斗争。”“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背后。让我们调转枪口,反对我们的真正的共同敌人。”^①

十月革命前后

俄国二月革命后不久,柯伦泰于1917年3月18日带着列宁委托她转交的文章《远方来信》从挪威回到了彼得堡。第二天,《真理报》就刊出了一条消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著作家亚·米·柯伦泰已于昨日从国外回来,她已成为《真理报》的撰稿人。”四天之后,《真理报》就开始刊登她的文章。十多天之后,柯伦泰参加了欢迎列宁从国外归来的动人场面。

4月4日,列宁在一个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的这个计划不仅受到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的攻击和嘲笑,而且遭到季诺维也

^① 柯伦泰《文章和讲话选集》第144、148、153页。

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但是，在4月4日的会议上，以及在4月底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柯伦泰都坚决支持列宁。在10月10日召开的、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非常会议上，柯伦泰也坚决支持列宁。

为了贯彻列宁的伟大计划，柯伦泰领导了四千名洗衣女工的罢工，组织士兵的妻子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把她们的丈夫由帝国主义大战的前线调回来。她深入工厂、农村、兵营、前线战壕和舰艇上去进行宣传鼓动。她成了当时彼得堡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演说家。她为准备十月革命、特别是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化作出了贡献。

这是柯伦泰一生中追随列宁的路线最坚决的时期，也是她的威望最高的时期。她被选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等等。7月初，她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逮捕，9月初，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坚决要求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释放。7月底至8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她正在狱中，但代表大会选举她为大会名誉主席和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那天晚上，柯伦泰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被任命为第一位女部长——国家救济人民委员。1920年她又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柯伦泰在波罗的海舰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时，认识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来的红军将领巴·叶·德宾科。德宾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只有28岁，比柯伦泰年轻17岁。他文化程度很低，但非常聪明能干。两人在共同的斗争中产生了感情。1918年1月，根据新颁布的婚姻法，他们结了婚。但这一对夫妇毕竟年龄悬殊，经历和兴趣各异，而且由于战争环境，他们很少在一起生活。1922年，当柯伦泰在担任奥德萨军区司令的丈夫身边生活时，发现丈夫爱上了一个年轻姑娘瓦利娅。

她开诚布公地告诉丈夫：如果你真的爱瓦利娅，你就同她结婚吧。结果，丈夫马上跑到楼上开枪自杀。德宾科被救活并且恢复健康以后，1923年春，柯伦泰同他离了婚，并且劝说他同瓦利娅结了婚。

争取劳动妇女解放

柯伦泰作为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她说：“我一生都关心妇女和她们的命运，是她们的遭遇推动了我走向社会主义。”她总结自己一生的革命活动说：“我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我在争取劳动妇女解放，争取确立她们在劳动、国务活动、科学等一切领域中的平等权利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①

妇女问题在柯伦泰一生的著述活动和实际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她论述妇女问题的著作足以编成好几卷书。其代表作之一《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1908年）是俄国妇女运动文献史上第二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第一部著作是克鲁普斯卡娅以萨布莉娜笔名于1901年出版的小册子《女工》）。1916年出版的另一本代表作《社会和母亲》，是她在英国博物馆收集的世界各国母亲和儿童状况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六百多页的巨著。

柯伦泰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因为他们企图吸引劳动妇女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她把妇女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她说：“任何政治的、法律的平等，都不能彻底解决妇女问题。只要妇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遭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只要现代的剥削新价值的生产方式继续存

^① 柯伦泰《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第371、364页。

在,妇女就不可能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根据内心的爱慕而选择丈夫的妻子,就不可能成为不必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而操碎了心的母亲……无产阶级妇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摧毁阶级对抗的旧世界,建立另一个美好的、不再有人剥削人的方式的世界。”^①柯伦泰坚决主张对母亲和儿童实行国家保护。但是,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府所做不到的,因为它们一方面假惺惺地保护母亲和儿童,而另一方面却保护置她们于死地的剥削制度。因此,保护母亲和儿童的问题,是同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能离开无产阶级最终目的的实现而得到解决的。^②

早在二十世纪初,柯伦泰就在俄国建立了女工组织。1908年,当政府已对她提出起诉时,她仍然积极参加了全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流亡国外期间,1910年,她参加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同蔡特金一起提出了每年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提案,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领导妇女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书记处的书记。十月革命后,柯伦泰先后担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副书记等职务,写了许多文章鼓励妇女为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同时逐步把自己关于妇女问题的主张付诸实践。她参与起草并且颁布了婚姻法、关于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平等的法令、关于怀孕和产假的法令等等。

柯伦泰写了不少关于恋爱、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等问题的著作,如《两性关系和阶级斗争》(1911年)、《家庭和共产主义国家》(1919年)、《关于婚姻关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提纲》(1921年)、

① 柯伦泰《文章和讲话选集》第80页。

② 参看同上,第162、165页。

《给长上了翅膀的厄洛斯让路》(1923年)等等。她这一方面的著作中有很多正确的见解。她强调两性关系应以互相爱慕为基础,而不应带有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庸俗动机;同时,她反对恋爱至上,反对把小家庭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强调要把恋爱和婚姻与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她说:“旧的理想是‘一切为了所爱的人’,而共产主义道德则要求一切为了集体”;在新社会,“男人和女人将力求不仅在接吻和拥抱中,而且在共同的创造和活动中表达他们的爱情”。^①但是,她这方面的著作带有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例如,她过早地提出了要求消灭家务劳动、由国家养育儿童等问题,而且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家庭不论对它的成员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正在成为不必要的”。^②因此,从二十年代以来苏联就有人批评说,她的这些言论有《太阳城》的作者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此外,她关于两性关系的一些言论也欠斟酌。例如,她说:“爱情是采取长期的和固定的结合形式,还是表现为临时发生关系的形式,对于工人阶级的任务来说这完全是无所谓的。”^③因此,西方的一些人称她为“一杯水主义”的提倡者和“性解放的女人”。后来,柯伦泰自己承认,她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写得不成功或被人误解了。^④

参 加 反 对 派

1918年初,柯伦泰曾领导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出国,因此她没有参加就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开展大辩论的那几次中央会议。但

① 《柯伦泰选集》1977年伦敦英文版第231、391页。

② 同上,第253页。

③ 转引自莫斯科《新世界》杂志1982年第5期第208页。

④ 参看柯伦泰《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第367页。

实际上,她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3月初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她坚决反对批准和约,高呼“革命战争万岁”,说什么“如果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灭亡,别人将举起我们的旗帜”。^①第七次代表没有再选举她为中央委员。大会以后她立即辞去了国家救济人民委员的职务,表示对批准和约的抗议。

在此后四年多的时期里,柯伦泰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她跑遍了俄国的许多地方。她出现在炮火纷飞的内战前线 and 饥饿的工厂、农村,进行宣传鼓动,鼓舞人们同阶级敌人和饥饿作斗争。但是,这个时期,正如1906—1915年时期一样,柯伦泰尽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毕竟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

继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之后,1920—1922年间,她又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的“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她是集中反映该派别错误观点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的作者,是《二十二人声明》上的第二十个签字者,而且正是她拿着这个《声明》到共产国际中去散发,借以“控告”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她不了解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因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反对新经济政策。她认为: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选择一个中间立场的结果,“散发出早就尽人皆知的迁就妥协和机会主义的气味”;^②“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在俄国实现复辟”。^③她要求实行“明确的、毫不妥协的政策,迅速向共产主义兼程前进”。^④她反对党领导经济,认为:“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

① 《俄共(布)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9页。

② 《柯伦泰选集》第169页。

③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67页。

④ 《柯伦泰选集》第166页。

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①此外，她还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鼓吹唯成分论等等。柯伦泰的这些错误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但是，当时柯伦泰的言行中仍有不少正确的东西，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等等。她自己除了书桌纸笔之类别无所求。她由于丈夫的住宅和家具过分豪华而忐忑不安。她为一部分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发生了变化而忧心忡忡。1922年7月，她在奥德萨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人，他在革命的时刻是英雄好汉，树立了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功勋；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成了渺小的、胆怯的人，成了追名逐利、自私自利之徒，他能干出与革命的英雄完全不相称的事情来。”^②她的这个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柯伦泰看问题时往往只看一面不看两面，或者不分主流与支流、把个别当一般，因而失之偏激，走向反面。她根据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个别党员蜕化的现象，得出了党已经蜕化的错误结论。缺乏辩证法，这是柯伦泰犯了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第一位女大使

柯伦泰在党内受到批判，加上同丈夫关系出现了风波，心情十分沉重。她既不便留在奥德萨同丈夫一起生活下去，又不想回莫斯科。当时列宁正在生病，她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党调她出国工作，哪怕是去当塔斯社的记者。1922年10月，柯伦泰被任命为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处参赞。从此她就开始了长达三十年之

① 《柯伦泰选集》第176页。

② 转引自莫斯科《新世界》杂志1982年第5期第206页。

久的外交家生涯。她先后担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的全权代表、公使、特命全权大使等职。1935—1937年间，她以苏联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代表大会及其中若干委员会的工作。从1942年起，她被推举为各国驻瑞典外交使团的团长。她是全世界的第一位女大使，而且，由于她既坚持原则性又善于随机应变，特别是由于她精通多种外语，她被公认为出色的外交家。

经过柯伦泰的努力，挪威是最早承认苏联的国家之一，瑞典同苏联签订了把克伦斯基政府存放在瑞典银行的黄金归还苏联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柯伦泰出色地完成了使瑞典保持中立的使命，并且使芬兰于1944年同德国割断联系，宣布退出战争。

柯伦泰曾经说：“我喜欢重大的、艰巨的任务，但从来不轻视小事情。我在工作中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① 她的外交家生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柯伦泰从十九世纪末起参加革命，是最老的党员之一，是国内外知名的革命家。但是，当一些年纪比她轻得多、入党时间比她晚得多的同志进入了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时候，她却长期在并非苏联外交重点所在的一些小国当参赞、公使、大使。她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兢兢业业地干了几十年“小事情”。在外交工作中，驻在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报刊，她都亲自阅读，亲自摘录。1944年，当时她已过古稀之年了，在同芬兰公使进行的一次长达数日之久的谈判中，她由于疲劳过度，半边身子瘫痪了，但仍坚持谈判，直到取得成功。

1945年3月，柯伦泰已整整七十三岁时，才由瑞典调回莫斯科，担任外交部顾问。1952年3月，她八十高龄时，因血管梗塞而

^① 柯伦泰《关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第370页。

去世。

柯伦泰在她的晚年怀着自豪的心情说：她一生中的第三个贡献，就是1922—1945年间在外交方面所做的工作。

1942年，柯伦泰七十寿辰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她劳动红旗勋章，以表彰她对苏维埃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1945年，由于她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苏联政府交给她的任务，她获得了第二枚劳动红旗勋章。

“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由于肃反严重扩大化，苏联共产党内的第一代著名革命家中，后来没有被清洗和处决的，稀如凤毛麟角，而他们当中做过反对派领袖而善终者，则只有柯伦泰一人。事情似乎有偶然性，但更有非偶然的一面。正如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所说的那样：“她的道路是复杂的。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犯过错误，可是，她正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当做的那样，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①

西方一些人，例如与柯伦泰同时在挪威当过外交官的法国社会党人马·鲍迪认为，柯伦泰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表明：她承认和改正了错误。

柯伦泰在孟什维克营垒中长达八年之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她还是醒悟过来了。当她已经同孟什维克决裂了的时候，1917年6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斗争非常激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她不仅在会上发言，对孟什维克实行反戈一击，而且在休

① A·M·伊特基娜《革命家、演说家、外交家》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页。

息时碰到那位她曾经崇拜过的普列汉诺夫，她连招呼也没有打。

1921年3月，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闭幕后一星期，柯伦泰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下了列宁对她的既严厉又耐心的帮助：“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工人反对派’以一个形成了的集团的姿态行事……匆匆忙忙出版了我的小册子《什么是‘工人反对派’》……我的小册子在列宁手中。他飞快地翻阅着，很不满意地摇着头。霹雳一声，列宁的讲话四分之三是轰击‘工人反对派’和我的小册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过来：‘明白吗？你们干了些什么事情啊！要知道，这是号召分裂。这是一个新党的政纲……何况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是工团主义’。”^①但是，这时候柯伦泰还没有彻底醒悟。同年6月，她又代表“工人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错误的讲话。会后，她又记下了列宁对她的批评和帮助。列宁劝她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列宁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伟大实践会打消她的疑虑。这一次，柯伦泰的认识进了一步，她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悔恨的感觉。她写道：“发言完毕了。我通过会场走向出口。谁也不理我。我知道，一定会这样。不过这是痛苦的。非常痛苦……再没有比同党闹不和更可怕、更痛苦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要发言呢？”^②

苏联一些学者认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921年6—7月间，“亚·米·柯伦泰很快地就同反对派决裂了”。^③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在192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柯伦泰还竭力为“工人反对派”、为《二十二人声明》辩护，

① 柯伦泰的档案材料，转引自A·M·伊特基娜《革命家、演说家、外交家》第106页。

② 同上，第107页。

③ 柯伦泰《文章和讲话选集》第425页。

并且扬言要继续进行斗争。^①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又对她进行了批评，而且大会提出了要开除她的党籍的问题。她在大会上表示了服从共产国际谴责“工人反对派”的决议。只是在此之后，在党和列宁的严厉批评和耐心帮助下，在实践的教育下，她才真正彻底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后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和回忆列宁的文章中都由衷地歌颂了列宁和列宁对她的帮助。在1922年以后频仍的党内斗争中，她没有再站在反对派一边。1926—1927年间，她拒绝了一些老朋友拉她参加托季联盟的要求。1927年10月30日，她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批判托季联盟的文章《反对派和党员群众》，表明她同反对派划清了界限。

^① 参看《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96—201页。

马克思恩格斯与《平等报》

彭 光

一

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经过了几年的白色恐怖,法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复苏了。

法国工人运动再次兴起的标志是1876年10月2日—10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工人运动的再次兴起,迫切需要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由盖得创办的《平等报》便担负起在法国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打下思想理论基础的历史任务。

《平等报》在1877年至1889年中几起几落,总共出版过七次。该报第二次至第六次出版时都在报头上注明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第六辑。第一次和第七次出版没有注明。

1877年11月18日由茹尔·盖得创办并任主编的《平等报》周刊问世了。报头格言是“自由、团结、正义”。报纸的副题为“社会主义共和派报”。报纸的其他主要撰稿人有法国的加布里埃尔、杰维尔、艾米尔·马萨尔、热比耶,^①乌丹等人,后来,维克多·马鲁克

^① 热比耶是保尔·弗雷德里克·日拉的化名。

和夏布里也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国外通讯员有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比利时的塞扎尔·德·巴普；西班牙的艾米尔·迪戎；意大利的尼约基-维尼亚和蒂托·扎纳德利等人。《平等报》周刊每星期六出版，从1877年12月30日第5号始改为每星期日出版。每期十五生丁。报纸每期八版。内容主要有编辑部社论、国内政治评论、有关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连载文章、“一周政治”、“社会运动”、“国外通信”等专栏。在“社会运动”专栏中，主要报道法国各地和欧美各国尤其是英、德等国的工人罢工消息和斗争情况。这辑《平等报》连续出版了三十三期，由于受到政府的禁令而被迫停刊。

第二辑《平等报》周刊于1880年1月21日出版。报头的铭言未变，但报纸的副题却改为“革命集体主义派机关报”。《平等报》与布鲁斯等人主编的工人党的另一份报纸《无产者报》相约，为了避免两份工人报纸之间的竞争，前者每星期三出版，后者每星期六出版。《平等报》前九期每份十生丁，从第10号起改为每份十五生丁。第二辑的内容与第一辑基本相同，但删掉了“一周政治”专栏，另外，从第4号起每月两期在第八版上刊登漫画，以丰富报纸的宣传形式。这辑《平等报》的编辑和国外通讯员的人数大为增加，同时也有一些人员变化。法国：盖得、拉法格、杰维尔、马鲁克、马萨尔、布律涅、费鲁尔、拉比斯基埃尔等；德国：李卜克内西、莫斯特；英国：克雷门特（笔名：J—B—C）；比利时：塞扎尔·德·巴普、阿尔图尔·杜韦尔惹、比埃尔·弗留兹；西班牙：J·M；美国：欧仁·杜邦、阿道夫·杜埃；意大利：科斯塔、尼约基-维尼亚、扎纳德利、纳布鲁齐；其他还有奥地利、丹麦、荷兰、俄国、匈牙利、瑞士、葡萄牙等国的通讯员。《平等报》在国内和国外的影响都扩大了。这一辑仍是每期八版，总共发行了三十二期。1880年8月25日发行最后一号后，由于经费不足暂时停刊。

第三辑存在的时间最长,从1881年12月11日至1882年11月5日,共出版了四十七期。第三辑比前两辑有较大的变化,报纸的副标题改为“工人党机关报”,每星期日出版。除通讯报道外,一般文章皆有署名,而第一、二辑登载的文章都不署名。第三辑初期每期八版,每份十五生丁,从第18号开始改为每期四版,每份十生丁。这辑周刊编辑部的成员较少,仅有盖得、拉法格、杰维尔、马萨尔等人。

第四、五辑都是日刊,出版时间都不长:第四辑(1882年10月—12月)出版了四十七期;第五辑(1883年2月)出版了十期。第六辑(1886年)是周刊,但只出版了一期。1889年2月《平等报》再次复刊。最初报纸经常刊登盖得、拉法格和其他集体主义者的文章,但在同年3月3日报纸的马克思派工作人员与出资办报的企业主罗凯之间发生分裂,退出编辑部,从此该报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二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平等报》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经常阅读。马克思不住在伦敦,就由恩格斯将从法国寄来的《平等报》转寄给马克思。马克思把《平等报》称为“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①马克思、恩格斯对该报寄予极大希望,非常关心它的命运。恩格斯在1878年4月3日致卡尔·希尔施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平等报》了,希望它没有出什么事。”^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平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0页。

② 同上,第303页。

报》编辑部的盖得、杰维尔、拉法格等人称作“这是我们的最优秀的人”。^①

在《平等报》第一辑出版期间，编辑部为准备出一期特刊而特邀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但当时马克思身体情况很差，无法如约撰稿，因此他让小女儿爱琳娜代笔回信表示歉意。^②

恩格斯在1880年2月底专门为《平等报》撰写了总题目为《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两篇文章，^③发表在该报第二辑第7号和第10号上。恩格斯的文章告诉法国工人读者，俾斯麦政府“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④所以在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流行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实现重大的社会改革的观点纯属幻想。

不久，马克思在1880年4月7日的《平等报》上发表了《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⑤马克思在这篇短文中阐明了他和蒲鲁东论战的实质，指出必须用真正的唯物主义学说反对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观点。

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在恩格斯家里，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起草法国工人党竞选纲领。马克思向盖得口授了纲领的理论部分。^⑥马克思以高度概括的语言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称马克思的导言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⑦这个纲领最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的《平等报》上，后来在《无产者报》、《社会主义杂志》上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1页。

② 同上书第34卷第471页。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191—200页。

④ 同上，第200页。

⑤ 同上，第248—249页。

⑥ 同上，第264页。

⑦ 同上书第35卷第224页。

继发表。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去世了。恩格斯不但负责料理丧事，而且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公众阐述马克思夫人在国际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将发表他在马克思夫人墓前讲话的优先权给了1881年12月11日重新出版的第三辑《平等报》。恩格斯在讲话中说：“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平等报》的关系主要是私下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法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盲目地自我陶醉，固执地认为法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圣殿，不愿接受来自别国的思想指导。布鲁斯等人出于狭隘意识，把盖得和拉法格称为马克思的传声筒，甚至有人竟无知地把法国的马克思派叫作“在‘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间谍——卡尔·马克思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间谍”。^②因此，“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③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仅仅与《平等报》保持着私人关系，但他们对《平等报》的影响却仍然是巨大的。1879年初，马克思与盖得建立了联系。马克思在给盖得的一封信中（信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但盖得在同年春寄往伦敦的回信中重复过马克思的原话和引用过马克思信中的观点）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而实现这个任务的途径，就是在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克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开展广泛的鼓动活动。盖得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并将其作为后来出版的《平等报》的主要任务。

从1879年夏天起，盖得开始和住在伦敦的拉法格经常通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3页。

②③ 同上书第34卷第452页。

拉法格经常把盖得的来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并向他们征求意见如何给盖得回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有了一条渠道从思想和策略方面对法国的马克思派施加影响，随着盖得派日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以及拉法格成为《平等报》第二辑的积极撰稿人，《平等报》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日益明显。马克思在1880年11月5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说：“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①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平等报》的成绩，支持该报的总路线，同时对报纸的错误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仅在1882年一年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就近四十次提到《平等报》，其中有不少次是对该报的批评，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这种批评就更为直率。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平等报》在同对手论战时过于急躁，不注意斗争策略。恩格斯曾告诫即将出版的《平等报》第三辑对马隆、布鲁斯之流在《无产者报》上用暗示进行造谣中伤采取不理睬态度，而让对手“自己去碰一鼻子灰”，^②不要公开进行回击，免得被对手利用，“被宣布为捣乱分子、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妄图实行独裁的人”。^③但是第三辑《平等报》复刊后，没有按照恩格斯的告诫去做，结果“他们象小学生（以拉法格为首）一样陷入了马隆和布鲁斯为他们设下的圈套”。^④恩格斯在1882年1月13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们的巴黎朋友现在自食其果了。我们两人对他们所做的预言，丝毫不差地全都应验了。他们由于急躁，把只要他们能够克制和善于等待就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势给弄糟了。”^⑤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0页。

②③ 同上书第35卷第230页。

④⑤ 同上，第34页。

恩也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生气地说：“虽然一再警告，我们的人在巴黎还是上了大当（拉法格和盖得是活该）”。^①另外恩格斯还批评《平等报》说：“此外，他们的论战也是幼稚的”。^②盖得没有抓住若夫兰的要害，因而使自己的论战显得软弱无力；而拉法格的文章则给对手留下了反驳的话柄，显得幼稚可笑。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盖得派看作是反对可能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力，因此当他们看到《平等报》在论战中由于急躁和幼稚，把王牌送给论敌，使可能派的诡计得逞，得以继续欺骗工人时，自然感到十分痛心。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了《平等报》，但在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坚定地站在该报一边的。恩格斯在1882年1月6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既然现在斗争已经公开进行，当然我们完全同情盖得和他的朋友。此外，《平等报》同往常一样，在内容方面远远超过《无产者报》。”^③恩格斯在另一封给贝克尔的信中再次表明态度：“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对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可是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④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平等报》醉心于华丽的革命词藻，空话、大话多，文章不够严谨提出了批评。恩格斯说盖得“有巴黎人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⑤马克思批评拉法格写文章时“总是在增加新的不必要的事端，而且细节可能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总是不得不去摆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发觉他预言说得太多了”。^⑥盖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249页。

④ 同上，第267页。

⑤ 同上，第223页。

⑥ 同上，第38、39页。

的,《平等报》往往教条地、简单地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以致马克思挖苦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平等报》不太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策略地、灵活地斗争,而有时过于蛮干,给资产阶级政府造成镇压的借口。恩格斯说:“《平等报》的粗鲁,看来确实给了检查机关以深刻的印象。”^②马克思批评《平等报》的编辑们说:“如果不是有意毁灭报纸,如果不是指望(这是难以置信的)政府提出起诉把报纸埋葬掉,那么已经是时候了,是拉法格停止吹嘘他在未来革命中必将建立赫赫功勋的幼稚大话的时候了。”^③

马克思指出:《平等报》所以犯了这些错误,“多半是由于无知和想‘走得尽可能远’的幼稚愿望造成的”。^④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平等报》的批评是严厉的,但毕竟是对自己学生的关心和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尽力在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上帮助盖得派和《平等报》,以此来推动法国工人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

《平等报》是法国最先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纸。以该报为中心,形成了法国的马克思派——盖得派。

《平等报》刊登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文章,除前面提到过的四篇专稿外,还刊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同上,第106页。

④ 同上,第319页。

义生产、资本的积累和原始积累的部分论述,^①马克思 1878 年 6 月 12 日《致〈每日新闻〉的信》的全文,^②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序言、导言和第一章第一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的全文,^③以及马克思的《六月革命》的全文。^④

《平等报》诞生后的第一个论敌是蒲鲁东主义。没有哪一个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能象马克思那样全面、深刻地剖析和批判蒲鲁东主义。《平等报》刊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哲学的贫困》部分章节。既作为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武器,又同时向法国工人阶级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正如编辑部请马克思为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而写的《关于〈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⑤

当资产阶级左派共和主义者罗什弗尔在《不妥协派报》上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说划分阶级是人为的区分种姓,拙劣的修辞学家的胡言乱语时,^⑥《平等报》为了捍卫马克思的理论立即给

① 《平等报》第 1 辑第 5、8、10 号。

② 同上报第 31 号。

③ 同上报第 2 辑第 12、14、16 号。

④ 同上报第 29 号。

⑤ 同上报第 12 号。

⑥ 《不妥协派报》1880 年 7 月 26 日。

予回击。1880年8月4日第二辑《平等报》第二十九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阶级》的文章，写道：“我们以下这篇重新发表的文章^①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家卡尔·马克思写的；该文发表于1848年7月28日^②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在科伦合办的《新莱茵报》上。尽管这篇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我们并不期望它会说服那些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的资产阶级不妥协派，也不期望它会使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被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的阶级：不劳而获者的阶级和每天在如苦役犯监狱般的工厂中劳动十至十二个小时而一无所有、饥寒交迫的人的阶级……”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明确写道：“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③文章愤怒地谴责了对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残酷镇压；对那些鼓吹博爱主义的所谓人民代表，马克思回答说：“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④马克思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想蒙蔽工人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分子。

该报除了直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著作外，还由编辑部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单行本和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单行本，^⑤在工人群众中广为发行。

第一辑《平等报》的其他文章很少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这说明法国工人群众还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是团结在《平等报》周围的盖得派也仅仅是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在

① 即马克思《六月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页）。

② 该文写于1848年6月28日，发表于6月29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页。

④ 同上，第154页。

⑤ 拉法格将此书名译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报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受到特别尊重。该报“特刊预告”中公布的特邀撰稿人第一位便是马克思，在布朗基、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当马克思因病不能如约写稿并向编辑部致歉意后，1878年6月16日《平等报》特刊头版上登出启事：“由于卡尔·马克思生病，使我们不能读到本应发表在本特刊头版头篇的文章。我们为读者、也为《资本论》的作者对此表示遗憾，并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祝他早日康复。”

第二辑不但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部分章节，还在一些文章中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或介绍他们的某些观点。这种变化反映了盖得派在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这种文章仅有五、六篇，涉及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仅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六月革命》等几篇。尽管如此，这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成为《平等报》的经常撰稿人，拉法格的加入，无疑推动了该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第二辑第5、6、7号连续刊登的拉法格《进化与革命》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关于宗教的精辟论述、《资本论》对价值形式的分析、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等思想。他写道：“我们在现时的法律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公正观念也是这样。法律关系本身来源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来源于蒲鲁东的双方契约，工人根据这种契约出卖自己的商品——劳动，总是被抢得精光。”^①“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碎包着它的硬壳，即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②他向工人读者指出：生产资料的历史进化使无产阶级不仅可能，而且在死亡的威胁下

①② 《平等报》第2辑第5号。

必须建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第三辑《平等报》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更加明显。第三辑第1号刊登的拉法格《德国社会党》一文中宣布：“第二辑《平等报》宣传和捍卫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明确写入《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在这期周刊上还报道了燕妮·马克思逝世的消息，称她为“卡尔·马克思的勇敢的和温柔的伴侣”，简述了她的生平和葬礼情况，随后发表了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第三辑表明盖得派在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该辑第9号上盖得发表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公开申明：“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最高体现的德国科学共产主义和法国科学集体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辑没有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但引述他们的原话和介绍他们的观点的文章更多了，其中主要是拉法格和盖得的文章。他们两人是《平等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主笔。第三辑第2号刊登的拉法格《资产阶级的政治》写道：“马克思揭示出资本是无偿劳动，对于这一点至今在欧洲和美洲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反对。……这种偷窃就是资产阶级及其道德、哲学、法律和政治建立起来的基石。”拉法格在另一篇发表在第三辑第16号上的题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发现无产阶级苦难的根源的法则并将其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的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或曰资本的利润都不过是无偿劳动。”他告诉读者，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经济法则，最好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三辑发表的其他文章中还揭露了资本家阶级利用恩格斯称为“资本的常备军”的失业工人队伍来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和最大限度地延长工时；引用《资本论》中的统计材料来揭露资本家如何加强工人劳动强度，攫取超额利润。拉法格在1882年1月1日的

《平等报》上告诉工人群众：“任何一个阶级如果自己不去争取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国际章程中首先写下的是：劳动者的解放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

《平等报》在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盖得在一篇批判“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反对革命暴力，鼓吹博爱主义的文章中说，这些人显得好象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并用他们的话来反对我们，如果这些人真正理解了两位导师的思想，他们就应该知道，暴力是社会必需的助产婆。^①

一篇与可能派论战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无产者报》指责我们、《平等报》的人们——他们称为马克思派——放弃了共产主义，因为我们把社会问题看作具有两重性——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由于我们懂得前者决定后者，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最先实现的是劳动资料和工具的社会化。”^②

在论战中，《平等报》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没有写出有份量的、高水平的文章，另外又犯策略性错误，让对手抓住把柄。这说明《平等报》和盖得派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很脆弱。

《平等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有教条主义、简单化的缺点外，它也没有注意全面地、完整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仅仅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

《平等报》并不是一份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它处于当时

① 《平等报》第3辑第9号。

② 同上报第12号。

的历史环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这样的报纸。它并没有对蒲鲁东主义彻底进行批判，只是批判了它在当时已经发展了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荒谬的部分。反映蒲鲁东主义观点的文章在报上也时有出现。布朗基更是成为《平等报》的英雄而风行一时，《平等报》在宣传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时，并未向工人读者指出他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并给予应有的批判，也没有对布朗基派的密谋活动一再失败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分析，使工人阶级得出正确的结论。《平等报》有时对别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也加以宣传，比如它对拉萨尔的思想就很欣赏，给他以很高评价，常常把他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平等报》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正是法国工人运动进入自觉阶段初期时法国工人阶级思想状况的客观反映，新生的法国工人党还处于探索、发现和认识真理的过程，尽管有各种曲折，我们看到他们在向着真理——马克思主义前进。

我们不应忘记，这份历尽艰辛的报纸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初步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平等报》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第一个法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平等报》在这个时期的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回 忆 录

吴玉章同志在苏联与法国

张 报

吴玉章同志曾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数十年，始终不渝；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回忆与学习的事迹，其中包括他于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和法国的工作与活动。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这篇回忆。

(一)在 苏 联

我是1933年在莫斯科和吴老初次相识的。那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的干部学校——列宁学院的中国班学习。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同班的陈郁同志（那时他用“李文”这个名字），在中国班所在地的院子里散步，我看见一位大约五十岁的长者和一些同学在树荫下交谈，气度从容，举止大方；我问，他是谁，陈郁同志告诉我说，那就是最早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的革命老前辈吴玉章同志。吴老的名字我早就听到过并十分仰慕，现在亲见其人，不胜欢喜。不一会儿，陈郁同志走过去，把我介绍给吴老。握手的时候，我对吴老说，曾读过不少有关他革命事迹的材料，很钦佩，希望今后多加指教。吴老听了微笑，谦虚地说，做得还很不够，今后还要和大家一起，并肩战斗；还说，将来要多靠象我们这些青年（那时

我还未满三十岁)继续去闹革命了。当他知道我是一年前从美国到苏联时,他就问我有关美国、美共、旅美中国共产党人和华侨的情况,我都扼要回答了,吴老很高兴。临别时他还说,以后有机会要和我多谈。这就是我和吴老第一次难忘的会晤,他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诚恳谦逊、不耻下问的态度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

吴玉章同志到苏联比我早好几年。南昌起义后,白色恐怖日益猖獗,党中央因吴老公开工作多年,熟人甚多,不便继续在国内活动,乃于1927年底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和工作。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时,吴老因在医院治疗未能参加。1928年,他在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进修,同班有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等同志。在那里,吴老和他们一道与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30年毕业后,吴老被派到远东工作,曾任伯力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主任,次年入海参崴党校。在远东时,吴老积极提倡中国字拉丁化并发起召集远东工人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确定新文字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并创办新文字的报刊,很受工人们的欢迎。1933年夏,吴老回到莫斯科,起初在列宁学院中国班预备班教政治常识和经济地理。不久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委任他为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那时吴老特别喜欢列宁学院中国班的学员们,因为他(她)们是不久前刚从中国革命斗争前线、从中国白区和苏区来到莫斯科的青年同志,所以尽管他在东大工作很忙,却是一有机会就回到列宁学院中国班来和大家会晤交谈。我上面所说会见吴老的情况就是这种难得的场合之一。

在东大中国部,身为部主任的吴玉章同志也是秉着“教学相长”的态度和学员们相处无间,不搞特殊化,不摆架子,不住单房独院而住在集体宿舍,和学员们朝夕共处,打成一片。每日三餐,他都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按序排队,同桌共膳,边吃边谈,从中了解学

员们的学习、生活、思想、健康等情况与问题，并随之采取解决和改进的办法。结果，中国部办得很有成绩。吴老这样坚持深入群众、不搞特殊化、与学员同甘共苦的作风，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此外，那时吴玉章同志刻苦钻研、努力学习、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是使人钦佩的。吴老早年参加革命，可说是革命队伍中的“三朝元老”，在实践中累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然而他并不以此自满，并不故步自封。他不放过任何时机，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特别在他于1927年到达莫斯科后，就尽量利用难得的环境与条件，如饥似渴地、有计划地攻读马列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吴老曾经说：“到莫斯科在我思想上理论上是一大进展……读马列主义书籍后，如得明镜，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我心窃喜从此得到改造，自己对革命更有信心与把握”，还应指出，吴老总是把马列主义的学习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1928年，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时，曾和林伯渠同志一起，利用该校图书馆里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刊进行研究并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小册子。

吴老刻苦学习的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俄语的学习上。当他初到莫斯科时，可说是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但是，既然身在列宁的故乡，学习俄语不只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吴老下定决心，从零开始，要把俄语学好。当然，在莫斯科有优越的学习环境，但是语言毕竟是从从小就学为好，而吴老当时已年过半百，口齿已不如年轻人那样灵活了，加上本人四川乡音很重，也是讲好俄语的障碍。然而吴老并没被困难所吓倒。他曾说，马克思也是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苦学俄语，还取得优越的成绩；自己虽然不敢比马克思，但是相信，只要有决心和信心，总会有所收获的。这样，他在一位俄语教师的指导下争分夺秒，朝读夕温，一本本的俄

语教材在他手里很快就变旧了。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向学校的中国翻译和学员们“请教”，练习俄语，结果进步很快，可说是掌握了俄语的精髓。那时我们在莫斯科曾私下议论说，人们都说王明俄语讲得好，吴老讲得差；其实，王明虽然能在用俄语演说时夸夸其谈，口如悬河，而吴老则不爱出头露面，沉默寡言，但是事实证明，吴老对俄文的理解能力不比王明差，甚至比他强。

在莫斯科，吴老除在学校任职外，有时还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及中共代表团的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七大”，并在会上发言，着重指出在中国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得到代表们的赞许。大家都认为，吴玉章同志曾在国民党活动多年，担任过重要职务，威望很高，应当而且能够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对此，吴老也认为义不容辞，要努力进行这项战略性工作。

(二)在 法 国

三十年代中，为的是要宣传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并于1935年5月创刊。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直接受代表团的领导；但是不便在那里公开发行，所以印刷、发行部设在法国的巴黎。我们在莫斯科把每期报纸编好，打成纸型，航寄巴黎，在那里印好后发行到国内以及海外有华侨的地方。

吴玉章同志那时虽然没有正式参加《救国报》的编辑工作，但经常为报纸提供意见并亲自撰稿。1935年冬，中共代表团特派吴老去巴黎以便在那里加强领导《救国报》的工作。代表团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除由于吴老有卓越的组织与领导才能外，还由于他对

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早在1913年，吴老为着逃避袁世凯的通缉，曾潜赴巴黎，入法科大学。他曾在那里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组织华法教育会，扩大留法勤工俭学会，于1916年秋回国。这次他被派到巴黎，旧地重临，充满着把工作做好的信心；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当他到达伊始，法国当局就来个“下马威”，由阁议通过决定，停止邮寄《救国报》。

当然，这不是针对吴玉章同志而作出的决定，而是国民党当局搞的鬼。《救国报》在国内发行后，大受各界民众的欢迎，产生了巨大影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蒋介石对此又急又恨，乃命令它在巴黎的大使馆向法国政府提出取缔《救国报》的要求，这就是阁议决定的来龙去脉。这事发生后，吴老立即通过法同志们采取紧急步骤，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决定；与此同时，吴老冷静地估计到，要收回明令是不可能的，而且时间紧迫，不能拖延，因此，他与法同志们商量，决定利用法国当局所标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把《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中文只添一个字，而法文却要改几个字），重新立案出版。吴老打电报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征得同意后，即通过合法途径，按照计划向法国政府申请立案，不久后便得到批准。印刷厂的同志们立即把早就从莫斯科寄到的《救国报》第十六期的纸型，换上准备好了的《救国时报》的报头，再加上吴老写好了的《救国报》启事，声明该报因故停刊，一切善后事宜由《救国时报》全权办理。之后，很快就把报纸原封不动地印出发行。这样《救国时报》创刊号（也就是《救国报》十六期），终于在“一二·九”纪念日顺利出版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也表现了吴老当机立断、办事敏捷的优点。

《救国时报》是在莫斯科编辑的，然而它却作为华侨的报纸在巴黎出版，所以应该经常登些有关华侨的报道。为此，曾决定由在巴黎的同志们根据具体情况，及时通知编辑部每期留下一定的篇

幅，以便他们就编写和刊登有关法国和其他地区华侨的消息以及必要的启事、通知等。这样，在巴黎也要有个印刷厂。这个课题，吴玉章同志在赴巴黎之前，就曾协助中共代表团着手解决。他通过陈云同志的介绍，向商务印书馆订购了一套汉字铜模。1936年铜模运到了巴黎，设建了印刷所。从此，《救国时报》增加了有关华侨的消息，而且很及时报道，更受读者欢迎。

应当指出的是：那时法共对吴老本人以及《救国时报》的整个工作始终都给予多方面的、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法共曾指定其中央民族部专门负责协助吴老的活动，并派赫里布和其他几位法共同志参加《救国时报》的印刷、发行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帮助很大。特别在对付法国内阁禁止发行《救国报》的交涉中，在把《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另行立案的过程中，在建立中文印刷厂的工作中，法共同志都及时地和积极地帮助吴老及《救国时报》的中国同志。吴老曾多次赞扬法共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

在吴玉章同志的领导下，在巴黎工作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克服经费不足、报刊检查等重重困难，取得显著的成绩。报纸的发行量由开始的五千份增加到两万份。在国内，除销行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外，在边疆城镇也有不少读者，而且每份报纸都由读者互相传阅，其影响之大，不能只凭份数来计算。在国外，它的发行范围遍及四十多个国家。可以说，《救国时报》在宣传和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的伟大事业中曾起了应有的作用，而这也是和吴玉章同志的努力与贡献分不开的。

在法国期间，吴玉章同志不仅日夜操劳，致力于发展《救国时报》的工作，而且积极参加和领导旅欧中国共产党人、华侨和留学生的活动。1936年初，他在巴黎主持召开中国旅欧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新政策的报告并提

出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会及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具体计划，大大推动了在法、英、德、比等国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工作和互相联系。同年3月，吴老到伦敦参加学联会议，号召联合抗日，共赴国难。随后不久，他又发起声势浩大的、营救由于国民党特务告密而被德国法西斯逮捕的刘光德同志等五人的运动，取得胜利。

那时德法等当局日益加紧对华侨的监视与压制，时有通缉与逮捕；而吴老在巴黎活动没有居留证，是“非法”的，虽然由于他小心谨慎、提高警惕，未露破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为着安全起见，决定把吴老调回莫斯科并派克坚同志到巴黎接替他在《救国时报》的职务。吴老于1936年7月回到莫斯科后，在东方大学任教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编写中国历史大纲一书。

但是，此后不久，吴玉章同志又为国奔劳，回到巴黎。那时我国已开始全面的抗日战争，必须扩大与加强国际宣传的工作。中共代表团又决定派吴玉章同志去西欧进行争取国际援助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吴老于1937年12月到达巴黎后，即积极开展活动。这里，吴老又得到了法共及各界友好团体与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在法国“中国人民之友”所召集的援助中国抗战大会上、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国际援助西班牙大会上，吴玉章同志都作了公开演讲，介绍中国情况，号召各国民众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他还把一些演讲稿印成名为《中国能战胜日本》的英、法文小册子，起了不小的鼓动宣传作用。1938年初，吴老由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电派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吴老这些和其他场合的积极活动收到了实际的效果，西欧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的运动有明显的发展。此外，吴老还经常和旅欧的华侨、留学生进行集体或个别谈话，宣传联合抗日救国。他又曾和当时在欧洲的陶行知、李石曾等知名人士进行合作，开展活动，扩大国际宣传，号召支援中

国抗战。这时吴老已年近花甲，仍然满腔热情，日夜忙碌，可说是席不暇暖地为国奔劳，实在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和国内形势的日益复杂化，我党很需要象吴老这样德高望重的同志回国工作。因此，吴玉章同志根据党的决定于1938年3月由欧洲起程回国，奔向战斗的前方，为党、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继续奋斗，作出新的贡献。

《平等报》发刊词

〔法〕茹尔·盖得

《平等报》无意在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冗长的纲领。报纸的名称已经简单明了地表达了它的要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和完全的平等，事实上的实际的平等，而不再是虚假的平等和法律上的抽象的平等，我们认为，这就是人民政党应该努力争取的主要目标。

《平等报》编辑部由公众已经熟悉其文笔和信仰的民主作家组成。他们致力于宣传正义思想而不计较个人名誉，他们认为不应该以在文章上署名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而这种做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往往把理论之争变成了个人之争，把原则的宣传变成了丑闻的宣传。编辑部成员将同心同德维护报纸的尊严。他们将为本报没有得到平庸的名声而感到欣慰。

《平等报》不仅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的、在宗教上是无神论的，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本报创办人不认为笼统地宣布拥护能够改善劳动者阶级境况的不明确的措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改革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解决办法的时候了，并且其中的一些解决办法已经找到。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象教皇那样统治每个人，也不想用预想的制度来代替科学原理和人民愿望。我们和几乎包括了两大陆无产阶级的所有严肃思想家的集体主义学派一致仅仅认为，人类自然

的与科学的进化正不可阻挡地引导人类实现土地和劳动工具的集体占有。我们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来研究所有社会现象的。

《平等报》不仅限于在每期上发表一系列社会经济文章，这些文章将努力把清楚地阐明科学原理和现时的需要结合起来；它也不会忽略其他方面的消息，以便准确地评价形势。

每周政治简报将使读者了解主要情况。

书刊简介将介绍所有有益于社会科学的法国或国外出版的书籍，不管是朋友写的还是敌人写的。本报将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人物和事迹的著作，关于我们的理论先驱者及其最初实践的专著将努力同官方历史有意歪曲或回避事实的恶劣行径做斗争。

《平等报》对于国外社会运动的研究给予头等重视，因此本报组织了一支国外通讯员队伍，其规模是多年来任何报刊所无法相比的。

为我们撰写德国通讯的将是倍倍尔公民和李卜克内西公民，这两位德国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议员在1870—71年曾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抗议普法战争和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正是他们而不是别人享有组织了拥有十二名议员和五十多万选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荣誉。

本报比利时通讯员是著名的集体主义者塞扎尔·德·巴普博士，他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和关于组织公用事业的报告曾引起极大轰动。

本报意大利通讯员是两位受到意大利无产阶级热爱和尊敬的人：《鼓动家》的创办人蒂托·扎纳德利公民，他在卢加诺进行过出色的斗争，以及纽约基-维尼亚公民，米兰《平等报》的主编，该报至今已发行十四年了。

迪戎公民将为我们撰写西班牙通讯，他是十二月政变后的流放者，1872年由于参加纳尔榜省的公社运动而受到控告，他勇

敢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随后被宣布无罪。

我们的瑞士、英国、俄国、美国通讯员也同样是一些具有渊博学识和坚定信仰的人，依靠他们，我们将会全面地了解国外的整个社会运动，而在国内我们是很难得到这方面的准确、完整的消息的。

我们和法国无产阶级同命运，我们将始终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不管我们对当今工人阶级中某些人吹嘘的万应灵药的真正价值有什么看法，我们仍将以同情的心情研究巴黎和各省劳动群众的各种尝试，并向他们坦率友好地提出我们对其尝试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们的报纸将经常发表各行会和其他工人团体的来信。另外，我们将免费刊登招工和求职启事。

最后，我们不打算用各种杂乱的消息、文学评论、司法报告、戏剧评论之类充斥日报的东西填满我们报纸的版面，但我们保留报道这些方面能够提供材料使人严肃思考的消息的权利，以及详细报道涉及世界各地无产阶级命运、愿望和苦难的消息的权利。

《平等报》编辑部将竭尽全力实现本报纲领。它认为在各种倾向的政治报刊中应该有一份公开的社会主义报纸，它同时又是科学的和战斗的、进行斗争和开展争论的报纸。还是让读者来评论编辑部的想法是否正确吧。

译自《平等报》创刊号 1877 年 11 月 18 日。

（彭 光译）

可能主义

〔法〕保尔·拉法格

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合作社主义和合作社主义者，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而没有进行个人攻击。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也完全一样，它要批判的是可能主义和可能主义者。我们并不想辱骂我们的对手和诋毁他们的名誉，而是要使他们信服。我们不指责他们用报纸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并不害怕他们的思想。相反，我们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使大家知道，并同我们的思想进行交锋。如果人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具有科学价值，就会欢迎别人的批评。

《无产者报》曾认为，把《平等报》称为“战斗的报纸”，就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要感谢它，因为我们一直渴望得到这样的称号。不管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看到，《平等报》将始终不渝地捍卫历次工人代表大会的集体主义理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制和活动家。

对于那些想使工人党放弃集体主义而接受可能主义的人所搞的阴谋，《平等报》曾予以揭露。为了使工人党党员认识到有些人想把党引到何处去，只要让他们读一下布鲁斯 11 月 12 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再论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文就足够了。这篇文章曾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将要对它进行批判。可能派在竖起他们的大旗之前，首先宣布《无产者报》为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以此

表明他们的理论、行动和对集体主义者的攻击是得到正式批准的。

布鲁斯在文章中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是难得的。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和他的伦敦之行曾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到他的头脑里。但是这个根特代表大会(1879年^①9月)上的反集体主义者决不会满足于共产主义者的称号。他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够的，应该实现全世界的、普遍的集体所有制。《平等报》对于他的这种极端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负任何责任，这个荣誉应归于马隆在《不妥协派报》上竭力吹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艾·德·拉弗勒^②。这位被马隆奉为“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把基督教的仁慈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同样认为，只在国家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是非常狭隘的。他在《两大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地球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既然应该取消国与国之间的划分，那么集体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指人类集体，指整个人类。这样，我将是祖鲁人^③和爱斯基摩人^④的财产的共有人，同样的，他们也将是我所耕种的土地的共有人。”^⑤这是范围广阔的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你们这些国际的集体主义者只要求在欧洲和美洲实现生产工具的国有化。而我只是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我要求使北极的冰川和非洲荒无人烟的灼热沙漠都归集体所有！这位口气很大的经济学家是马隆和布鲁斯这两个人的老师。

① 原文有误，此处应为1877年。——译者注

② 艾米尔·德·拉弗勒(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③ 指非洲南部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译者注

④ 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北极格陵兰岛以及哈得孙海湾与白令海峡之间。——译者注

⑤ 见《国际的兴亡》，载于1880年3月15日《两大陆评论》。——拉法格注

而《无产者报》宣扬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的共产主义只是为可能主义铺平道路。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发展过程。

当巴黎代表大会和哈佛尔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决定党应参加竞选斗争以发挥和扩大它的影响时，他们既没有想到要取得竞选的胜利，也没有想到要进行在选举过程中很容易展开的宣传；他们宣布要把马赛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当作党的旗帜，应使这面旗帜在每个选区上空飘扬，并应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而无需考虑在竞选中将会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无产者报》说得很好，它认为“仅仅对党的理想进行描绘……是不够的，甚至也不是十分明智的。还应该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它的思想渗入被压迫的各阶层群众中去。”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竞选运动开始的时候，当需要进行紧张而有效的宣传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将不得不在被压迫的群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在社会改良方面是绝对软弱无力的、并将被证实是一伙江湖骗子的时候，可能派放弃了党的旗帜，或象激进派领导人的喉舌《正义报》所谴责的那样，把“纲领导言中的集体主义”抛在一边。

为什么要回避集体主义呢？《无产者报》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大大超过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只能获得少数人的支持，那么，这些要求是无法得到实际效果的。”因此，《无产者报》建议我们把只能赢得少数支持者的集体主义导言丢进垃圾箱。尽管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自称为极端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证可能派会有所作为，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抛弃了集体主义，如同“茹尔德朋友”的同盟中有些人打趣地说的那样，把它放到2000年去考虑。因为他们并不想“徒劳地踏步不前，或者象关于蓝胡子的童话中说的那样住在空想之塔里，永远也看不到具体的、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出现”。

《无产者报》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因为它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太狭隘了。但是，尽管它是狭隘的，却同时又显得过于广泛了，以致不能把很多战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请看看选举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者报》抛弃了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而想代之以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在下一期《平等报》上我将要论证这种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同实现北极冰川的国有化一样是不可能的。由于《无产者报》一心想取得可以感觉到的结果，因而将把它的极端共产主义的愿望限制在资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即股份公司的范围之内。促使《无产者报》朝这方面发展的人就是沙·利穆津先生，他大概还是马隆的“挚友”。顺便说一句，在经济方面，他比马隆-布鲁斯这两个人懂得多一些。不过可能派当心自己遭到与甘必大一样的命运，他为了成为可能，在十年内一直实行机会主义政策，但最后却成为不可能的了。

为了成为可能，《无产者报》把集体主义说成是一种空想。不仅如此，它为了使人们对集体主义产生反感，还责难集体主义将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十年来一直使我们大伤元气的血腥屠杀”。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可怜集体主义！但是，如果说要把三月十八日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是自治主义的、市政主义的和联邦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要为起义的失败承担责任。

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由于已经与巴黎的历史传统决裂，因而决不会宣布巴黎公社^①。因为他们懂得巴黎不能陷于孤立状

① 巴枯宁是马隆和布鲁斯从前的导师，向他们传授了无定形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则一直是他的传声筒。巴枯宁在1870年《致一个法国人》一书中，陈述了自治主义革命的计划，要“起义的首都按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等等”。——拉法格注

态，否则就会象 1848 年 6 月一样被外省打垮。而且，只有整个法国都获得解放，巴黎也才能得到解放。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要求的不是巴黎的公社，而是巴黎的法国。他们不会尊重法兰西银行的自治，而是要夺取它的全部金子，以收买凡尔赛分子的将领。他们决不会使工人们及其家属以及在起义中捐躯的战士的孤儿寡母在贫困中度日，而要征用资产阶级住宅，以便使他们住在人应住的地方。

但是要指责公社领导人未采取这些能够使三月十八日起义获胜的革命措施，这会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本世纪开始的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尚未达到这样高的阶段，到那时，用集体主义解决社会问题不再是伟大人物的天才发现或者说受尽苦难的群众情感上的愿望，而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明摆着的。

工人群众在 1848 年由于受到当时很多社会主义流派宣传的影响，抱着很多的共产主义的愿望。而在帝国时期，他们由于受到蒲鲁东思想和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及联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堕落了。领导国际巴黎支部的朗格卢瓦和托伦之流如同可能派想要否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一样，抛弃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时刻准备响应革命号角召唤的巴黎工人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勇敢地献出了一切，他们对运动没有给予任何领导，而是盲目地追随蒲鲁东主义者贝累^①之流和很会装腔作势的皮阿^②之流。

① 沙尔·贝累 (1795—1878)——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和英国。——译者注

② 费里克斯·皮阿 (1810—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译者注

正因为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没有忘记5月的流血日，所以他们对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和联邦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由主义的词句深恶痛绝。他们继承了国际的集体主义传统，并认为，使工人阶级背离它的最终目的即实现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就是背叛它的利益。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昏昏欲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革命。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受到震动，发生动摇。三十年内铁路的发展不是打乱了城市和乡村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关系吗？我们在第一期《平等报》上指出的从里昂开始的金融危机不是波及巴黎、柏林、维也纳、法兰克福、日内瓦和伦敦吗？这场危机不是把成千上万的资产者抛入了无产阶级的苦海之中吗？它不是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吗？在政治界如同经济界一样不是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吗？

欧洲工人革命的形势逼人。它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传播集体主义思想，以便有一天使每个工厂的工人不需要什么口号就知道他们应干些什么，并永远仿效圣亚田工人在1848年做出的、令人难忘的榜样，那时，圣亚田的工人驱逐了老板指定的工头和工程师，在没有厂主干涉的情况下，经营开发煤矿。

译自《平等报》1882年2月5日。

（陈双范译 辛庚校）

财 产 公 有^①

〔德〕卡·沙佩尔

伟大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两条尖锐对立的原则，即贵族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将开赴战场对峙，开始一场殊死的斗争，只有其中一方被完全消灭，斗争才将结束。

在这以后，不是人类变得自由而幸福，充满人的尊严和喜悦感，互为兄弟，互为同一父亲的子女，人人相爱，便是——想起来就可怕——只有主人和奴隶，皮鞭把最后一个竟然还敢于认为自己也享有权利的呻吟者打至缄默。我们目前最神圣的职责，是使我们这些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盟员的人为伟大的民众觉醒时期的到来作好准备，以免对这个时期的到来感到吃惊，以便知道该把什么东西打碎，如何以其他的方式更好地建设。

不要以为我们会犯许多正在从事建立一个未来的共和国的爱国者所犯的错误，而不为革命的发生做些工作。不会的。我坚定地认为，在我们全部计划中斗争占第一位，我们将带着武器和敌人对峙。但十分必要的是，我们要认清和坚持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要知道我们打算干什么，以免在战斗结束时，在我们为祖国和自由

① 这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卡尔·沙佩尔在1838年正义者同盟制定纲领的讨论过程中写的。这是一篇尚未写完的文章手稿，在沙佩尔1839年因参加四季社起义被捕后为法国警察当局所没收。1963年，沃·施德尔将这篇保存在巴黎国家档案馆的手稿第一次发表在沃·施德尔《德国工人运动之始》一书中。——译者注

流了鲜血之后，披着羊皮的狼从它们在报警的钟声四起时隐藏起来的角落里爬出来，用花言巧语从人民那里骗取人民花了极高的代价换来的权利，以免我们摆脱了专制者的奴役之后又受金钱贵族和精神贵族的奴役。这两种奴役同样可恶。因为富有的利己主义者仅仅按人的财产来评价人，利用劳动阶级为他服务，并折磨他们，直至他们过早衰老，丧失劳力，然后，只要无损于他的钱袋，就把他们一脚踢开，无情地让他们死于饥饿和困苦之中。精神贵族虽然想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妨碍他们从事科学工作的重负，但他们不考虑人民，以为他们装满书本智慧的大脑比别人好一些，力图代替专制者给人类制定法律和统治人类。他们不希望人民完全自立，他们也不想劳动，只想让人民去劳动，以便只有他们才有聪明才智，能够更顺当地牵着人民的鼻子走。金融贵族到处可见。在我们富裕的师傅和工厂主身上我们工人每日都看得到他们。金融贵族我们太熟悉了。当他们在德国吵吵嚷嚷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要发动一场斗争来使自己扬名天下。但是，只要联邦议会发几道威胁性的训令，他们马上就沉默不语，表明自己是安分的仆人了。因此，不要以为我们仅仅要进行反对各邦君主的斗争。不是的，我们还要进行反对上述金融贵族和精神贵族的更为艰苦的斗争。这是更为危险的斗争，因为这些人不是明火执杖地来掠夺我们，而是力图通过贿赂和阴谋夺走我们以血换来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同这些人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确定我们坚信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基本原则，然后不左不右，不受这些人的叫嚷和诱惑干扰，开始从事我们伟大的事业。我打算把我坚信能够最容易最可靠地实现人类幸福的原则阐述一下。我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我将在伟大的斗争中捍卫它，直到最后一息。

我的坚定而热忱的信念是：只有当所有的人按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联盟中，所有的人对于占有和享受土地上的财富享有完全

的权利，所有的人平等地以任何一种方式为创造和保持大家共同的福利而劳动时，也就是说当实行财产公有时，人类才真正达到自由和幸福。只有这样，自私自利这个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才会被消灭，所有的人才会把自身看成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并尽力促进相互的安乐。

财产公有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保留个人财产，那么穷人将由于现在的财产分配极不平等而完全依附于富人。这样一来，法律在一个贵族共和国里会使富人享有比现在更多的自由，他们仅仅通过商业和手工艺就可以发财致富，并且越来越富。而民众最终只能干活谋生，并且必然成为他们富有的主人的奴隶。

如果想通过累进税或其它遗产法防止攫取过量的财产，那么利己主义者用阴谋和欺骗仍可以攫取多得多的财产，生活得更好，劳动得更少，并且迟早从他们中间将产生一个专制者，把人类拖回到人类当今所处的状态。除恶务尽，要除根而不能只断枝，否则恶会更加滥发丛生。

所有的人都必须平等劳动，又都有享受所创造的财富的平等权利，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劳动，从事某一生产或保存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物品的行业，那么他对于共同福利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生命就象钟表，即使缺少最小的齿轮，也要停止转动。同样，一个最小的行业如果停顿，我们就要吃苦，就不会有真正的福利。既然所有从事生产和保存物品的行业对人的生活都同等必要，不可缺少，那么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就应该具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如果有人声称因为我做了这件或那件工作，我就要比其他人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占有得多些，那是一派胡言乱语。

但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因为我们的口号是“劳动才能享受”。

我们不要游手好闲之辈。

人类的敌人发明了个人的财产，发明了金属货币。自私与妒忌怂恿着人们，一些人想比别人多享受，多占有，强者压迫弱者，剥夺弱者的财产，强迫和哄骗这些弱者帮助他们再去压迫他人。

压迫多数人的的人自称为君王。随着他们的出现，权利、自由与平等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人类的守护神用手掩上了流着眼泪的脸庞。从这时起，兄弟阋墙，民族相逼和交战，无非是为了靠损害自己的同胞而更多地占有，更多地享受和更少地劳动。

君王们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利害冲突，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众人相争，我收渔利。

以往，他们卑劣的企图总是得逞。但考验的时刻将过去，自由的曙光将升起。人类必将互为兄弟，相亲相爱。暴君将要灭亡。

勇敢地前进吧，为了自由奋战的男子汉！我们美好的事业必将胜利，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战士投身到战旗之下，准备参与争取权利的斗争。财产公有制过去由于君主的产生而崩溃，但是，只要看看近年来主张财产公有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谁会怀疑它的实现呢。财产公有同其它所有的美好事情一样，会得到人民的迅速拥护。财产公有制的产生并不象许多人所想象和它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距离我们甚为遥远，因为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有人开始实行财产公有的原则了。在那里，许多团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联合成一个联盟，实行完全的财产公有制；在那里，不时出现一些大人物，他们几乎把毕生都献身于财产公有制的原则，为其实现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这些团体明显地表现出勤奋、守秩序、博爱和节制的优点，仿佛它们就是一所财产公有制的学校。人民的敌人千方百计给它们制造麻烦。这些团体的成员从敌人那里根本听不到一句好话，更不用说从他们那里听到有人要加入了。但这些团体取得了极大的

进展，特别是在劳动阶级中。

财产公有制的敌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实行财产公有制方面只要开了个头，人们亲眼看见它有那么多的优越性，就会全都立即表示赞成，他们的统治也就完了。每个人肯定都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团体中，在那里，人人劳动，但比现在劳动少，而享受比较多，比替富有的游手好闲者劳动，增加了他们的财产，自己却难以糊口要强。如果财产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它的反对者就不会那么起劲地反对了，他们会袖手旁观那些推行者的奔忙，并加以嘲笑。对手强，人们才会去找对付的手段，对手弱，嘲笑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法国政府禁止裁缝联合会联合成一个联盟，实行财产公有制呢？因为他们害怕大家可以马上认识到这种联盟的优越性，他们的统治就完蛋了。

在德国，为什么反驳圣西门主义得奖赏，而赞成圣西门主义受迫害呢？因为圣西门主义宣传财产公有制，各邦政府惧怕德国人看到它的益处，以后不再为君主和王室人员的穷奢极欲卖命，而为自身的福利劳动。

但是，尽管压迫者一味禁止，善和真理将一定胜利，财产公有制将同民主共和国一起诞生，因为它有利于最广大的民众，所以它的好处民众很容易看到。

如果有人说，财产公有制好是好，但目前行不通，因为人民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那是完全错误的。人民从来就是成熟的，只要有人把财产公有制的好处给他们明摆出来，他们就能认识。我们只要看看，这一思想在六年前连想也想不到，现在却已经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在劳动阶级当中取得巨大的进展，就可以知道人民是成熟的。

只有富人和吃俸禄的阶级会灭亡，因为在财产公有制度下他们同样地必须劳动才能享受。所以他们竭力反对这种制度，利用

他们在财产和地位方面占有的优势施加影响。但正因为有财产公有制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我们最高的职责，我们认为是神圣的职责，是以最大的热情为实现财产公有制而努力，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这种努力。如果我们不为此努力，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座大山把两个地方隔开。如果挖通这座山，使这两个地方联接起来，方便这两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认为很好，但又认为工程过于浩大，办不成。不过有几个人没有被吓退，他们勇敢地开始了工作，并且要把别人也吸引过来，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工作取得的进展，使众人相信能把山挖通。后来众人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项大工程很容易就完成，给大家带来了方便。这两个地方就象是被一座自私自利等恶习堆成的大山隔开的人类。许多人认识到，只有打通这座大山，人类才会幸福，但怕工程浩大而退缩了。而我们，同盟的兄弟，已经毅然献身于我们所追求的事业，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在这一事业中努力奋斗，只有这样，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会实现。

如果我们要问，当某一次革命公开主张财产公有制并着手实施时，谁会投赞成票，谁会投反对票，那么，每个人都相信，凡是从实行财产公有制中受益者都会投赞成票。只要他们确信可以得到好处，他们就会投赞成票，这些人就是占人口大约十分之九的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阶级。

受损者会投反对票，只有少数人例外，这少数人道德十分高尚，愿为全人类牺牲个人的利益。所以诸侯连同他们的趋炎附势者、官僚阶级、食利者和富有的工厂主会投反对票，而他们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人是受益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当中做工作，就是在人民当中做工作，他们是最无瑕、最强大、具有最健全的理智的

一部分人类。一旦这些人认识到财产公有制的优越性，只要爱国者热忱地工作，那是不难实行的。所以，财产公有制将很容易实行，而又不遭到反抗。那剩下的十分之一的人，如果他们能幸运地在革命中免遭人民的报复，为了不致挨饿就得移居国外或参加劳动。

我们对那些受损者毫无办法，我们无法说服这些冷酷的利己主义者投赞成票，就是说，用和平说服的方法，上帝来做也不灵。基督就是我们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来造福人类的第一个共和派和高尚的先驱，他早已有言在先。曾经有一个富人是基督的信徒，他说：“主啊，我已遵守了你的全部诫命。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做到完全信从你呢？”基督回答说：“变卖你的财产，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富人听了，就忧愁起来，转身走了。基督指着他的背影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看，他走了，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觉得舍弃他的钱财太难。是啊，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国还容易呢。这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也比富人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和加入我们的博爱之国更容易。

留心读一读《圣经》就会发现，基督打算建立的正是一个博爱之国，并为此在人民中寻找信徒，因为富人和学者自然是不赞成的。他打的一个富人办喜庆筵席的比喻证明了这点。这个富人邀请那些他认为能认识和理解他的原则的朋友来。可是他们不来，办其它事去了。他们自私，把他们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前。于是他打发仆人去请人民，结果，所有的桌子坐满了客人，他们穿着喜庆服装，对美好事业怀有纯洁的意念和坚定的勇气。而那位不穿喜庆服装，存心不良地要趁机谋私利的人则被逐出门外。

从基督的教诲中我们最能为我们的原则吸取东西，最能对人民施加影响。人民正确地视基督为他们的拯救者，但由于教士们玩弄了种种诡计，拯救者的意义变了，不是他原先所想的意義了。基

督大概认识到有人由于无法消灭他的伟大学说而采取种种狡诈手段加以歪曲，就要他的门徒警惕那些在他之后到来的企图伪造他的学说的披着羊皮的狼。

基督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信仰他的原则而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走遍世界，到各族人民中去，宣传和全力帮助建造基督已用他的学说奠定了基础的博爱之国。

实行财产公有制是否需要巨大的精神准备呢？

哪里充满诚实、正直和博爱，那里就不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准备。朴实和正直是建立这个体系唯一必需的。而后，教育将逐步地获得比现在远为迅速的发展，而不象现在这样被人忽视。可惜人类社会现在已深深地沉沦下去，因此，即使不是使它从沉沦中奋起而只是使它不致继续沉沦，也需要有精神准备，需要有道德力量。

我们所有的人现在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目前社会生活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不再有能力去建立任何一种财产公有制的联盟，而只好用说服和示范的方法引导我们的后代去这样做。这就无论如何需要有教育和道德力量，来使他们的欲念和需要必须服从共同的福利。

革命将是长期的，正因为如此，教育和道德力量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革命结束以后，还是在革命当中，那些促进革命产生的人们要具有充分的教育和道德力量，才能使革命有稳固的基础，才能向人类表明革命是造福人民的。

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在革命开始时就得马上表示赞成，这是否合适？

[文章提纲残稿]^①

① 下面的问题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显然是文章的一个未作进一步阐述的提纲

——译者注

5. 实行财产公有制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准备吗?
6. 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在革命开始时就得马上表示赞成, 这是否合适?
7. 如果开始时能成功地获得武器, 是否应该处处都用暴力来实行财产公有制?
8. 如果未来的胜利使实行财产公有制有了保证, 那么, 应当首先在哪些国家公民当中实行?
9. 在工人当中哪些阶级是最不可缺少的?
10. 哪些人是不可缺少的?
11. 哪些人是无用或是有害的?
12. 在财产公有制中可以有个人财产吗?
13. 艺术和科学会因此繁荣还是衰败?
14. 哪些公民在劳动和生活享受的分配中可以受到照顾?
15. 可以暂时不准哪些成员享受财产公有制的福利?
16. 以后哪些恶习将从社会中消失?
17. 何种共同劳动的分配方式对个人的自由是最合适的?
18. 用何种方式可以实现生活资料以至全部需要的平等分配?
19. 国家赡养所有不再能劳动的人吗?
20. 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有同等的享受吗?
21. 勤奋和熟练的人享有什么报酬?

译自《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汇编。第一卷
(1836—1849年)》1970年柏林德文版第98—107页。

(赵小军译 闻 坚校)

热月的道路*

〔俄〕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

在喀琅施塔特叛乱时期，某些居住在巴黎的俄国人评论家开始谈论起“俄国的热月”。巴·尼·米留可夫的《最近新闻报》甚至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来确定目前俄国境内进行的过程与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之间的相似点。

这些相似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什么叫“热月的道路”？

热月政变是法国革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革命曲线开始下降。热月政变的道路是心灵演变的道路，它伴随着所谓无关重要的“宫廷政变”，而这种政变在形式上又是在革命权利的范围内实现的。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热月政变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恰恰也就是革命法国整个风格的改变和由它而决定的雅各宾主义及其“一帮”的演变。而9日流血事件（罗伯斯比尔的倒台）无非是细节或偶然性，这些细节或偶然性也可能不发生，它们丝毫无损于各种历史事件的必然的和预先注定的联系。

拿破仑对马尔蒙^①说：“如果罗伯斯比尔保持住政权，他会改

* 这是俄国路标转换派代表人物之一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载于1921年6月《生活新闻报》，转载于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1925年又收入作者的《在革命的名义下》文集。热月即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至8月18日。在1794年7月27日（共和2年热月9日）在巴黎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推翻了雅各宾专政，把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处死，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译者注

① 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马尔蒙（1774—1852年），法国元帅，曾参加过拿破仑的远征。——译者注

变事件的面貌；它会恢复法律的王国；人们取得这种结果不会经过震动，因为这是通过政权的道路取得的。”

拿破仑的这些具有独创见解的话，直观地认识到了后来历史学家揭示和详细证明了的真理。热月9日不是新的革命，不是用革命的手段消灭革命。这仅仅是革命过程发展的一个次要的和“平常的”因素。

拉马丁^①在自己的名著《吉伦特党人》中关于罗伯斯比尔写道：“他为一些比他强、一些却不如他的人所战胜，不幸在恐怖结束之日死去，致使他得为他要禁止的死刑的牺牲者的流血承担责任，致使他又遭到他要拯救的已被处死的人的咒骂。他被处死的日子可以看作禁止恐怖的日期，但不能看作禁止恐怖的原因。如果他胜利他也会禁止死刑，正如他被处死后死刑被禁止一样。”（《拉马丁文集》第4卷第61章）

雅各宾派没有垮台，——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蜕化。大家都知道，雅各宾派长时期地经历了热月事件，——开始是作为政权，然后是作为有影响的政党；——拿破仑本人就是来自雅各宾派。罗伯斯比尔是被他自己的朋友除掉的，他的这些朋友在残酷和残忍方面总是超过他。如果不是他们把他除掉，而是他把他们除掉，甚至他们与他一起和谐共事，其结果都是一样，革命浪峰达到最高点以后就要开始下降……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的不幸日子里，波尔多的血腥特使塔利安^②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向他挥舞着短剑，喊道：“我们不是温和派，但我们不想使无辜者受到压制。”山岳派热烈地欢迎这一声明

① 阿尔丰斯·拉马丁(1790—1869年)是法国诗人、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② 塔利安(1767—1820年)是法国政治家，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成员，雅各宾派，后来是热月政变的首领之一。——译者注

及其同时作的手势……

请看热月政变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科洛·戴尔布瓦^①生活当中的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富吉耶-丹维尔(恐怖时期的著名检察官、“共和国的斧头”)被叫到公安委员会。科洛对他说：“人民的感觉开始迟钝起来。应该通过更威严的场面使它振作起来。请下达这样的命令：现在一天要杀掉五百人。”后来富吉耶-丹维尔承认：“从那里回来以后，我毛骨悚然，我象丹东一样感到血流成河……”

关于热月政变的其他英雄：巴莱尔、维伊奥-瓦兰等，我也可以列举许多类似的故事。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制造流血事件的能手和行家。但正是他们成为慈善事业的违心的代表，成为被压迫的无辜者的捍卫者！……革命就如同萨图恩^②一样，吞吃自己的孩子。但它也象皮格马利翁^③似的，把自己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倾注到他们身上……

是的，是这样。革命在实现自己的思想、完成自己的苦难历程的同时，出色地耍弄了自己的英雄。把革命极大“加深”的人们打败了革命的多头蛇，以同一个革命上帝的名义消除自己所干的事情……蛇螫了自己的尾巴，盘成一个圆——完成的象征。

索列尔^④对热月政变的实质作了这样的概括：“人性和温情回到了革命中间。”但是，这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标志反革命分子的胜

① 科洛·戴尔布瓦(1749—179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开始是雅各宾派，后来参加热月政变。——译者注

② 萨图恩即古罗马宗教的播种神，他活生生地吞吃自己的孩子。——译者注

③ 皮格马利翁即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善雕刻，热恋自己所雕的少女像。爱神见他感情真挚，就给雕像以生命，使两人结为夫妇。——译者注

④ 考尔日·索列尔(1847—1922年)法国社会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利。“看来，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革命巩固了。法国人在要摆脱恐怖主义者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把自己交给流亡者去控制。这伙流亡者的名称本身以及领导他们的那些贵族的名字，对于多数法国人来说，仍然表示恢复旧制度和被外国人奴役。流亡者唤起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这一最美好的感情和个人利益这一最永久的动机，去反对他们自己。”（《欧洲和法国革命》第4卷第4章）

革命一方面保持自己原来的面貌，一方面正在蜕化。它的缺陷已经过去，它的“要求”和极端手段还要继续下去，它的具体“成就”使现在有了牢固的基础。“战胜外国人，享受独立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全民族所向往的坚定目的。革命正在寻找自己可以达到的任务。

但使革命全面“加深”的旧形式在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保持，虽然支撑这些旧形式的精神已经消失。革命在演变。泰恩^①这样描写这个时代：“在血迹斑斑的教堂里，在空荡荡的祭坛前，人们还在朗诵共同的信条和高唱一般的赞美歌，但信仰已经丧失了……”而雅各宾派本身正在逐渐抛弃正统的雅各宾主义。“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他们离自己所作的祭祀一月一月地越来越远……在热月政变之前，官方语言用教条的华丽文体，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真理的呼喊，国民公会中的任何一个职工，由于囿居于自己的小教堂，都只能清楚地看到他个人所亲自参加的人类祭祀。热月政变之后，被杀害者的亲人和朋友、无数的被压迫者，都断然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不得不目睹他自己以投票同意或否决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参加的可怕行为的一般情况和具体细节。”（《现代法国的起源》第4卷第5章）

革命的低潮开始了。它变得不那么宏伟了，但正因为如此，国

① 伊波利特·阿道夫·泰恩（1828—1893年）是法国哲学家、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家也不承担那么重的负担了。“平原派”和“沼泽派”的人们登上舞台，与剩下的山岳派混在一起。拉马丁指出：“共和国的伟大时期同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一起结束。新一代的革命者出现了。共和国正在从悲剧转向阴谋，由神秘主义转向追求功名，由宗教狂热转向贪图权势。”但国家由于受够了悲剧、神秘主义和宗教狂热之苦，所以暂时甚至认为阴谋、追求功名和贪图权势也较之为好……

委员会的专政引起抗议，它让位给选举的原则。布尔顿宣称：“人民的委员会不是人民自己。我只在地方的选举大会上见到人民。”所以“热月政变分子”不是反对革命原则本身，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及其朋友们对这一原则的特殊运用。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喀琅施塔特分子不久前提出的关于“自由选举苏维埃”的口号……

“热月的道路”就是如此。它的胜利受到了它的本性的制约。它不同于旺代^①和科布伦茨^②的道路，它依靠革命本身的存在，运用它的原理和受制于它的规律。热月进步是由革命法国的情绪所准备和由国民公会即革命最高合法机关所完成的。索列尔深刻地指出：“保证国民公会获得胜利的因素是：它所利用的力量不是反革命力量，而是武装的革命本身，武装的革命反对自己是为了放弃自己的过火行为。”这一点需要永远记住并加以注意。

当在我们的时代处处都在谈论“俄国的热月”的时候，首先必须弄清楚法国的热月的真正特点和弄清楚它的教训。否则，除了

①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在法国旺代省多次策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恢复法国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译者注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科布伦茨城是反革命流亡者策划武装进攻革命法国阴谋的中心。——译者注

“滥用名词”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革命的细节、具体轮廓在我们这里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样子。而且，从总的情况看，在如今的莫斯科不存在热月9日那样的意外事件的土壤。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意外事件本身对于革命的发展并不重要。它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热月的道路”并不在于这种意外事件。

而至于谈到这条道路，那么它在我们非常时期的混乱和复杂的形势下，就已经开始明显地初步形成了。

当然，这条道路不在于受外国人和流亡者支持的白卫战线和边境地带的运动。不，它与所有这些运动不仅格格不入，而且是敌对的，因为只有不可救药的盲人或者极其反动的反革命分子才热衷于这些运动。国家不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革命之外。

但这条道路也不在于反对革命政权的自发的起义或由于饥饿而发生的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促进它的发展和巩固。但就其内容来说，这一道路与这些起义和暴动毫无共同之处。革命的法国同现在的俄国一样，在城市和农村曾发生过许多类似的暴动，请读一下我们时代的编年史，这些暴动发生在埃夫勒、第厄普、里昂、韦尔万、利尔等地。但是，这些暴动从来都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它们没有创造性的思想，而且一向都只不过是出于痛苦而发生的毫无目的的、本能的抽搐而已。如果暴动获得胜利，革命过程也不会卓有成效地结束，而只会毫无意义地中断，以便将来重新开始……

热月的道路在于革命组织的蜕化，在于其代表人物的心灵的改变。这一全面蜕化的结果，可能是这种无足轻重的“宫廷政变”，通过他们自己战友的手，而且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处死罗伯斯比尔）把最不受欢迎的人除掉。但也完全不排除可能有另外的出路，即波拿巴对马尔蒙所说的办法：运动的首领适应运动的新阶

段。这样，运动就会最顺利地完 成，而且震动比较小，这就是“通过政权的道路”。

在当前的俄国，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新阶段的影响。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了，尽管领导革命的人仍然是原来那些熟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绝不打算把这些人送上断头台。但是他们本身被迫走上了喀琅施塔特的山岳派意外提出给他们的热月的道路；——他们是否因此就能得以避免9日的悲剧呢？

布尔什维克的骑士团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官僚等级制度是雅各宾派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列宁比起罗伯斯比尔要更为灵活和敏锐。如果我们这里没有维尼奥和丹东，那么我国的极端的雅各宾派就比法国的雅各宾派更强大，而且更有生命力，虽然从“生活”的观点来看，其凶残的程度并不比他们小。也许我国的极端的雅各宾派结束的方式不同，但革命本身发展的基本路线，看来大体上是同一条路线。

现在革命有许多危机的迹象。从伟大的空想开始“刹车下坡”，走向对改变了的现实进行清醒估计的道路，并为这一现实服务，革命领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祝它取得胜利！

当它将来完成的时候，新的情况还要创造新的形式。那时车闸已经不再需要了。

“革命正在放弃自己的过火行为。”而那些妨碍它这样作的人，不论是红色俱乐部的讲坛上的，还是可怜的流亡者的简陋小屋里的，他们都是可悲的……

译自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名义下》

1925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0--24页。

刘彦章译)

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俄〕尼·布哈林

那些不配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不计其数的人们真心诚意地、以令人眩晕的速度迅速“向右看齐”，如果从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这是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果。起初并不明显的这种背离象滚雪球似地扩大，相当迅速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和思想家的

* 本文原为《共产党人》停刊后出版的中央不定期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文集》而写的。《文集》编辑部认为不能刊载此文，因为它认为此文发挥一种不正确的国家观点。可惜，由于国外的多次迁移（并且是在非法状态之下）列宁同志为此而写的几封信失落了。在得到《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的退稿之后，我写了几篇小文章，发挥了同样的一套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在左翼激进报刊上：荷兰的《论坛报》（1916年第25号及以后几号的文章《新的奴隶制》）、挪威青年机关报《阶级斗争》，大战期间出版的不来梅杂志《工人政治》；最后，《青年国际》杂志（署名诺塔-别涅的文章），还有纽约《新世界报》上的一些争论文章（反对英格尔曼医生）。弗·伊·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上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XⅡ卷）。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犯那个加之于我的错误，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不正确地对待了关于“炸毁”国家（自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把这一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您，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您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炸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大大发展了，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尼·布·注

“能力”)从背离变成正式的叛教(俗称),背叛。最怯懦、伪善的分子用响亮的“老的”词句和老的术语(例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波特列索夫提出“达到爱国主义”的口号),另一些人(海涅一类的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则直接诉诸俾斯麦的“国家理性”和参谋部的“军事理性”。^①当然,我们的西壬们^①随着也唱起同样的调子。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客观逻辑:既然叫做蘑菇,只得任人采食。我们的时代把所有的策略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原则高度。这里必须进行彻底的思考,因为所有过去被许多人看作“经院哲学”、“灰色理论”等等的东西,现在具有了现实的实践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决定“重新学习”。他们应当这样做:愿者命运领着走,不愿者命运曳着走,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从而还有理论)和各种色彩的改良主义之间在实践上出现鸿沟的时候,回避、掩盖和调和问题是最无可救药的做法。

社会民主党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问题是目前特别尖锐地提出的最普遍的问题之一。这是由密切相关的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帝国主义时代是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尖锐斗争的时代,因此国家的武装力量、“实力政策”等等问题具有巨大意义。第二,这一时代空前地加强了国家政权在人民“内部”生活中的作用,这一恶魔的触须无孔不入,抓住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目前,在国家政权为了使统治阶级能乘机取利而“折磨”人民和使之“破产”的时候,在采取最尖锐形式的阶级斗争应成为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当前口号的时候,爱国主义者先生们的一切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在对外政策上他们成了军备的热烈拥护者,因而也是帝国主义屠杀的热烈拥护者;在内政上他们成了国内和平的辩护士。如果说,过去“给茅舍和平,向宫廷开战”的口号对他们颇有吸引力,那么现

① 西壬是希腊神话里女首鸟身的女妖,善以歌迷人。——译者注

在他们把它改写成：“给宫廷和平，向‘外国茅舍’开战”。走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路线的方针被代之以走帝国主义国家利益路线的方针。过去的自由、民主献身者，社会主义者拜倒在将军的马靴之前，当然，只有作为笑话才能说他们“没有向权贵匍匐谄媚”。由于感激涕零，他们诚惶诚恐地手脚并用，匍匐谄媚……”

一、国家的一般理论

1.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2. 国家的起源。3. 作为历史范畴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4. 国家的职能。5. 国家的类型。作为历史范畴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世界各国社会爱国主义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倒退运动的过程。过去具有非常准确意义的概念和术语现在让位于“一般词句”。过去需要善于“区分”。现在相反，宁可采用最没有区别的概念，例如“民族”，“人民”，“整体的利益”等等，等等。

这对达到某些目的来说既容易又方便。因此不得不重复一些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古老的真理，以便反击从四面八方供给读者的那种使人无法忍受的准理论废话。在谈帝国主义国家之前必须先谈谈一般国家的本质。我们也就从这一点开始。

关于国家有无数的定义。我们且不管所有那些在国家中看到目的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本质、“道德思想的现实”（黑格尔语）等等的理论。我们对法学家的众多的定义也不感兴趣，他们是从形式的法学的定理的狭隘观点看待国家的，因而多半陷于循环论证，用法来为国家下定义，又用国家来为法下定义。这些“理论”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因为它们缺乏社会学基础，它们是悬在空中的。只能把国家看作社会现象；因此必须了解它的社会本质，它的社会职

能,它的起源;换句话说,需要有社会学的国家理论。提供这种国家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其基本职能是保护和扩大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是统治、权力、奴役的关系。不错,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曾宣布,国家的宗旨是“在国内保证法制,消灭邪恶,以防恃强凌弱”。^①不错,时至今日还是到处充满这一古老的谎言,所有关于“国家的宗旨”的学说无非是在重复这一谎言。“存在国家制度和法不是为了君主,不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其个人财富,而是为了臣民。”^②需要棍子不是为了老爷的利益,而是为了教育奴隶——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科学的论点。实际上事情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存在有计划地建立的、自觉调节的国家政权组织(而这只有在国家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产生),因而才谈得上宗旨的安排,这些宗旨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只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这同国家执行并执行了一系列公益职能毫无矛盾。这只是国家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国家的“公益活动”是最长久、最有效地剥削现代社会中的被奴役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条件。统治阶级在自己的政策中是实行一定的核算的;因此节约力量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家组织。国家修建铁路,从事灌溉工作,设立学校等等。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关系易于发展,使创造的大量价值流入资本家阶级的口袋,剥削的过程才能进行得平稳一些。国家采取一些保健措施,充当“劳动保护者”的角色(工厂立法等等)。为什

① 见龚普洛维茨《国家理论史》1905年因斯布鲁克版第8页。

② 埃德加·勒宁《国家。国家论手册》。H·雅尔塞列姆重复柏拉图所说的国家的任务是实现道德理想,认为现在此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从社会学角度看战争》1915年斯图加特版第61页)。比较维戈京斯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第111页。这等于说,资本的宗旨似乎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

么？仍然不是由于被奴役的无产者的漂亮的眼睛，而是因为这样做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阶级有利；或者出于直接利害关系（例如，现代国家需要有健全的士兵，因此有时就采取措施稍稍制止民族的退化），或者出于反对被压迫者的阶级斗争的战略考虑。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政权作出让步，因为否则剥削过程就不会这么顺利地进行。因此这里的指导原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是以“民族”、“人民”、“整体”利益的名义作掩护的。在这里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奴役（Niederhaltung）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①

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组织，是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而阶级分化过程首先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必须强调指出，社会分化为阶级决不是象某些社会学家（龚普洛维茨、奥本海默）在很大程度上重复臭名昭著的杜林的说法所断言的那样，是由异民族的单纯暴力造成的。这种理论不管它表面上多么激进，实质上是反动的，而主要之点在于，它是不正确的。我们要详细批判此类流派，也许扯得太远了，但是鉴于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有某些近似之处，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讲几句……

弗兰茨·奥本海默是这样规定“历史国家”的定义的：

“按照形式和内容可以为历史国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从形式看，国家是获胜的集团强加给战败集团的一种法律机关。其内容是上层集团按照最少的（政治）消耗原则（奥本海默这样称呼纯经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9年第3版第137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国家是有产者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同上，第138页〔第168—169页〕）。“政治（统治阶级的政治。——尼·布·）无非是巩固财产的方法和保存以及增加财产的工具。”（阿·洛里亚《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1903年巴黎第2版第362页。

济关系以外的力量的节约原则。——尼·布·），对下层集团实行有计划的剥削，即自身用尽可能少的花费尽可能多地无代价攫取其（即下层集团。——尼·布·）劳动成果，而这种攫取的时间应是最长的。”^①“国家就其产生而论完全是，而就其发展的最初阶段的实质而论几乎完全是战胜的人们集团所强制设立的社会机构。”^②

阶级，“正如历史的归纳和人种学的归纳所表明的，是政治（即超经济的。——尼·布·）手段建立的，并且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建立”。^③

因此照奥本海默的看法，阶级只是变了形的战胜者和战败者的集团，而决不是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儿。在这种“阶级起源”理论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乃是暴力和掠夺的历史。然而问题远未因此了结。实际上，“法律”设施（国家）以及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例如奴隶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够产生或维持下去，这就是在这些集团的经济生活中具有这样做的充分的基础。这种基础是确实存在的：我们说的是由于劳动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出现的经济分化。^④ 因此即使没有任何外部

① 奥本海默《国家和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还可参看他的《国家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151页）。这位作者关于经济同政治的区分的论点见奥本海默《纯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1911年柏林第2版。

② 《国家论》第9页。

③ 《国家和社会》第115页。

④ 比较施穆勒《分工的本质和阶级的形成》：“象龚普洛维茨所做的那样，把这一真理（关于征服的作用。——尼·布·）概括成：一切国家的产生、全部高级文化、一切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全部社会分工都是从种族斗争引起的，这是错误的或者夸大的。”（《年鉴》1890年第72页）施穆勒本人恰好相反，力求“缓和”实际历史。事实方面见施穆勒《劳动分工的事实》，载《年鉴》1889年。E·杜尔克海姆的一般性质的理论观点颇有意思，见他的《论社会劳动的分工》1893年巴黎版。

的入侵，经济发展的逻辑反正会导致指挥阶级及其一般组织——国家的产生。现代史提供了这种发展的例子——我们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诚然，对北美封建主义的萌芽和土地贵族经常估计不足。^① 但是如果持奥本海默的观点，那么美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演变就会全然不可理解，因为在这里通过社会分化、正在增长的阶级对抗等等从内部产生国家政权的过程是清楚的。^②

各种类似的理论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其根源却有强烈的辩护色彩。问题在于拯救商品经济的基础。逻辑是这样的：现代奴役制是通过夺取和建立对土地的“暴力所有制”（这是杜林使用的术语）产生的。由于被剥夺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群众的无产阶级化，随着土地的垄断化产生了资本的阶级垄断。土地的和资本的所有制在国家这一实行压迫的政治工具中得到体现，而这种政治工具在历史上是先于经济的。只要摧毁对土地的“暴力所有制”（“内部移民”），就会产生“殷实的农民”，失业大军就会消失，资本家的利润就会下降得使他们继续活动成为无利可图的事；雇佣劳动将被消灭，而社会将毫无痛苦地转变成自由公民的社会，他们和平地彼此交易，“公平地”出售一切；国家将消亡，变成“自由的市民社会”。这也就是奥本海默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③ 当然，这纯属反动空想，因为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产生决不是一定要以超经济的压制和征服为前提的。而要消灭剥削，实行“内部移民”是完全不够的，而必须消灭指挥阶级（土地占有者、工业家、金融资本家

① 见反对这种低估的迈尔《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第1卷。

② 奥本海默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在这里受祖国国家制度传染的群众带来了这种国家制度（《国家论》第10页）。但是，即使把这种国家组织看作是这些群众的隐病，仍然不清楚，为什么美国的新鲜空气没有治好它。显然，奥本海默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

③ 见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奇怪的是，奥本海默是以……对帝国主义官僚制的赞美结束其论国家的小册子的。

等等) 私人的和集体的财产。因此任何真正革命的理论都应当寻找根源(彻底就是把握住事物的根源——马克思写道),不仅仅用征服去解释一切,而是寻找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的根本原因。“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勿宁说,国家是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①

如果把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一般组织这一点看作是国家的基本特征、它的“本质”,那么把国家看作历史范畴的观点就非常清楚明白了。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把国家看作是一切发展阶段都必需的社会机关。正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非独立自在的东西、生产资料,而是表现于物的社会关系,同样,国家的本质也完全不在于它的技术—行政作用,而是这种作用掩盖下的统治关系。^②但是由于统治关系是建立在阶级分化基础之上的,所以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将消失。因此,国家不仅有其历史的开始,也有其历史的终结。

马克思写道:“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寻找祸害的根源,而是在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寻找;他们要用别种国家形式来代替这种国家形式。”^③恩格斯说得更为坚决:“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④在《反杜林论》中恩格

① 恩格斯《起源》第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② 顺便说说,卡·伦纳在大战期间打破了变戏法的全部记录,对自己的帝国主义欲望提出了光辉的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他以(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是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因此双方都需要这种关系为理由来为保卫祖国辩护。但是伦纳忘记了一件小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想使这种关系永世长存,而相反地,要炸毁它(见《斗争》1915—1916年)。

③ 马克思《评……》载《遗著》第2卷第5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

④ 恩格斯《论权威》,载《新时代》第32年卷第1分卷第32页,梁赞诺夫译自意大利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斯声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将“自行消亡”。在《家庭的起源》中他提出这样的预言：“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统治阶级。——尼·布·）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这些引语决不是偶然的。相反地，它们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历史性，它不是把社会现象看作永恒不变的范畴，而是看作在社会生活的一定条件下产生和消失的暂时现象。因此，这也不是象某些人^②所力图证明的，是名词术语问题，正如是否把“野蛮人的棍子”叫做资本不是名词术语问题一样。对马克思来说，社会范畴的划分标准、划分的逻辑基础是人们的不同关系类型，而不是被盲目崇拜所歪曲的“现象的外表”。社会发展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社会经济结构）更替的合乎规律的进行过程，认清这种社会发展就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国家问题，国家是广泛的社会—历史—经济结构——阶级社会的政治体现。正如静态的、反历史观点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理解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这种独特观点一样，资产阶级

① 恩格斯《起源》第14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② 例如阿·瓦格纳写道（在社会政治科学字典的《从国民经济学观点看国家》一文中）：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国家的所有“最高级”的特征，因为不能把阶级压迫看作说明问题的特征。不错，照瓦格纳看来，现在存在“滥用现象”，但这“对理解国家”并不重要……在资本的经济理论中也有极其类似的胡说八道（柏姆-巴维克、克拉克之流）；资本的实质不是社会统治，而是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的存在；现在存在“滥用”，至于将来，那么甚至在社会主义下资本和利润都将安稳地得到发展……

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对国家的观点。例如龚普洛维茨写道：“马克思的理论包含有关于国家的新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观点。”但是，这位作者继续写道，“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在于，它认为当国家‘终于成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时’（过去它就是冒充这种代表的），它‘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了’”^① 这是“激进的”龚普洛维茨说的。他的其他讲坛同行由于自身的地位已不能理解马克思了。^②

这样，未来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组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完全不象许多人所断定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对未来结构看法上的

① 龚普洛维茨《国家理论史》1905年因斯布鲁克版第373页。

② 例如耶里涅克写道（《关于国家的一般学说》1914年柏林第3版第89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无非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外部生产条件的组织，而历史的内部的必要目标（！）则是由无产者夺取国家政权。在这未来时代里，国家（！！）将根据共同利益来调节全部生产。与此相应，发展的目标（！）是和社会和国家的完全统一……然而关于社会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同无政府主义极端矛盾的。这里是社会取消国家，而那里是国家取消社会”。至于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的胡言乱语（历史的“目的”），我们就不用说了。耶里涅克毫不在乎的接着引用《反杜林论》和《家庭的起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斗争的观点强加于他们两人。这一点耶里涅克自己也知道，他在第194页写道：“所以，至少就未来而言，社会主义者是否认国家的必要性的。”结果，在第89页上未来时代有全能的国家，在第194页是否定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统治理论”的不友好态度的根源耶里涅克暴露得相当坦率：“统治理论的实际后果不是为国家辩护，而是摧毁国家。”（第195页）；它（这一理论。——尼·布·）为不断革命开辟了道路。”（第196页）G·奥本海默（《国家论》第6页）断言，“柏拉图和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国家以全能并想把它搞成（！！）公民的绝对主人。”G·施穆勒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很新奇的。谁要是知道一个好的女厨师怎样从头到脚打量一个普通女仆，伯爵家的侍役怎样打量资产阶级家里的仆役，训练有素的泥瓦匠和木工怎样看待普通的泥瓦匠和木工，他就会懂得等级的阶梯乃是一切时代的心理需要。而这是在严肃的杂志上，以权威的口吻写出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见正文。

真正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公共经济是从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出现的集中化倾向中产生的，是集中化的和技术完善的经济，而主张非集中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乌托邦则使我们返回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使任何经济进步都成为不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保存国家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在这里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最后形式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

如上所述，国家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和扩大剥削过程。在这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关系：或者国家组织是直接剥削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资本家的同盟，它拥有自己的企业（例如铁路、某种产品的垄断生产等等），或者国家组织间接参加剥削过程，成为维持和扩大剥削过程中最有利条件的服务机构。在前一种情况下——这里说的是生产劳动——国家攫取在它直接活动领域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税收等等取得国家直接监督领域以外的生产领域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做的时候国家通常不仅榨取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且还榨取一部分工资（而在存在其它范畴——“劳动收入”时，也榨取它的一部分）。在具体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是同时并存的，虽然它们所占的比例有变动，这种变动取决于历史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维持和扩大剥削过程分两个方向进行：外部，即在国家领土之外，内部，即在国内。国家组织的对外政策表现为瓜分世界范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斗争（由于存在非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还有争夺剩余产品的斗争），这是统治阶级不同国家组织集团之间展开的斗争。

国家组织的国内政策表现为统治阶级通过不断镇压被压迫阶级谋求解放的任何企图争夺被创造出来的那一份价值（或产品）的斗争。“国家活动的领域”（洛也宁）也就服务于这两个目的：“对外

管理部门”——保卫统治阶级在国外的利益；“司法部门”维持束缚被压迫阶级手脚的法规，其中所谓“民法”保护财产的神圣基础，作为经济统治的政治表述的“国家法”维护对被压迫阶级的政治奴役，“国内管理”部门（广义上的“警察局”），除我们已揭露其真实含义的公益职能外，是直接用来反对国内敌人的；“军事行政”部门既是同其他国家组织，也是同起义的人民作斗争的决定性论据；最后，“财政管理”领域，这是取得“国家收入”以维持和扩大国家组织，首先是其军事机构的艺术（因为资产阶级通过德国帝国主义者德尔布吕克之口说出了神圣的真理：“归根到底，真正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武器。因此，对国家的内部性质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始终是军队属谁所有的问题。”^①）

上述关于国家的阶级性质的一般原理还没有回答国家组织的具体历史类型的性质问题。而经济进化创造了某种生产关系类型，同时也创造了与之完全相等的国家组织类型。例如封建的国家组织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组织不同。不仅如此，甚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随着资本主义依次经历其商业资本、工业资本，最后，金融资本阶段，可以看到其国家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我们的时代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在国内和在各国之间建立了历史性质突出的特殊关系，也赋予国家政权以新的形式。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将说明它的特点。

二、帝国主义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

1. 国家政权作用的加强。
2. 国家和产品的生产（国有土地、林业、国营工厂、国家垄断制、“合营企业”、国家监督和工业动员）。
- 3.

^① 汉斯·德尔布吕克《政府和人民意志》1914年柏林格奥尔格·施蒂尔克出版社版第133页。

国家和流通过程(国家和流通手段;铁路、电报、电话、水底电缆;商业垄断、国家银行和银行康采恩;信贷组织;国家公债;分配领域的国家监督,等等)。4. 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家政权。5. 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的集中化过程。6. 军国主义和经济军事化;所谓军事社会主义。

只要最表面地看一下社会经济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的经济作用大大增加了。这首先表现在国家预算的增长上。现代国家组织的复杂机构需要大量的开支,这种开支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国家支出如下:

德国(百万马克)
1891—95年——1553.0

1901—05年——2253.1

1907年——2809.8

1908年——2784.8^①

1911年——2897.4

1912年——2893.3

1913年——3520.9^②

英国(金镑)

1909年—143687068

1910年—157944611

1911年—171995667

1912年—178545100

1913年—188621930

法国(百万法郎)

1893年——3359.7

1907年——3882.3^③

1908年——4020.5

1909年——4186.0

1910年——4321.9

1911年——4547.9

1912年——4742.7^④

美国

1900年—487713792

1910年—659705391

1911年—654137998

1912年—654553963

1913年—682770705

① 阿尔特曼《财政科学》第22页。

②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5年。

③ 埃贝尔格《财政科学》第10版。

④ 《政治家年鉴》1915年第42页。

1914年—197492969①

意大利(百万里拉)

1898—99年——812

1906—07年——1945.9

1909—10年——2602.1

1910—11年——2833.1

1911—12年——2949.0

1912—13年——3252.0②

1914年—700254489③

俄国④

可见,德国支出预算从九十年代起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六,法国百分之四十一;英国和美国从1900年起增加百分之三十七(英国)和百分之四十四(美国),意大利的预算从90年代末增加百分之六十七;最后,俄国。

同居民的支出预算相较国家支出占多大比重见下表,这是根据普鲁士所得统计表编制的。⑤

	百万马克%
国家支出.....	2323.....13
公社支出(10000名居民以上)	918 5
公社生产性消费支出.....	1856.....11
资产阶级个人支出.....	2784.....16

	百万马克%
人民群众支出.....	9616.....55

① 《政治家年鉴》1915年。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为说明缺俄国数字的原因,我们把作者给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短信手稿援引如下:“亲爱的格里哥里:请填上相应年度俄国支出预算的数字。我目前地处偏僻,毫无可能取得必要的数字。请在第21页写上增加量的百分比。行吗?有劳大驾,切勿生气。”——原编者注

⑤ 帕尔乌斯(第一种方法)《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第31页。

所以，国家和最大的公社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即五分之一。

在增加预算中起巨大作用的无疑是军国主义，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政策又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必然产生的。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狭义上的军国主义。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生产领域直至意识形态创作的高级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干涉。如果说，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作为工业资本主义政治表现的自由主义时期的特点是国家政权不进行干涉，自由放任的公式是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信条，它们让“各种经济力量自由表演”，那么我们时代的特点是截然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的逻辑极限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把一切统统纳入国家调节领域。

为了用最一般的表述说明这种国家化的根源，我们必须看看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通过成立合营企业和发挥银行的组织作用，把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联合在一起，这一组织过程把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体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①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猛烈地推动这些“民族”体系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斗争。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两个基本事实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倾向的钥匙。确实如此。为什么过去的资产阶级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首先是因为经济生活的基本范畴是私人经济的个体，单个的企业，它作为竞争者同所有其他的企业打交道。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内部结构，同企业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是类

①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杂志《共产党人》中详细分析了这一过程。见拙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似的。作为一个阶级，它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在内部，在本阶级范围之内，作为竞争者其每一个成员都同另一个成员对立：人对人是狼。每一个人都期望把自己的对手打下马，他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竞技将给“整体”带来最有益的成果。但不仅单个的企业和单个的个人是个人主义的体现者。把各统治阶级分为不同的集团也起这样的作用：首先是土地占有者和工业资产阶级，然后是较细小的划分——原料和制成品生产的代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等，等等。金融资本阶段结束了这种状态。首先，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经济机体细胞的单个的私人企业消失了。同时统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消失。通过相互参加，几乎所有各类资产阶级都变成了股息的获得者，而利息这一范畴成了表现一切所谓“非劳动收入”的共同形式。银行成了每一个资产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最神圣之物，它用千丝万缕把他与他的同类联系在一起。集体的资本主义体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结构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过去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对立的。单个的资本家消失了，他成了联合的资本家^①，组织的一员；他已不同自己的“同乡”竞争；他同他们合作，因为竞争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世界市场上去了，而国内竞争在逐渐消失。伴随着统治阶级这种结构的是“国家机器”的相应改变；国家政权变成金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大组织，就结构来说它是很单纯的，金融寡头管理托拉斯，金融寡头管理全国。这是同一个集团的另一个组织。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对“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抗拒应当消失。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转交表面上独立的国家管理（我们说的是经济调节），同时又保证稳定的收入，这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这还许以某些特权。这些特权是同金融资本

^① 请比较瑞曼《中欧》。

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直接联系着的。我们已经指出过，外部竞争开始起巨大作用。这种竞争的方法不仅有海外倾销和纯经济压力，并且还有军事压力，最后，发动战争。这样就出现了军事力量的问题。但是现代战争同过去的战争全然不同：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这不仅是从哪儿取得钱的问题，还有财政和工业动员问题，变“和平经济”为“军事经济”的问题。“过去战争在经济上是国家财政问题。而现在国家是有无限力量的。因此它的外部行动不是以企业的形式表现的，它已不是财政经济问题，钱的问题；为战争而去动员整个国民经济的自然实体。”^①而动员整个“国民经济实体”乃是关于置于国家政权直接监督下的组织问题。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越有组织，国家政权的干涉越有力，国营部门的生产越处于国家的支配之下，调节货币和信贷—货币流通的国家银行的力量越强大，那么，这个庞然大物就越有战斗力，战胜国的幸运的公民就能取得越多的利润。“社会主义是进行战争的手段之一”——社会主义的叛徒埃德蒙德·费舍喊道，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彻底的国家干涉。^②

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舆论”的著名代表“情绪改变”的最普遍的原因。现在“国家化”的反对派仅仅来自商业资本，来自其作用在下降，其经纪职能在国家直接监督的情况下已不必要的部门。

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战争而迅速发展成熟。战争不仅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它异常加强和加剧资本主义内

① 埃米尔·勒德雷尔《战争中的经济过程》。

② 埃德蒙德·费舍《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社会政策和立法年鉴》亨利希·布劳恩编1915年版第Ⅳ页。看一看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引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破灭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在理论经济学领域正全速地把边际效用的“奥地利”理论改造成更适应时代、适应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心理的美国式样。

在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战争引起了一系列“工业变革”并使经济基础革命化了（在这种特定含义下），它异常迅速地消灭了业已过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当然，这迁延时日的屠杀一旦停止，那么由战争的特殊任务和需要引起的许多东西也将不再存在。但是也有许多东西将留存下来，因为整个说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被消灭的威胁之下，必然要去适应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战争的时代。^①

我们从经济生活的基本领域，生产领域讲起。

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个阶段留下了某些残存的形式，它们将作为国家经济的活细胞而存在。我们这里指的是国有土地、林业和国营工厂。其数量总的说来同非国家掌握的领域相比是不足道的。但是国家的林业占很大的比重。我们引德国的数字为例。1900年森林的不同占有情况如下：

王家森林	国家森林	国家及其他单位公共所有的森林	公社
257302	4430090	29793	2258090
机关	合作社	私人	合计 ^②
211015	306214	6503365	13995869

值得一提的还有矿业，国家政权在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更有份量的是在生产领域日益增长的实行国家垄断的尝试。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干涉有最“光辉的”前途。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过的总的考虑中还要加上一点在战时获得特殊意义的东西。我们说的是大大增加国家收入的必要性。战争的耗费是如此巨大，要拖好多年才能弥补这种耗费（偿还国家债款，支付国家公债的利息，救济伤残人员和孤儿等等，在扩大的基础上

① 同准社会主义的天真的和平主义者相反，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无赖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例如见马克思·克拉曼教授《战争和采矿工业》第15页）。

②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1915年。

重建被摧毁的军事机构,等等,等等),这必然引起并且现在已经引起对国家预算的全面改造。各交战国的收入至少应增加两倍,甚至还要多。因此摆在日程上的是数量空前之大的国家财政问题。国家收入通常分以下几种:从国家自己的企业中取得的收入(例如林业、矿业、国营工厂、铁路等等),直接税,间接税(以及关税)和国家垄断。从自己企业中取得的收入较少,直接税是资产阶级自身所不乐意的,增加间接税(和关税)为一切政府所乐用,但受到无产阶级的顽强反抗。^①只有实行一系列产品生产的国家垄断:烟草垄断,雪茄烟和卷烟的生产垄断,酒精、汽油、火柴、电力、煤和铁、钾、灯用煤气、某些金属等等的生产垄断。这是些最易于实行垄断的生产部门,有一部分已在一些国家实现垄断。

预计军事工业,即为陆海军服务的工业(制造装甲舰、大炮等等)也会实行垄断。这一生产部门从社会发展观点看是非生产性的,但它的作用将增大,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激烈竞争的时代,然而,这决不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田园诗,^②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企业(或托拉斯)转向纯粹的国家企业的过渡形式是所谓“合营企业”。这种形式最近越来越多地出现,看

① 请比较E·雅费《我们经济的“军事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15年第3版第40册第529、530页。

② 关于垄断等等见Ad·布劳恩《电力垄断》,载《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分卷第19、20期;E·费舍《电力垄断的形成》,载《社会主义月刊》第443页;E·雅费:前引书;费利克斯·皮纳尔《有组织的劳动》,《柏林每日小报和商业日报》第439号;H·库诺夫《战后的经济状况》,《总委员会通讯》第25年刊第37期;鲁·希法亭《组织力量和国家暴力》,《新时代》第22年卷第2分卷;卡·考茨基《税收和垄断问题》,《新时代》第21年卷第1分卷;还有《财政通报》上的弗里德曼的文章。我们还要指出公社的巨大作用(例如德国公社在提供电力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可以把“公社自流”看作是国家组织的分支。格尔夫林《市政工作中的财政经济问题》(《财政文库》第33年卷)考察了财政方面的问题。

来它大有迅速流行之可能。其实质是国家在这里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更多地是同资本主义组织（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等等）进行合作。这是通过“参与”（“合营”）进行的：国家购买相应企业的一部分股票，而另一部分股票留在普通托拉斯手中。这样一来，国家和企业主的经济组织就成了同一个生产单位的共有者。很清楚，这种过渡形式将逐渐让位给纯粹的国家企业；这一过程的机制很简单，或者国家成为百分比越来越大的股票所有者，或者股东变成一定数量的固定收入的普通领取者，不直接干涉生产过程，而把它交给文明的、受过应有教育的帝国主义官僚去领导。^①

这是国家干涉生产领域的最可靠的基本形式。与之并存的还有许多其他措施，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对私人财产的“自由支配”（当然，这并不总是给上述所有者造成损失），把生产置于能看见一切的国家眼睛的监视之下。在所有交战国里受这种监督的首先是为所谓“国防”服务的企业。由于受英国的封锁，德国特别需要这种调节社会经济的倾向，在这里这种监督被推广到一系列其他生产部门。^②例如，如果专门的“帝国分配局”不仅规定生产的产品，例如砂糖，而且还准确规定，需要生产多少砂糖，什么时候运到什么地方去，那么私人资本家或辛迪加的专断就让位于“国家裁夺”。所以这里是对生产和销售的限制。有时候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了有更多的生产计划性把不同的生产集团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综合体（例如，德国的煤炭生产^③）。最后，还有无数详细规定

① 见把德国全部经济变为国家领导下的股份公司的方案。

② 约翰·穆勒提供了德国政府的全部措施的综合报告（《通过战争成为法令、规定、公告等等的经济立法》），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还可比较哈契克教授《军事社会主义的立法技术》，载《德国评论》1916年6月；至于财政见Ch.纪德《法国的粮食供应和有关措施》，载《经济杂志》1916年3月号，以及《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法国通讯（1916年3月11日第1号20期，5月27日，6月3日等等）。

③ 见哈契克上述著作，E·迈尔《金融辛迪加的威胁》，载《新时代》第33年卷第2分卷第18期。（德国）在毛料、化工产品、金属、皮革生产等方面也有类似机构。

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例(一定的生产方法,使用一定的原料,等等)。上引哈契克教授写道:“所有这些措施把生产者和商人变成了社会职员。”(可敬的教授只是忘记了这些辛迪加的“社会职员”所获得的极不错的“报酬”。)

这样,国家政权几乎渗入到一切生产部门;它不仅保护剥削过程的一般条件;国家越来越成为直接的剥削者,作为集体的、集合的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生产。

在流通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过程。

首先我们应当看一看流通过程的技术物质骨架:铁路、电报、电话、水底电缆、整个邮电组织。

在这里“国有化”早于其他部门。铁路“国有化”的原因具有典型意义,除了经济原因之外(投入的资本数量巨大,初期赢利率不高,等等),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国库的考虑和军事战略考虑。英国是最晚实行国有铁路的;“大战”在这里起了作用;象保护关税政策、实行常备军、限制个人自由等等一样,也完成了向国有铁路经济过渡。国有铁路所占的比重(占整个铁路网长度的百分比)如下:比利时九十点八;德国九十二点五;丹麦五十五点六;意大利七十七点八;荷兰五十六点三;挪威八十四点二;奥地利八十点四;俄国的欧洲部分六十五点五;瑞士七十一.九,等等。法国、葡萄牙和瑞典的铁路经济是“合营”型的。至于电报,私营电报只在美国起巨大作用,在其他国家都是国营的;电缆网主要掌握在私营公司手里,但是相对说来国家的那一部分增长得要快一些。毫无疑问,战争的影响在这里极为强烈,为了“国防”等等而推行把所有这些部门大力实行国有化的政策。

这样,流通的骨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并且流通过程本身也越来越多地转入它的手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国家的商业垄断。实行垄断的原因同生产领域实行垄断大体相

同；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关系日益增长的“集体”性；另一原因是迫使资产阶级在“本国”范围内使经济关系集中化的财政考虑和战略考虑。在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实行生产垄断的地方，国家就为自己取得按照它自己确定的价格出售该产品的特殊权力。

商业垄断无疑是对生产部门实行国家监督的一个阶段；只不过这种干涉是，可以说是，从另一端开始的。

股份企业的形式使得有可能在这一领域组织“合营企业”，其股东一方面是公法机构（国家，公社），另一方面是工商组织。战时在德国起类似作用的是为数甚多的“军用物资协会”，它们有权（在国家政权的监督下）集中现有的各种经济物资储备，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定条例进行分配（例如橡胶，汽油、金属、皮革等等），或者“帝国分配局”，专管全帝国的商品分配。一系列组织必须提供商品，同时另一些组织必须接受这些产品，并且按照国家确定的价格。最后，国家干涉的极端形式之一是没收制度（请比较例如德国政府在供应居民食物方面的做法和所谓“食物专政”）。在这里也有一系列辛迪加组织同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合作。结果无政府的商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代之以有组织的产品分配，并且最高一级依然是国家政权。

当然，随着经济过程正常条件的到来，这里的许多形式必将消灭；因此某些帝国主义思想家所梦想的“仓库化”，即设置大型的各种产品的国家仓库，同时使国家经济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无疑是种空想。^①但是国家政权日益增长的干涉的总的趋势（其理论极限是无法确定的）仍然存在。

如果我们从商品流通转向货币流通和信贷领域，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过程。国家在战时迫切需要调节整个货币流通过

① 见平内尔前引书。

程。财政动员要求中央国家银行拥有巨大的力量；国内的全部黄金储备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货币流通领域的具体状况首先取决于国家银行的政策、它发行的纸币的数量等等。信贷方面同样如此。在德国，除此以外，国家银行还把专门为战争设立的、依附于它的“信贷银行”作为自己的支柱；这种国家机构的宗旨不仅是以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作抵押，而且也以商品作抵押给予贷款。^①这样，在国家政权和作为经济生活代表的不同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形成了某种类似连环保的东西，“利益的共同性”在不断增长。这种连环保在这一领域通过不同途径形成。在这里公债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交给国家（顺便说说，内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造成的生产基础缩小，资本找不到投资场所这种状况造成的，而所谓这种成就具有“人民”性，纯属臆造，这从分析清偿的来源就可以看出），那么由于这一点，他们就成了广义上的全部国家企业的股东，因为他们获得的固定利息是整个国家收入的一部分。发行的内债越多，全部生产部门同国家政权在经济上的联系就越密切，并且这种联系是在流通过程中建立起来，从流通过程出发的，而最高调节者是国家银行。

有趣的是，这后一种机构的结构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一样的。它或者确实是纯粹的国家机构，或者是“合营类型”的企业。德国的帝国银行也具有合营性质，它作为股份公司由国家官员来管理，而此官员则由联邦议院推荐，皇帝任命。^②这种银行的“性质”甚至引起无数理论争论：银行是国家机构，即具有公法性质的机构，抑或具有私法性质的普通的股份公司。

① 见维贝尔博士《战争和银行》，载《国民经济时代问题》柏林国民经济协会出版1915年第7期。

除信贷银行外还成立专门的军事信贷银行，然而其作用还不那么大。

② 见W·鲍姆加尔《我们的帝国银行，其历史及现状》1915年柏林版。

我们在这里还要提一下所谓消费调节；实际上这一领域纯属流通；这是财富的分配过程，而不是它的消费过程，因为消费过程是根本不在经济考察范围之内的。我们指的是各种各样的配给证和其他措施：面包、黄油、肉等等的配给证。

国家政权的干涉在某些国家达到巨大的规模。在德国这导致对一切食品分配的调节和“共产主义的”大众餐。然而这种形式的国家干涉极不稳固，毫无疑问，将随战争的结束和德国经济孤立状态的消灭而消失。

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下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首先是对进出口的各种各样的禁令和限制，然后是整个关税政策、贸易协定、对国外“民族工业”的支持、各种奖励、寻求租让和有利的公债等等的整个体系，还有直接掠夺、割取别“国”领土供“自己的”金融资本的垄断利用，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

我们来总结一下。帝国主义国家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完全相反，其特点是职能极端复杂化和猛烈地侵入社会的经济生活。它表现出一种要掌握全部生产领域和全部商品领域的倾向。过渡类型的合营企业将被纯粹的国家调节所取代，因为这样可以继续完成集中化过程。各统治阶级（准确点说，一个统治阶级，因为金融资本主义逐渐使各统治阶级的不同小集团归于消失，使它们结成一个统一的金融资本主义集团）的全体成员都成了庞大的企业—国家的股东、入股者。^①国家从剥削的保护者和庇护者变成了统一的、集中的剥削组织，直接与之对立的是作为剥削对象的无产阶级。就象市场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分给工人一份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口粮。按照等级建立的官僚机构同军事当局密切配

① 由此产生直接把整个帝国经济变成股份企业的“计划”。例如参看海尼施·宁康普《帝国—股票—社会》柏林—夏洛滕堡版。

合履行其组织职能，而军事当局的意义和作用正与日俱增。国民经济被按军事方式建立的、能支配庞大的、守纪律的陆海军的国家所紧紧缠住。工人在斗争中不得不同这一庞大的机构的整个力量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每一次发动都将是直接反对国家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再是两个范畴，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也就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起义。

只要在上述纯粹的经济关系形成以前不发生社会灾变，不久的将来就会是这样的。

不难从社会经济方面评定此类生产方式，其不成熟的形式就是目前的军事社会主义，即几乎所有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军事化。许多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谈论国家社会主义。例如，我们引证过的克拉曼教授写道：“现在国家政权出于军事考虑而采取的所有支持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手段的强有力的作用使我们……大大接近国家社会主义了。然而不是通过有人害怕，有人喜欢的途径。这不是国际的松弛的社会主义，而是民族的坚强的社会主义。我们在临近各种社会主义。这不是民主共产主义，更不是贵族的阶级政府；这是使各阶级和解的民族主义。”^①而修正主义分子E·费舍一边断言，“社会主义实质上无非是把国家思想移用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一边竭力追求社会主义，把不同工业部门的垄断化起了诸如“电气社会主义”、“水力社会主义”等等怪名称。^②这些荒谬词句模糊了事情的真正本质。此实质在于，“军事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反而使之极端尖锐化。在理想的帝国主义国家

① M·克拉曼前引书第22—23页。

② E·费舍《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反对这种观点的有齐夫曼（《战争使我们更加接近社会主义》）、汉斯·克佩教授（《军事经济和社会主义》，马尔堡1915年版）等等。G·迈尔全面提出了这一问题（《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军事经济》。另见奥托·普兰格《战后的德国国民经济》）。

里任何次要的形式都没有模糊剥削过程；国家被剥去了一视同仁地关怀一切人的超阶级机构的伪装。这一事实是个基本事实。它彻底粉碎了叛徒们的论据。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国家，而是在社会领导下的得到调节的生产（国家社会主义是胡说八道），是消灭阶级矛盾，而不是加剧阶级矛盾。调节生产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在每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在每一个奴隶主的自然经济单位中都存在这种对生产的调节。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碰到的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出一点来反对这种说法，这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将会是目前正在形成的关系的逻辑界限、纯粹形式，因为工人获得的将会是一份口粮，“扶养费”，而不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等价物；正如市场价格被代之以产品的有调节的分配，同样，工资的形式将会消失，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使工人变成奴隶的雇佣劳动。而由于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所以不能用这一术语去说明意味着消灭雇佣劳动的那种关系。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在存在统一的世界国家的情况下这种反对意见才会是正确的，才会为正在形成的这种类型的关系找到某种新的说法。既然没有出现这种状况（也完全不可能指望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我们在《共产党人》上已经说过），既然在世界市场上还存在无政府状态，那就会保留价值和工资的范畴，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现在企业—国家取代了单个企业的位置，劳动市场将是世界劳动市场，劳动力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流动加强了。也同样不能认为，国家能够想当然地规定价格，而劳动价值规律将失去其作用。因为设想一个闭关自守的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国家是荒谬的。世界市场的压力依然存在。

总之，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完备的形式。组织的过程逐渐消除“国民经济”机构个别部分的无政府状态，使全部经济生活处于军事化国家的铁蹄之下。

三、组织过程,国家政权和工人阶级

1. 国家政权发展的辩证法: 重商主义, 曼彻斯特派, 帝国主义。
2. 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过程: 一系列资产阶级组织的产生。
3. 国家政权发展的辩证法: 统治阶级的唯一组织——组织之一——无所不包的组织。
4. 工人阶级和国家。

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公式”发展的。此类历史玩笑也适用于国家。我们就拿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吧,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印有国家的印记。国内外都盛行国家干涉; 调节对外贸易、奖励制度和各种各样的优惠、给予专利权等等——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是对重商主义时代的全盘否定。工业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中得到了自己的政治体现,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自然”进程所作的任何微小的严重干涉都是有害的和注定要失败的实验。此类理论极为流行, 例如斯宾塞认为, 全能的国家是军国制度的残余, 是不适用于工业国家及其“自愿合作”^①的。如果说自由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是对重商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否定, 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作为它的基础, 从国家政权职能发展的观点看来, 乃是否定之否定。某些人用“残余”来解释发展的最新倾向, 这只有用传统和思想的情性, 用不懂得现代关系并把帝国主义时代以前的过时观点用于我们时代来解释。实际上我们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国家重新侵入经济关系领域, 其力量是空前的, 其规模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美洲印加人的阶级的“共产主义”等等还研究得很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组织过程, 就社会生活的

^① 斯宾塞《人对国家》。

经济方面而言，这一过程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发展得最快。

我们知道，这一过程经济上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企业主组织异常迅速的发展：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科奈尔和瑞恩、同工人组织斗争的专门联合会、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各种各样的机构（请比较俄国的“〔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但是不要认为组织过程只涉及经济。它的意义要广泛深刻得多。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资产阶级没有听任任何一个社会生活的角落处于无组织状态。为了精神上控制群众设立了教会组织及其到处分设的机构、学校和有组织的报刊。向居民提供的丰富的日常“精神食粮”早已不是私人事务了：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讯社、新闻局、各种记者联合会，最后还有严格调节资产阶级谎言生产的一系列报业托拉斯，等等）承担了“现存制度”的支柱的光荣职责。科学也早已越出原始的无组织状态：从化学实验室的实验或者对微生物的研究，到考古发掘，各种考察研究都是有计划地系统地进行的，管这些事的是科学院、学者代表大会、起组织作用的专门出版物、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专门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实验站、实验室和天文台，它们是真正的科学工厂，等等）。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是有组织 的政策。资产阶级一帮还从来没有象现在，在金融资本主义下，这样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统治阶级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逐渐失去自己的特点，变成单一的帝国主义政党；各资产阶级政党所有频繁的联盟（特别是在同革命社会民主党进行共同斗争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民主主义和先前的自由主义残余的消失，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过程。这一无所不包的组织过程囊括一切到何等程度，只要列举一下任何一个领域的无数的团体、集团、协会及其他组织就够了。我们以殖民政权的宣传为例。1906年法国为此目的服务的有各种各样的地理学团体：“殖民联合会”、“杜普里委员会”、“殖民宣传协会”、“殖民的法兰西”、“殖民和航海

行动”、“殖民和航海研究会”、“法国殖民和垦殖会”、“法兰西的殖民”、“法国人向国外和殖民地无偿投资协会”、“法国妇女侨居会”、“法国妇女殖民资助会”、“法属非洲、法属亚洲、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法属大洋洲委员会”、“法属西非宣传委员会”、“印度支那工商委员会”、“非洲协会”、“阿尔及利亚研究会”、“棉花垦殖协会”、“橡胶垦殖协会”、“法兰西文化同盟”、“法兰西无神论研究会”、“法国反奴隶制研究会”、“绿十字会”，等等。^①

这样，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组织（关于无产阶级组织下面再谈）。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分散在各基层组织，在制订集体意志的某些领域扎根，提出并解决一般任务。最后，帝国主义发展的要求促使资产阶级社会动员其一切力量，把组织程度扩大到最大限度，国家把所有的资产阶级组织统统吸收进去。

战争在这一点上也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哲学和医学，宗教和伦理学，化学和细菌学，所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和“军事化”，就象工业和金融一样。整个技术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庞大机器更有计划地开动起来，很快产生了对“整体”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适应，即国家通过这一或那一途径把这无数的团体纳入自己的总的组织之中。报上曾有过报道，说资本家提出怎样用战争造成的大量尸体去制造硝酸甘油的问题；需要的只是用科学的办法找到这种用廉价的原料得到高额利润的最好的制造方法。我们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确实，在某位可敬的资产者脑中是否出现过这种天才的思想。因为这条消息反映了事情的真正相互关系——诚然，是在略带讽刺的形式之下的。从冷酷的“国家理性”观点，即从处于

① 保尔·马苏《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殖民开发。马赛殖民成果展览》1906年版第1卷第61—62页。

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寡头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群众是谋取超额利润的会说话的工具。正如机器的损坏部分或工业的排泄物可以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加以利用一样，也可以利用人类尸体中蕴藏的能量。从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观点看来，医生、女护士、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此类组织的活动只不过是用来修补虽有损坏但尚可利用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工具而已。而同坏血病、伤寒和霍乱作斗争的学者们的活动，只不过是往巨大的死亡机器注油以消除不必要的摩擦的润滑工的活动而已。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国家政权组成了吸引这些组织的中心，把这些组织变成国家巨人的辅助机关。

所以，国家发展的总的图式如下：起初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唯一的组织。然后开始出现其他组织，其数量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大为增加。国家从统治阶级的唯一组织变成其许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同时作为最具一般性质的组织而存在。最后，出现第三个阶段，这时国家吸收了这些组织，再次成为统治阶级的有内部技术分工的唯一的普遍的组织；过去各独立的组织集团变成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分部，此国家机器以毁灭性的力量去打击内外敌人。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完备型式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铁的组织，它用自己的贪得无厌的强有力的爪子紧紧抓住活的社会机体。这是新的利维坦，在它的面前托马斯·霍布斯的空想只不过是件小小的玩具而已。而目前“尘世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与之比拟”。^①

我们现在应当提出关于工人、无产阶级组织的作用这一非常自然的问题。

理论上这里有两种情况：或者工人组织如同所有资产阶级组

^① 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名言，见《托马斯·霍布斯道德和政治著作》1750年伦敦版。

织一样长入一般国家组织，变成国家机关的简单附属品，或者它们冲破国家的框框并从内部炸毁它，同时组织自己的国家政权（专政）。第一条道路是盖得们、普列汉诺夫们、谢德曼们、韩德逊们、布兰亭们等等黄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辅助机器、它的“工人部”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李卜克内西、霍格伦、马克林、穆拉诺夫以及其他同志的道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我们现在处于革命化的总进程之中，它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大量行动、“各派别”的斗争和前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上，这一进程意味着第二种结局的可能性在增长，意味着通过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克服民族的帝国主义的工人政策。这种结局的物质基础是帝国主义政策对资产阶级状况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状况的影响。只要帝国主义还披着其“进步的外衣”（战前的“和平”扩张），帝国主义情绪一定会在无产阶级中间发展。但现在笼罩着帝国主义的是冲突，并且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加在国际无产阶级身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需要是继续帝国主义政策，而无产阶级的生死攸关的需要则是消灭帝国主义，而随同帝国主义一起消灭的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本身。

只要不发生社会主义变革，国家机体最近唯一可能的发展形式是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化将成为军营的集中化；在上层中间必然加强最丑恶的黩武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粗野的机械训练和血腥迫害。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任何发动在这种条件下都必然变成反对国家政权的发动。由此得出一条明确的策略要求：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强调自己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这里说的是在议会——应当投票反对实行任何垄断，反对任何关税联盟等等。这并不是因为象党中央的某些拥护者所竭力证明的，这些新措施意味着经济

上的退步。相反地，从孤立的经济观点看来，并且从“民族”局限性的观点看来，作为继续集中化的形式，这些形式意味着毫无疑问的进步。问题根本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一过程无非是加强和支持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现代国家，意味着支持军国主义。当前的历史任务不是要关心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它已完全够了），而是准备对统治的强盗实行全面进攻。^①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将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利用其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权力的临时国家组织，并且在击退反动势力的一切反攻，扫清社会主义人类自由发展的全部道路之后，最终取消自身的专政，一劳永逸地钉上一个白杨楔子^②……

（手稿至此中断，以后稿纸遗失。）^③

译自《法的革命》文集 1925 年共产主义科学院
出版社莫斯科俄文版第 1 辑第 5—32 页。

（郑异凡译）

① 某位“颀梧的”读者会说，社会民主党总是采取发展生产力的路线，因而甚至社会主义也是合适的，因为它使生产力的发展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断定，目前这（相对短暂的）过渡期间对我们提出的是另一种要求。比如说，这正象在起义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害怕暂时破坏部分生产力（对此感到害怕的是叫喊工业毁灭和无政府状态的司徒卢威先生）。归根到底，生产力的发展将更为迅猛。

② 俄国古代迷信，在巫神的坟上钉上一个白杨楔子，就能镇住他，使不再为害。——译者注

③ 列宁在对此文的评注中的最后一句引文是：“一劳永逸地在国家的坟头上钉上一个白杨楔子……”。列宁接着在括号内写道：“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参看《列宁文稿》第 2 卷第 398 页。——译者注

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俄]列·格·捷依奇

七

我们建立的组织从其成立的最初之日起就不走运，这一点已部分地可以从哈尔士林和其他工人们的态度中看出：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他们之中的优秀者都跟着民意党人走，而跟随我们的一小部分人远不都是勇士，或者说都是些不很觉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些很不坚强、很不可靠的人，这一点后来很快在颇有名气的排字工人扎尔柯夫身上得到了证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格·瓦·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我们在工人中间之所以失败的正确解释。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说：“到 1879 年年初时，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得比民粹主义学说高出整整一头。参加大约于当时建立的‘北方俄国工人协会’的一部分最有觉悟的彼得堡工人在政治观点和意向上同民粹主义暴动派大相径庭……即使从当时我们的民粹主义观点来看，协会的成立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它的纲领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快：其中——啊，天哪！——竟然说，工人们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这些蔑视‘资产阶级’自由并认为它是危险的骗局的人竟落到了母鸡孵野鸭的境地。”①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孵出来的野鸭”奔到水里去了，即跟随民

意党人了，他们提出的目标是通过再次谋刺沙皇的办法以求得格·瓦·在回忆录中正确地强调的“在七十年代时，首先在工人纲领中出现的東西，即政治自由的要求”^②。

我们土地平分派在把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社交界人士，一句话，即当时集中着革命干部的那些阶层吸引到我们方面来的事情上也是很不错的。分散到各地的，多半是分散到各大学城市的“土地平分”社成员很快就深信，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目标毫无吸引力：大家的同情都倾向于我们的政敌——恐怖派。治理朝政如此出色的亚历山大二世，到那时在一些稍有教养和文化的居民阶层中不仅丧失了威望，而且引起了深深的仇恨和强烈的愿望，希望恐怖派分子很快将他杀死。因此，许多人都准备为这项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根本打算来切实地支持我们和我们的实际活动。

我们同农民的联系就更加可悲：我们在那里根本失去了任何联系。在前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破坏，这是由被揭发出来的罪行引起的，因为索洛维也夫在谋刺沙皇以前曾在农民当中，“在居民点”进行活动。鉴于这一事实，警察局将所有在他们看来稍有怀疑的嫌疑犯从乡镇和村庄中彻底清洗，由当时重新设立的编制庞大的警察局加以严格监视。

鉴于这种情况，雅·斯捷法诺维奇、米·罗·波波夫、尼古拉也夫等曾经同农民有联系的一些同志想要重新建立联系的尝试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此，“土地平分”社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的組織，即根据我们巴枯宁主义的观点，抱着建立基地并且积极参加可能

① 见《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一文（第66—67页）。顺便指出，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这个协会的成立时间是不确切的：他把它说成是在1879年年底以前，实际上它是在1878年年底时成立的。关于这个协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详细情况，除了见格·瓦·的这篇文章外，还可以见我的关于奥勃诺尔斯基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3期第39—61页。

② 《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第69页。

发生的暴动这样一个宗旨的组织，既然在农民当中已没有任何联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任何意义。

于是出现了十分荒谬的现象：有一个多少象样的司令部，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

我们组织的这种可悲局面是在 11—12 月间，即在这个组织诞生的一两个月之后发生的。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的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不过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使我们的一些同志敲起警钟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在 1879 年 11 月在民意党人炸毁莫斯科附近沙皇乘坐的火车之后，各种严格措施、迫害、逮捕和判刑又大大加强了；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搜查时自然带走了许多无辜的人。而政府和行政当局形成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似乎领导革命组织即所谓“执行委员会”的是：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斯捷法诺夫和我。因此，我们一旦落网，无疑会把我们处死的。这样我们会由于完全与我们无关的事业，即根据我们当时的深刻信念来说不仅不能加速，相反只能延宕我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这一点后来被完全证实）的活动而付出代价。

结果，在 12 月底，来自南方各个城市的一些同志在彼得堡聚会。在交流情报和交换感想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办？鉴于国内已经形成的上述局面，我们的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聚集在公共的“秘密住所”里的同志，其中包括我上面列举的四个受特别注意并遭搜捕的“土地平分”社成员来说，十分明显的是，迷恋恐怖的时期已经来到了，如果这个时期没有结束，我们想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活动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只好等待，只好继续出版我们的机关报，并尽可能地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那时，有几个同志——阿普捷克曼、斯切法诺维奇、皮扬科夫——坚持认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斯切法

诺维奇和我必须到国外去，以等待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比较有利的时机。

我们中间谁也不愿意离开战场，变成正如我们当时担心的长期的侨民；但最后我们不得不服从同志们的一致决定。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是个惯于遵守纪律的人，他比我们中间的其他人更不坚持己见；此外，他立刻看出了这次旅行的好处：可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弥补自己身上的这一缺陷。

我比起别人来更为动摇不定。普列汉诺夫发现这一点以后，开始来说服我，证明留在俄国，为“他人之事”而牺牲没有什么意义。

他说：“不！最好还是一起去国外学习吧！”

1880年1月，我们四个人重新出国，到了瑞士。这里顺便说一句，后来尽管在国外给我留下了远非愉快的印象，但是我也从来没有为我听从了同志们的建议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忠告而感到遗憾。相反，对此我始终非常感激他们，特别是感激普列汉诺夫。

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到日内瓦以后，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据我记得，除了研究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的各种问题以外，他还开始根据第一手资料钻研有关第一国际的所有问题。因此第一国际的章程在他的记忆中铭印得如此深刻，以致当他一条一条地引用章程的时候，记得曾使一些老的、熟悉情况的国际协会会员都感到莫大的惊讶。

了解第一国际大大有助于他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有助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在这方面，普

列汉诺夫从童年时起就非常精通的法语大大帮了他的忙，而当时第一国际的所有文件、记录和宣言等等都已经用法文出版了。

与此同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还读了这样一些著作，如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和马克思为此而写的、作为对它的回答的《哲学的贫困》。

记得普列汉诺夫读完这部书以后欣喜若狂，并对马克思赞赏不已。同时，他还因为不懂德语，不可能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原版著作而深感遗憾。于是他立即着手学德语，并且很快就取得成绩。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生活在日内瓦的侨民当中，也象过去在彼得堡一样，非常善于支配自己的时间，从不白白浪费光阴。

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到国外的時候，正值俄国广大国土上的各民族的侨民人数显著增加。上面我已说过，在俄国由于恐怖活动而引起的极端镇压措施也对侨民人数的增加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我们每个人自然对其他侨民的心情、感受和消息都很感兴趣，因此当我们在俄国人的图书馆里，在著名的格列索夫人（她是一位巴黎公社委员的遗孀，很受我们大家钦佩）的饭馆里，以及我们都很喜欢的咖啡馆里见面的时候，我们经常彼此交谈。除了这些地方以外，所有侨民还都喜欢参加我们每星期举行一次的集会，会上有人做某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后大家就进行讨论。

尼·莫洛佐夫、奥里加·柳巴托维奇、格·罗曼宁柯、阿龙契克和其他一些恐怖派分子几乎与我们同时也到了日内瓦。这样，在我们这些公众集会上就对俄国最迫切的问题，即关于不久前出现的两个革命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的观点和策略问题开始进行争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在这里立即大显了身手。

早在喀山广场上举行游行示威时，他就博得了杰出“演说家”

的声誉，因此他的绰号也就更加出名了。但是，在我所描述的他第二次出国之前，这种大显身手和进一步发展他的巨大才能的机会还不是很多的。鉴于我上面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的在俄国当时盛行的各种严格措施和迫害手段，要举行规模稍大的革命集会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当时举行的那种不设主席团、人声嘈杂的集会的性质本身，自然无助于发挥演说家的艺术。诚然，尽管一切条件都很不利，普列汉诺夫在1877—1878年冬在彼得堡举行的一些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巴枯宁派”和“拉甫罗夫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上据大家反映是表现得出类拔萃的。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之前，在我们同恐怖派之间展开争论时，他也表现出自己是个并非装腔作势的演说家。

记得有一次热里雅鲍夫愤怒地对我说：“你们那个若尔日的舌头可真厉害、毒辣啊！”的确，在这之前热里雅鲍夫曾遭到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克的痛斥，虽然热里雅鲍夫本人正如大家知道的也并非没有语言才能的。

不过，只有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在集会、言论等充分自由早已盛行的国家里，普列汉诺夫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才有可能大显身手。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他在最初几次的侨民集会上正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我们这些日内瓦的侨民集会几乎完全具有西欧的性质：集会是在某个餐厅的单间大屋子里进行的，屋子里摆着一些小桌和椅子，参加集会的人都是“自费的”，即自己付饮料和小吃的费用。然后，与会者选出主席等等。甚至日内瓦集会的参加者也同我们在俄国的秘密集会不一样：在俄国的集会上参加的只有自己的兄弟、同年人、年轻的革命者，而在日内瓦集会上，参加的除了这样的青年以外还有上了年纪的人，有时甚至有年高望重的侨民，如尼·伊·茹柯夫斯基、赫里斯朵福罗夫、日曼诺夫、列·梅契尼

柯夫、德拉哥马诺夫，他们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教养和经验上都与众不同。因此很自然，年轻的侨民在这些集会上不可能象在俄国的秘密集会上那样感到自由自在。相反，绝大多数人都很拘束，甚至不敢出声地说话。不过，普列汉诺夫从第一次集会起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记得那次集会的报告人是谁，或许就是他本人。我只知道，起来发言进行反击的民意党人论战者之一是那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即斯捷普尼亚克）。态度极其端庄有礼和文质彬彬的“谢尔盖”（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缺乏演说家的才能；不过他在这样的集会上毕竟把自己的想法都和盘托出了。他讲得很随便，毫无自命不凡之意，也从不伤害别人。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认为既没有必要考虑谢尔盖在侨民中所处的地位和他的卓越品德，也没有必要考虑他作为论战者的弱点，就以他所固有的全部热情和奋激的精神，挖苦地对他进行抨击，仿佛克拉夫钦斯基并不是不久前还作为《土地和自由》杂志的编辑而共事的亲密同志，而是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场辩论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的同情不在格·瓦·一边，相反，许多人经过这场辩论之后开始站到克拉夫钦斯基一边去了。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个杰出的演说家和难于冒犯的论战者，因为他有一条很“毒辣的舌头”。

从那时起他就享有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具有全面教养的年轻人的声誉。在这方面，仅举两件我迄今还记得的事。

在我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一次集会上，米·德拉哥马诺夫教授谈到了小俄罗斯的哥萨克。德拉哥马诺夫作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乌克兰问题的专家，听到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说明他很了解相当专门的有关文献）而感到十分惊讶。结果，在这次集会结束以后，我们三人——德拉哥马诺夫、普列汉诺夫和

我——一起走出来，继续谈论着这个问题。

——请问，格·瓦·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读了这些文献？——记得这位专家怀着非常惊讶的神色问道，一边还列数着普列汉诺夫所援引的一些原著。

——去年我在基辅呆了几个月，我在那里看了这些书，——普列汉诺夫回答说。

当德拉哥马诺夫走过几个街区，向我们告别时，说：

——是啊，普列汉诺夫不象是那些否定知识并总想在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去发动起义的暴动派。

显然，德拉哥马诺夫是在暗暗讽刺我们奇吉林人，在这以前他曾斥责我们不了解乌克兰、查坡洛什和海达马克等等的历史。

另一件事是关于著名的列夫·伊里奇·梅契尼柯夫在一次我们侨民集会上做的《神和鬼》的报告。情况几乎同德拉哥马诺夫那一次完全一样，梅契尼柯夫也对格·瓦·如此熟悉这个问题的文献感到惊讶。

九

在我们离开彼得堡以前，“土地平分”社的同志们请我们尽力从国外帮助他们的活动；他们还答应将情况随时告知我们，并在物质方面给以支援。此外，为了进行宣传，他们认为除了出版《土地平分》这个规模不大的刊物以外，最好在自由的瑞士出版我们这一派的定期的或者至少是不定期的大型杂志：他们答应寄给我们为办这件有益的事所必需的钱，因为187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村社》杂志在这以前一年停刊以后，巴枯宁派在国外就没有一家俄文刊物了。

普列汉诺夫本应担任这家新杂志的主编，虽然由于在国外不

可能同时编辑在彼得堡出版的《土地平分》刊物，但他还是准备在那上面撰稿。

这样，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除了从事“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学业以外，还要从事有益的社会活动，作为撰稿人在两家革命刊物上撰稿。可惜的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在我们到达国外以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使我们痛心的消息，由于工人扎尔柯夫的出卖，我们的印刷厂连同正在排版但还没有完全排好的《土地平分》第一期都被没收了，当时留在彼得堡的我们组织的成员也几乎全被逮捕。

这次破坏对于我们这一派，即革命民粹派来说是个无法弥补的打击。随着我们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的被捕，不但不能指望在国外创办杂志，而且也不能指望在彼得堡恢复《土地平分》的刊物，这一点后来也很快被证实了。由于这次破坏，我们原打算从国外来帮助民粹派的上述四人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情况尤其糟糕：他不可能全身心地从事智力活动，因为他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谋取生活资料。

不过，1880年2月在巴黎发生了一件相当可悲的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俄国的暗探抓获了参加在莫斯科郊外爆炸沙皇火车的列夫·加尔特曼，俄国政府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要求法国把他引渡。法国当时为了报仇，指望在俄国身上找到同盟者，因此准备满足沙皇的愿望；但是，我们侨民们不答应，从而唤醒了最激进的法国民主派。为此目的，我们日内瓦的侨民派了两名代表到巴黎：老侨民、巴枯宁的朋友、国际俄国支部的书记尼·伊·茹柯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作为以拉甫罗夫为首的十二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巴黎后，就前去晋见当时权力无限的议会主席甘必大，要求不把加尔特曼引渡给俄国^①。大家知道，经过长时间的惊恐和担心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

——共和派的法国拒绝了俄国政府的要求，加尔特曼只是被放逐到了伦敦。

在这次访问巴黎期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同拉甫罗夫和其他一些当地的俄国侨民一起，为出版相当有益的出版物《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奠定了基础。两年以后，正是在这个出版物上，发表了由普列汉诺夫翻译和作序的、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序言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大家知道，它在所有文明国家，特别是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

普列汉诺夫受这个出版物的编辑人员的委托为《社会革命丛书》写了关于任务、大纲等声明。总的说来，他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这一点从不久前我发表的他同拉甫罗夫的通信中可见一斑。^①

在格·瓦·这次逗留巴黎的一两个星期中，他同拉甫罗夫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几乎是朋友式的关系，尽管在年龄、气质和观点上他们两人相差甚远；大家知道，彼得·拉甫罗维奇是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者，因此对于截然对立的观点也总是非常容忍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则相反，从年轻时起就追求一致性、彻底性，他的特点就是不容异见。但是，在对拉甫罗夫的态度上，他表现得非常克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些忍让，如果问题涉及到非本质的意见分歧的话。这一点主要说明他对彼得·拉甫罗维奇当时是怀着诚挚的敬意的，这样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883年分裂为止。在这方面，部分地起作用的还由于拉甫罗夫对他的关怀和体贴而使格·瓦·对他怀着感激之情，这一点可以从上面所述的他给彼得·拉甫罗维奇的信中清楚地看到。在1881年10月30日的一封信（第8封）

① 关于俄国侨民派代表和甘必大对我们的接待以及拉甫罗夫代表的演说，格·瓦·后来在叙述时说得很幽默，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这件事了。

② 见《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彼·拉·拉甫罗夫通信》，载《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第78—109页。

中，普列汉诺夫写道：“自从‘批判的思维’在我身上开始觉醒时起，您、马克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成为在各方面培育和发展我的智慧的最爱戴的作者”，但从这封信的以下内容看，这些话是由于拉甫罗夫对他的帮助、在物质上的支援、给他以忠告、指示和建议而表示深深的谢意而发的。他接着说：“由于您的帮助，或许我有机会工作并得到发挥，不至于陷入饿死或者告贷而又无法偿还的境地。再一次地感谢您，彼得·拉甫罗维奇。”

只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感情所引起的特殊情绪的影响，才能说明普列汉诺夫认为巴甫罗夫同马克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是“最爱戴的作者”。无论在这之前，或者在这以后，格·瓦·都从未对他最接近的人中的任何人说过类似的话；而众所周知，从他对拉甫罗夫的书面的和口头的意见中，普列汉诺夫对他作为青年的“教育者和启蒙者”是评价不很高的，不仅要比别林斯基低得多，而且甚至比巴枯宁或者赫尔岑还要低，然而他也从不把巴枯宁或者赫尔岑列入他的“最爱戴的作者”之列。显然，这些话是在片刻情绪的影响下才写出来的。

在我描述的这段时期里，即从1880年冬至1882年底，拉甫罗夫在政治观点上是同我们土地平分派完全一致的，而对民意党人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在口头上和在自己的书信里向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说过。在那些年代里，彼得·拉甫罗维奇相当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一切活动和计划，他也在《土地平分》上撰稿，等等。

他对我们这一派以及这一派在国外的少数代表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要归功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因为拉甫罗夫非常器重他，认为他是个天生富有才华的人，并预言他有辉煌的前途。拉甫罗夫早就对普列汉诺夫的演说才能评价很高，不记得由于什么缘故，彼得·巴甫罗维奇有一次说过：

——格·瓦·，您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

据我记得，他说这番话不是一种责备，而是一种夸奖。

十

1880年春普列汉诺夫在巴黎短暂逗留期间，正逢法国首都开始活跃，由于宣布大赦到处充斥了从流放地和侨居地回来的公社战士，这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看来，也是在那时候他下定决心完全移居到那里去，并等待罗札丽亚·马尔柯夫娜（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在一年或一年半以前结识的）到国外去。

在他回到日内瓦以后不久，以我们的老朋友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我们土地平分派组织的幸存者之一、全权代表叶甫盖妮亚·科兹洛娃—鲁宾契克来到了日内瓦。她给我们带来俄国同志们的几封信、手稿和一些钱，一部分作为在国外从事出版工作之用，一部分作为我们的生活费用。

对于这位女代表的到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我们的组织还不是一切都完蛋了。在她带来的信中，同志们请我们在国外重新出版《土地平分》第一期，因为在遭破坏以前，在彼得堡秘密印刷所里总共只印完了很少的几份。他们还请我们在国外出版以后的几期，直到他们在俄国重新办起秘密印刷厂为止。鲁宾契克还给我们带来《纲领》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为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国外出版的杂志而起草的篇幅很大的《说明》。

在这位女代表带给我们的一封长信中，巴维尔·波里索维奇向我们保证说，出版用的钱将立即寄来。这一切在我们得知由于扎尔柯夫的出卖使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而感到难过之后，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只有阿克雪里罗得的另一点小意见使我们有些扫兴：他建议

我们邀请德拉哥马诺夫作为俄国同志们建议的出版物的经常撰稿人之一，他同德拉哥马诺夫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朋友的关系，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同他观点一致，特别是在联邦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

而我们——普列汉诺夫、斯切法诺维奇和我——则相反，很快对德拉哥马诺夫有了深刻的了解，只跟他保持表面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在我上面所述的日内瓦集会上发生的我们与他之间的冲突而很快转成为敌对的关系^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同他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并坚决拒绝履行阿克雪里罗得的要求：无论是在《土地平分》上，还是在另一个杂志上，我们都不请他撰稿，这一点自然使这位有才智的、然而妄自尊大和器量狭小的人对我们更生反感。

大约从那时起，部分地也是在同德拉哥马诺夫的这些冲突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开始从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联邦主义转向国家制和集中制。

上面我已说过，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在《土地平分》第一期上曾维护“联邦主义”，两年以后他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谈到：“现在我很遗憾，我竟同意参加《土地平分》这家‘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机关报’。我现在同德拉哥马诺夫发生争论，早晚我们得进行一场殊死决战。”^②

但是，不言而喻，并非只是与德拉哥马诺夫的意见分歧对普列汉诺夫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使他在短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联邦主义的狂热维护者变成为热情的反对者，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其他所有社会—政治问题上一样，起主导作用的是他比较扎实地阅读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各种巨著，以及了解西欧工人

① 详细的情况我在《欧洲通报》1913年上刊载的《放逐中的德拉哥马诺夫》和《俄罗斯侨民与乌克兰侨民》两篇文章中已有叙述。

② 见《普列汉诺夫和拉甫罗夫通信》第十二封。

运动发展的进程。

上面我已提到普列汉诺夫在德语学习上很快取得了成绩；他很快开始相当自由地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的大量的原文的通俗小册子。据我记得，在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来到日内瓦的那年年底，他同她一起阅读了弗·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著名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在这之前不久以单行本出版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就。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这部著作感到十分欣喜，非常赞赏它，并把它推荐给别人。他把这部著作称为“经典著作”，他说这部书对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作了许多说明。此外，普列汉诺夫也对恩格斯的另一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恩格斯的几乎所有小册子《论住宅问题》、《农民战争》、《俄国的社会问题》、《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等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一本又一本地读着这类篇幅不大的作品，同时也锻炼自己阅读的速度，了解许多新的思想和见解，也部分地了解事实和情况。他先阅读这些通俗性的对他来说是新的外语小册子，然后再阅读大部头著作，记得这使他非常欣喜，因为在他开始学德语以前，他似乎觉得他不会很快就掌握得如此熟练。

鉴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他们的许多德国信徒们的著作有所了解，他对德国人，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否定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已不再对他们进行挖苦，不再嘲笑他们，相反，渐渐赞扬他们，甚至推崇得比其余所有的文明民族还高，尽管他本人不直接了解任何一个德国人。

普列汉诺夫从学习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转而开始阅读德国诗人——歌德、席勒、海涅、弗莱里格拉特、海尔维格的原文版诗作，同时很快开始背诵这些诗作中的长长的片断，特别是背诵他推崇备至的《浮士德》中的片断。

由于自己罕见的才智和非凡的求知欲，格·瓦·的进步令人

难以相信地迅速，这一点引起了普遍的惊讶，尤其使我们这些亲近他的同志更加觉得高兴。同他进行交谈，听他叙述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倏忽又转而讲一段幽默的情节或俏皮的笑话，实在是一种享受。

我们天天都见面，越来越亲密地聚集在一起。在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热烈赞扬的影响下，我和维拉·查苏利奇也开始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一些信徒的著作，这一点自然又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这样，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小组就成了当时在西欧所有侨民中于 1880 年就开始阅读德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唯一的小组。在这方面，我们多半都要归功于格·瓦·。

不过，大家知道，一个人是不能很快就摆脱他早已形成的观点的，甚至当这些观点所依据的一切理由都被驳倒时，它们还会由于习惯，由于惯性而久久地保持着。我们的民粹主义观点，即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这个“容易染上的病症”，情况就是如此。

实际上，到我们叙述的那年秋天时，无论是格·瓦·，无论是维拉·伊万诺夫娜，无论是阿克雪里罗得（当时他也侨居国外），也无论是我，都已不再同意巴枯宁的观点，既不相信“基础”，也不相信似乎为我国农民所固有的各种美德；同时，政治自由和立宪制度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是“有害的”、“资产阶级的”设施，相反，我们认为它们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当时不但没有向别人，也没有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新观点同旧观点依然和睦相处，彼此互不妨碍。

因此，我们仍旧同少数免遭逮捕而留在俄国的民粹派进行联系，为在国外出版相应的刊物并非法地偷运等等而操劳。

与此同时，在哈尔土林在冬宫进行谋刺以后，于同年 2 月，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残酷的政治制度大大削弱了：由沙皇任命的既不是代理人也不是独裁者的洛里斯-梅利柯夫将军宣布“心灵专

政”，吹出了一股立宪的“春意”。所有这一切自然不可能不对我们侨民的观点和情绪发生影响，尤其不可能不对我们的小组——被抛弃了的“土地平分派”发生影响。

“民意党”由于进行了几次对沙皇的谋刺而迅速变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政党”，于是越来越赢得我国社会的先进阶层以及青年们的同情。

当时我们就说：“是啊，即使他们把沙皇刺死了，那么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不过，最好还是引用一下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真实观点，这个观点是在9月初在日内瓦而不是在伦敦出版的《土地平分》第二期上出于防范而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中加以阐述的。

普列汉诺夫写道：“无论是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三世，实质上都一样，都不得不标榜宪法，以满足上层阶级的利益。这样一来，上层阶级同君主之间的被破坏了的协调就可得到恢复，给忍饥挨饿的人民将会掷来一两片面包屑，冬宫的守卫者将来顶替‘议会’的守卫者，‘秩序’将恢复得使所有关心维护它的人皆大欢喜。”①

鉴于这篇社论无疑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土地平分》第一期上所阐述的观点，因此，我还想再援引其中的几段。

格·瓦·接着问道：“在腐朽的专制制度和新生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的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将起何种作用呢？他们是否要集中自己的精力来进行政治斗争，还是在人民中为自己寻求一种更加卓有成效、更加无愧于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进行经济革命的政党的事业呢？”就是对于这样一些完全用民粹主义精神来表述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已经跟认为立宪制度对劳动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1920年俄文版第56页。

群众有害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回答完全不同了。

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自然，我们这些不赞成人服从人、不赞成成为专制制度在俄国垮台而痛哭流涕的人们，我们这些为了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曾经付出百般努力和惨重损失的人们，是不会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的。我们懂得政治斗争的代价，因此只能为俄国的宪法将不会给它腾出足够广阔的余地而感到惋惜。我们欢迎为争取人权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有力，我们也就越加同情它…… 俄国一切正直的和自重的人们都将会同意这个要求。”

普列汉诺夫然后谈到，一种制度的更替始终伴随着人民的风潮，并预示在我国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到那时，他说：“假如迷恋于政治斗争的我们，任凭人民风潮迭起而不去参加，不去加以影响，那将是十分可悲的…… 我们应当把在人民中间的活动置于一切任务之上，因为它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在同敌人进行斗争时取得胜利的源泉。”

然后，格·瓦·列举了在劳动群众中间发生的风潮，根据他的意见，革命者应当积极参加这类风潮，不过他表示遗憾说，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他写道：“奇吉林事件就是利用农民中间偶然爆发的风潮来达到在他们当中建立多少比较广泛的革命组织目的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唯一可以称作尝试的结果未必证明……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根据当时比以往更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格·瓦·的意见看来，俄国革命者的实际任务应是什么呢？请看，他接着写道：“当人民的注意力被国内的政治事件激发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宣传通过言论和行动(?)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拥有特别留意倾听的听众；我们还认为，一旦在人民中爆发风潮

时，我们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去扩大它，组织它，并给它灌输尽可能广泛的革命思想。但是，为此就必须事先同人民取得联系，并巩固自己在人民当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格·瓦·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继续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甚至还援引了带着伪造的沙皇诏书的我们奇吉林人的尝试。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例说明在思想领域中的因循守旧和惯性作用吗？

或许不了解我们当时的观点的读者会认为，普列汉诺夫在上面这段话中所说的劳动群众指的不是农民，而是工人！那就让我们听听他自己说的话吧：

“当我们谈到俄国社会主义活动的条件和方式时，我们指的主要是农民阶层……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目的是某种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我们绝不否认在我们的工业中心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这种否认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预先确定，当俄国经济革命的时钟敲响的时候，劳动居民中的哪些阶级将会成为社会革命大军的主力。目前，俄国的工业发展微不足道，而‘劳动群众’的概念几乎也就是‘农民’的概念。因此，当我们谈到实际活动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农民的经济生活、需要和要求……不过，当我们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俄国的工业也不会踏步不前……经济问题的重心将会转向工业中心。”^①

对于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意见，我们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这里应当指出，早在离开彼得堡以前，我就对我们在农民当中进行活动以及对恐怖行动所采取的立场是否正确产生了疑问。换句话说，我已倾向于民意党人的观点，并愿意留在俄国，以便加入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50—63页。

他们的行列，而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只是出于同志的情谊。因此，当普列汉诺夫向斯捷法诺维奇和我朗读我上面所引的那篇文章的手稿时，我觉得，其中所述的观点使我们非常接近恐怖派，而要完全接近自然应当抛弃必须“同人民取得联系，并巩固自己在人民当中的地位”的说教，因为这样无疑又会使我们回到已经过时的和一去不复返的建立“居民点”的做法上去。

无论是格·瓦·，也无论是斯捷法诺维奇（他往往比我更倾向于在农民中间进行活动）都不同意我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唤起革命者到农村去的愿望还是可能的，而我当时已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同时我认为，向别人建议“同人民取得联系”，而我们自己则离开俄国逃往国外，是不很适当的。

我记得，普列汉诺夫轻描淡写地对我进行了驳斥，使我感到，实际上他比较同意我的看法，而不同意我的朋友斯切法诺维奇的看法。

十 一

到了秋天，普列汉诺夫和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一起移居到巴黎。关于以后他们在巴黎的一年的生活，我是从他们的来信和见面时的交谈中得知的。

他们的物质状况是极其艰苦的。在国外原来打算要办的许多事情——为农民、工人和革命者出版杂志、报纸、小册子和书籍，一件也没有办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知识分子对民粹主义越来越冷淡，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社会的先进阶层越来越指望洛里斯-梅利柯夫伯爵会实现他的愿望，会给予一部正如当时诗人马伊柯夫所说的“哪怕残缺不全的宪法”。

因此，我们从俄国几乎一无所得，而要在国外找到工作，对于我

们来说往往是很困难的。这对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来说尤为困难，因为他非常迷恋于理论学习，而又无应付实际的能力……加之，除了他和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以外，当时到巴黎来的还有罗扎丽亚的老朋友、医学院学生捷奥菲丽亚·波利亚克，她身患严重肺结核，又无任何生活来源。假如没有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彼·拉·拉甫罗夫对他的帮助，要养活三口之家，对于格·瓦·来说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可从已经发表的和我上面引用的普列汉诺夫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清楚地看出。

不过，尽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以致使格·瓦·及其亲人不得不备受贫困之苦，腾出大量时间去为谋生而奔波，向别人“告贷”两个法郎，然而他在求知和理论学习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当我们见面时他顺便谈起这一点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当我问他是否阅读了重农学派的原文著作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关于是否读过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他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当我惊讶地问他什么时候读的，格·瓦·说就在1880—1881年这个困难的冬季，当时他不间断地每天到著名的国立图书馆去几个小时。此外，他回家以后，尽管有许多不便——他住的房间很拥挤，室内又寒冷——，他还是要学习很长时间。

他在巴黎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很巨大的，这部分地可以从他当时写的、刊载在《祖国纪事》上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得到证明，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倾向》。为了不再在下面重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前说一下，一年以后，我在日内瓦见到普列汉诺夫时，他给我看了拉甫罗夫的信，其中拉甫罗夫引用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来信：后者满口赞扬这位署名为“格·瓦连廷诺维奇”的不相识的作者的上述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请彼得·拉甫罗维奇告诉他，这位“显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

者”究竟是谁。这以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就接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来信，信中建议他写一篇关于洛贝尔图斯的文章，这使普列汉诺夫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据我记得，他也对这位最庄重的和最受欢迎的杂志的编辑显然不懂政治—经济问题而表示莫大困惑。

格·瓦·曾说，“除了刊载瓦·沃·的明显反动的文章以外，米哈伊洛夫斯基不仅登载我的宣传彻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还建议我以后再写。他没有指出我的文章中的任何小错误、缺陷，显然他是同意我写的一切，但是既然他也毫无保留地刊登瓦·沃·的文章，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也是同意他的观点的。能够设想车尔尼雪夫斯基会采取这种态度吗？当然不会！”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普列汉诺夫在巴黎的情况。那时候，他同彼得·拉甫罗维奇还比较亲近，后者总是尽力帮助他，常常使他摆脱经济拮据的困境，还借给他一些必要的书籍和其他东西。大家知道，正是拉甫罗夫将格·瓦·的上述文章寄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但是，对于普列汉诺夫来说比起借钱借书这些小事来更为重要的是他同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的经常的和长时间的理论交谈，尽管他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格·瓦·无疑从这些会见中得到很多教益。

普列汉诺夫在这年冬天的另一次结识——同茹尔·盖得的结识对他说来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有一次，盖得前来感谢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为他的妻子看病，这时，他结识了格·瓦·，他们两人谈论着社会主义——盖得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以外，他就是数一数二的了。交谈一直持续到深夜。显然，盖得对于这位年轻俄国人（格·瓦·要比他年轻得多）的博学多才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感到惊讶。

在同这第一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邂逅相遇以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极其良好的关系，这关系一直保持到普列汉诺夫逝世为止。同这位杰出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接触无疑对格·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格·瓦·的气质中，有许多东西是和盖得共同的；盖得也同普列汉诺夫一样是很厌恶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

盖得当时风华正茂、才智横溢，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在这以前，在法国也象在其他拉丁语系的国家里一样，各种空想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以及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十分流行。需要具备对自己信念的忘我的信心以及超人的毅力，才能抱定宗旨来传播对法国人来说完全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何况他们俩都是不久前曾经毁灭他们祖国的可恨的德国人。但是，盖得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止步：他表现了非凡的惊人的毅力。

普列汉诺夫作为新学说的捍卫者几乎都去参加盖得的最初几次演讲会。格·瓦·同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一起出席了这位不倦的宣传者举行的多次会议，对他的才智、学识和性格表示赞赏和钦佩。

盖得的这些品格对普列汉诺夫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位法国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的艰巨任务，加上其他种种情况，必然出乎意料地使普列汉诺夫的世界观发生巨大的转变，何况俄国现实的条件早就为这种转变打下了基础。

很难说究竟谁的任务更为困难：是盖得所要完成的任务，还是普列汉诺夫两年前所已面临的任务？

在法国，确切地说在巴黎，很早以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久经考验和锻炼的无产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经历了三次大革命和几次小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是盖得开始进行活动时的有利条件；但是，

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他的处境的困难在于：法国工人深受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混合物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的性格、习惯和对理论的态度，几乎不能指望在短期内立即排除这种混合物的影响，用彻底的科学的体系来代替它。盖得尽管在这方面遭受失败，但是他没有灰心：他继续以非凡的毅力在报刊和会议上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却要养活一大家人，然而他还是付出全部时间在工人中间进行活动。由于孩子们衣食无着，他同不理解他的志向、病魔缠身的妻子经常发生口角。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所遭受的苦难自然使这位非常仁慈的、富于同情心的、“非现世的”人感到郁郁不欢。因此不难想象，他在精神上常常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是，他面前展现的未来前景战胜了一切痛苦和悲愁。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进行活动的条件也并非不艰难，他抱着同样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我们的“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他面临着克服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旧习的艰巨任务。而且格·瓦·在宣传新观点的时候，不是直接面向当时为数甚少的俄国工人，而是面向我国的知识分子，后者的特点一般说来是相当的守旧、智力上的懒散和毫无根据的自信。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必须从遥远的国外，而不是直接地对听众施加影响。最后，他的个人的物质条件也不比盖得的条件更好。不过，一旦得到真正的讲坛，接触到工人，那么普列汉诺夫可以指望他所宣传的思想会在工人当中得到充分的响应，他无需象盖得在法国那样，同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和偏见作斗争。相反，以往年代的实践可以向他保证，我国的工人将乐于接受为他们指出通向消灭现存的不公正和取得彻底的和普遍的平等的唯一的正确道路。

后来的事实表明，格·瓦·的预料完全得到了证实：尽管在我国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五年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可以有

把握地说，在我国工人当中，具有相当觉悟水平和善于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人的百分比，要比在法国工人当中不是更小，而是更大。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以我长期同俄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个人接触为依据的。

总之，无论在面临的任务方面，还是在个人的素质方面，以及在物质条件方面，盖得和普列汉诺夫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两位非常相象的和杰出的人物终生都很亲近，这是毫不奇怪的。格·瓦·在逝世前不久曾以巨大的热情回忆过自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所遇见的盖得。我记得，格·瓦·以他所固有的习惯，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在叙述关于1889年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也不能不添上一些幽默成分。

按照当时的惯例，代表大会的召集人是当地的社会主义者——盖得、拉法格等人。他们理应为来自各国的代表们准备一切必要的东西。但是，法国人看来是些拙劣的组织者，普列汉诺夫举了不少典型的可笑事例。例如，在代表大会开幕时，代表们来到了开会的地点，但大门却紧闭着。大家困惑不解地久久站在大门口，那里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人，后来终于弄清，原来出租会场的主人要求预付一定数目的租金，而法国同志却没有这笔钱。结果，德国人帮了他们的忙，付了所需的钱款，代表大会才得以开幕，虽然拖延了很长时间。

在第一次会议后，在殷勤好客的法国人请全体代表吃早餐（或者午餐，我不确切记得了）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他们聚集在前厅里，久久地等着保尔·拉法格这位“主持人”，他给那些不知往何处去的客人们分配到似乎已经预订好早餐的餐厅里。结果发现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已经去过的那些咖啡馆里去就餐；后来弄清，拉法格根本忘记了关于这件事所许下的诺言。不过据格·瓦·说，最可笑的是，尽管法国人常常闹出这类意外的笑话，他们还

是问客人们说：“我们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我们勉强地忍住大笑”，格·瓦·接着说，“为了不使他们难堪，并回答说，‘好，很好，不能再好了！’而他们完全象孩子似的把我们的讽刺话当成了真话。”

无论对盖得来说，还是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这次代表大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盖得有可能确信，尽管有许多令人懊丧的事，尽管他的努力不甚成功和有许多缺点，但是他的宣传毕竟是成功的，以至第二国际得以在法国巴黎开幕。而格·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在沙皇的世袭领地，在这个欧洲人认为“野蛮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工人运动。记得，普列汉诺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有名的预言：“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能获胜。”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格·瓦·所说的他从同法国人的交往中所得出的印象，应当说这些印象是不好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他们是些不严肃的、经不起考验的、没有组织性的、崇尚空谈和喜欢装腔作势的人，等等。

与此同时，他在巴黎的时候，对德国人却有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德国人具有与法国人正好相反的品格，同时也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属于这个民族。

深深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格·瓦·在遇见侨胞们时一有机会就试图唤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880—1881年冬天，他抱着这个目的常在巴黎的俄国人集会上讲演，讲演博得广泛的欢迎，虽然据我记得并没有赢得任何一个新的信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读着记得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话。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略谈几句。

十二

上面我已提到洛里斯-梅利柯夫伯爵宣布的“心灵专政”以及我国自由派对他所寄予的希望。但是，时间一月又一月过去了，而宪法始终没有颁布。就这样，整整一年都是在期待立宪中度过的，在这期间，恐怖派没有进行对沙皇的任何谋杀。

但是，1881年3月1日格里涅维基掷的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外对俄国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仅报纸的评论员和记者，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对俄国革命者的顽强毅力表示惊讶，当时有名的说法是“沙皇是革命的俘虏”、“俄国革命已是西欧革命的先进队伍了”。^①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竟把3月1日事件的意义夸大到如此程度，那么可以想见，始终紧张地注视着（显然当时也还继续注视着）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的我国侨民对这一事件会惊叹到何等程度了。就是最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也相信甘油炸药的魔力：他们也觉得被刺死的沙皇的继承者将不得不恩赐一部宪法。

应当承认，我和我的朋友们——斯切法诺维奇和维拉·查苏利奇也认为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决定回到俄国，为此我们事先同留在那里的同志们通信。我们曾认为，当祖国开始出现“新纪元”时，留在国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后来很快弄清，我们完全错了，错了二十五年。

当时只有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一个人不是这样看待这一事件的：在他从巴黎给我们的来信中以及后来在见面时，他都一再

^① 见《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译者注）。

证明，谋杀沙皇不会或者很少会对俄国的政治条件发生作用，他说因为我国没有一个阶级能够限制专制制度的权力。因此他建议我们不要急于回国，要耐心等待，目前继续尽可能地从国外来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我和斯切法诺维奇不同意看来比我们更富于远见的格·瓦·的这些意见，还要准备回到俄国去。不过，鉴于物质条件和出于保密的考虑，我们决定分开走，也就是说斯切法诺维奇先走，等他在那里落脚并给我寄钱来之后，我再到那里去。斯切法诺维奇先到了巴黎，以便会见在那里的格·瓦·和拉甫罗夫，并同他们商谈。他回到日内瓦后神色非常忧郁，发现“若尔日”变了，这使他很不高兴，说他“过分迷恋于科学，只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打交道，很少对生活发生兴趣”。我的这位讲究实际的朋友离开真理多么遥远啊！只是到后来，在加里雅的苦役监狱里时，他才认清，似乎脱离生活的若尔日原来是多么正确！

斯切法诺维奇后来于1881年夏回到了俄国，他在那里和几个以前的“土地平分”社成员一起跟民意党人进行了参加该党的谈判。此后，他开始给我们寄来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建议。他还曾考虑在国外创办一家大型杂志，不采取严格的民意党的方针，由拉甫罗夫、普列汉诺夫和克拉夫钦斯基任编辑。该杂志在两年后以“民意”导报的名义问世。

根据他的倡议，在国外创办了“民意党”红十字，按照他的指示，维拉·查苏利奇、拉甫罗夫和柴可夫斯基等被任命为该刊的代表。

顺便说一句，斯切法诺维奇的建议给我们人员不多的国外的小组带来了不少生气，同时他也大大地促使我们同“民意党”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只有格·瓦·不是立即与之“和解”。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在题为“我们为什么和怎样同‘民意导报’分道扬镳”的回

忆录中有所叙述，我在《普列汉诺夫给拉甫罗夫的信》的注释中也谈到了一些。因此，我在这里只稍作补充。

* * *

格·瓦·和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及其新生的女儿移居到巴黎后大约过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瑞士。我同他的最初一次见面并不是特别友好的，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这是由于我们过分倾向于“民意党”以及我们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忍让。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关于这一点他在我上面所引的1881年10月31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的日内瓦的同志们的情绪不特别使我感到高兴。这种情绪可用以下的话来表述：‘无论如何要联合起来，尽可能地进行讨价还价’。就是对于那些不久前还根本反对政治斗争的人们，历史定会抓住他们的衣领，把他们推上这一斗争的道路。”

在我们分别一年后的最初见面时发生的一场相当激烈的谈话不仅给我们两人，而且也给在场的维拉·查苏利奇和德博哥里-莫克里也维奇留下了极为痛心的印象。尤其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之间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只是由于长期的分别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彼此对待某些具体做法的态度有所不同而已。不过，过了一两天以后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友好的关系，而格·瓦·又同我们一起进行活动了，这一点从他给拉甫罗夫的那封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一切分歧都消除了，一切误解都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当格·瓦·看到代表我们小组对民意党执委会就我们参加该党给我们的信作出答复时，我记得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脸上带着笑容地大声喊道：

“现在我看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个人的好感和情谊，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是我们共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

说。”(续完)

译自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1922年
“新莫斯科”俄文版第30—77页。

(宋洪训译)

《社会史文库》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晓 军

由西德艾伯特基金会赞助的一个科学委员会编辑，新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社会史丛刊《社会史文库》，从1961年起开始出版，到1982年已出版了二十一本共二十二卷（其中第六、七卷为合卷），一本第一至二十卷总目录和十本专题附册。文库的主编乔治·埃克特是西德不伦瑞克教育学院教授，1959年斯特拉斯堡欧洲奖金获得者，发表过许多有关教育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作。艾伯特基金会执委会主席格·魏塞尔在出版前言中指出：《社会史文库》的大纲在许多方面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贝尔格1910年至1930年出版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是相一致的，这是继格律恩贝尔格所编的文库之后的又一研究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和工人运动历史的重要文库。它包括了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德国，但也包括英、美、法、意等国）学者有关欧洲，主要是德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和工人运动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

这一文库设有论文、文件、书评等专栏。

从第一至二十二卷论文专栏里已发表的文章的情况来看，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直至当代的工人运动都在这里有所反

映。在这里,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著作和思想的研究文章;有关于拉萨尔、威·魏特林、威·沃尔弗、约·菲·贝克尔、威·李卜克内西、雅科比、莫·赫斯、卡·李卜克内西等人的研究文章,其中关于拉萨尔的研究文章尤其多;有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前身正义者同盟、一八四八年革命和第一国际的研究文章;有关于魏玛共和国、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的研究文章;同时有许多文章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有一些文章论述英、美、法、意等国的工人运动。此外还有关于哲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文章。

在《社会史文库》的文件专栏里专门发表新的历史文件和资料以及对这些文件和资料的研究文章。例如,在这里发表有关于1863—1864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宣传的文件资料,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恩格斯对《圣经》的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历史文件和资料;关于威·魏特林、威·沃尔弗、共产主义者同盟维利希—沙佩尔派、第一国际与奥地利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解散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反映、卡·李卜克内西与俄国革命、弗·艾伯特和国际的历史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以及关于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克·蔡特金等人的历史资料或他们本人的未发表过的信件等。

《社会史文库》的书评专栏内容十分丰富,当代有关社会和工人运动历史的大量重要著作在这一专栏里都有评介。这里不仅有对某一著作的评介,而且有对一系列同一专题的著作的研究报告和综合评述,使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欧洲关于社会和工运历史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一般动向。这一书评专栏下面又分若干分栏,如一般社会史著作评介、德国工人运动史著作评介、国际工人运动史著作评介、马克思和当代政治经济学著作评介、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著作评介、丹麦工运史著作评介、奥地利工运史著作评介、英文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和工运史著作评介、关于纳粹的著作、战后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著作、革命和工人文学著作的评介等。

这套文库还出版了十本专题附册。一部分是书目专册，如第二册《德国工人运动史书目(1914—1945)》；第五册《德国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书目(从开始至1863年)》；第八册《德国工会和工运历史书目(1945—1975)》和第九册《拉萨尔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著作(1840—1975)》。此外是其他专册，如第三册《党的鼓动和选区竞选工作》，首先介绍了弗·艾伯特，随后刊登了社会党1910—1914年关于职责的宣传和1914—1918年关于民族问题党内争论的各种文件。第四册《迎合还是反抗?》刊登了1932—1933年，即希特勒上台前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文件。第六册《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德国工会联合会在西区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7—1957)》和第七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社会党国际(叙述和文件)》等等。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 资料汇编》(三卷本)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BAND I. II. III.)

闻 坚

这是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共同编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集。两个马列主义研究院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学家赫尔韦格·费尔德尔、马丁·洪特、叶菲姆·康捷尔和索菲亚·列维奥娃负责编辑。文件集分三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用德文出版。第一卷早在1970年已经出版。第二卷由于费尔德尔1974年病逝（列维奥娃也于1981年病逝）和其他主要编辑成员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编辑工作而耽搁，到1982年方才出版。第三卷据说将在第二卷出版后不久即可出版，但我们尚未见到。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集，我国研究工作者比较熟悉的有格·温克利列编《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1957年柏林德文版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前身。文件汇编》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但前者只收入九个文件。后者的篇幅虽然增加了许多，收入了近一百八十多个文件，但内容仍不够丰富和完备，而且没有收入同盟创建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因为创建大会文件在1968年才在西德发现，并发表在贝·安德烈

亚编《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文献汇编》1972年巴黎法文和德文版。而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文件集，仅第一和第二卷就已收入六百二十五个文件，附录里收入的文件还未计算在内。此外，它有大量翔实的注释（第一和第二卷共有六百零五条注释，占篇幅四百三十二页），其中许多注释本身也是文件，许多注释则实际上是依据有份量的文献资料写出的研究短文。因此，它是目前内容最丰富和最完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和资料集。它的出版使工运和共运史研究工作者获得了深入研究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坚实的史料基础，因而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欢迎，苏联、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发表过书评。

编辑者在第一卷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十多页的导言，介绍了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并提出了编辑者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研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全书分三卷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均有一篇编者按，对该部分所收的文件作扼要的介绍和说明。

第一卷（一千一百七十二页）包括1836年到1849年8月这一时期。它总共收入三百八十四号文件。由于正义者同盟被看作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关于正义者同盟的文件因而占了一半。全卷由本书的第一至第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正义者同盟的产生及其在1836—1844年的发展。这里收入了关于正义者同盟产生过程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争论和纲领制定的过程的文件、正义者同盟在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活动，特别是魏特林1840—1844年在瑞士的宣传活动的文件。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开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的进一步发展（1844—1846年底）。这里收入了许多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对正义者同盟，特别是对其伦敦领导人莫尔和沙佩尔的影响和正义者同盟的国际联系的文件。第

三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它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制定（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在这里占居中心地位。第四部分：革命时期的同盟及其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作用（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最后在附录里还收入了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流亡者联盟的五个文件。

第二卷（七百八十五页）包括1849年8月到1851年5月这一时期。它总共收入二百四十一个文件，由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组成。第五部分：同盟的改组和革命经验的总结（1849年8月—1850年9月中旬）。第六部分：同盟的分裂至科伦中央委员会活动的结束（1850年9月底——1851年5月）。在第二卷的附录里有科伦共产党人案的被捕盟员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豪普特的供词。

第三卷将由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组成。它涉及同盟反对日益加强的迫害的斗争和科伦共产党人案的时期（1851年5月——1852年11月），以及一些盟员后来的活动和同盟后来在十九世纪革命的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此外，第三卷还将有总的索引等。

这部文件集如果有什么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一些文件经过删节。有些删节可能是必要的，有些删节则可能使研究者由于看不清原件的全貌而有不满足之感。但是，无论如何，这部文件集的出版有助于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深入研究。

西德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

袁 廷 明

鲁尔大学位于西德工业中心鲁尔区，该校对工人运动史的教学和研究很重视。自1967年到1972年，历史系图书馆先后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奥地利维克多·阿德勒图书馆等和私人手中购得图书资料和复印本三万五千册。在这个基础上，1972年10月成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图书馆，主要为教学服务；1980年正式成立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担负一定的研究任务，但图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仍然是研究所的主要工作。目前研究所藏书九万册，其中德语国家（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部分，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马恩著作研究以外，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已出版的著作和通信集，从拉萨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到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福尔马尔、伯恩施坦）；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到战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著作。关于党史，则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纲领，党的机关报和部分地方报，党组织各个时期，包括1904年以前，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战后时期印发的文字材料（如宣传小册子，传单等）。关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运动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包括会议记录和报导，报纸杂志，同时代人的著作通讯集。法国和其它拉丁语系国家

部分,有早期社会主义、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资料;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潮,保守党等方面的著作和资料。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俄文资料。当然还有当代史学工作者们的浩繁的研究著作。

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图书馆是大学图书馆性质,因此不收藏尚未整理出版的手稿。这些手稿大都保存在波恩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七十年代以来,西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从传统的对工人政党、工会组织和工人领袖的研究转向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以普通工人群众为对象的地方工人运动史的研究。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开展三个专题的研究:地方工人运动史,战后工人状况,比较工人运动史。它收集和整理了许多地方的,尤其是鲁尔区工人运动的新鲜材料,如鲁尔矿工运动,鲁尔大罢工,工人文化等,目前正着手编纂鲁尔区工人运动书目。

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共收藏近八千种各种语言的报纸杂志,其中德文占百分之四十。有全套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月刊》、《钟声》,但相当部分报刊残缺不全。不过,多特蒙特报刊研究所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鲁尔大学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所有三百种现在出版的有关工人运动和工人的报纸杂志,大到全国性的,小到地方,甚至工厂的杂志都有,其中重要的、有影响的如:西德史学会主办的季刊《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Herausgeber, Historische Mission Abkürzung, IWK.),西德工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工会月刊》(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 Herausgeber, Bundesvorstand

des DGB.)和民主德国马列研究院主办的《工人运动史论丛》(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Herausgeber: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entralkomitee der SED DDR, Abk. BZG.)等。这些杂志对于了解东西德工人运动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新问题,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

关于两个译名的商榷

商 鼎

在《列宁全集》中文版和我国关于国际共运史的文章、译著、教科书中常常见到两个组织的名称。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劳动派”^①，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以胡果·哈阿兹为首的中派议员在1916年3月退出党团后成立的组织，德文名称为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另一个是“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②，这是第二国际破产后中派各党（奥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即通常所说的“第二半国际”。它的名称原文也是德文，为Internationale Arbeitsgemeinschaft Sozialistischer Parteien。我认为，这两个译名都不准确。

这两个组织原文名称（德文）中的主要名词都是Arbeitsge-

① 这个译名曾见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0页、181页和卷末注31。又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78、903页和卷末注368。此外，《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版把这个词译为“社会民主党合作派”。

② 这个译名见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苏联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1926年俄文版）1964年三联书店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第277页。196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中文版也用了这个译名（见该书第1页注①、第22页等处）。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的《鲍威尔言论》（1979年三联书店版）的前言（第18页）和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国际的复活》（苏联莫吉列夫斯基著，1963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的中译本（第185页等处）也都沿用了这个名称。

meinschaft,其词义应为“从事某一特定任务的集体、小组”^①。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德汉词典》把它译成“工作集体,专业小组”。可见这个词的含义不涉及“工人”和抽象的“劳动”概念。

列宁把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译成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 或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ел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②,这里的 трудовая 一词也可以解释为“工作的”,与 деловое 的意思大致相同,但不如后者贴切。前者似应译为“工作小组”,后者应译为“协作组”。就是说,列宁把这个组织的名称译成“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或“社会民主党协作组”。这个组织也确实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十几个中派议员为了协调他们在国会的活动而临时成立的一个小组。因此,把它译成“劳动派”或“合作派”都不符合原文的意义,而且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它的宗旨涉及某种与“劳动”或“合作”有关的问题。

第二个名称,即 Internationale Arbeitsgemeinschaft sozialistischer Parteien 的俄译名,我在《列宁全集》中迄今尚未找到。列宁在提到中派的这个国际组织时通常使用“第二半国际”。布拉斯拉夫斯基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资料汇编》我手头没有俄文本,但是《第二国际的复活》俄文本在第一百四十四页第一次提到这一组织时用的俄文译名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боче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中译本译为“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并在此加一脚注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些俄文文献

① 参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六卷本《现代德语词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六卷本《杜登德语大词典》。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3卷第72、171页和第39卷第565页。在第23卷中,列宁用的俄文译名为 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俄文版该卷编者在注31中解释这个名词时在括号中把 Arbeitsgemeinschaft 译为 трудовое содружество,中文版相应地译为“劳动友谊社”,这就距原意更远了。

曾把这一组织称为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中译本译为“社会党国际协作会”,见一百八十五页注②)。我认为,这里的 рабочее 一词也应解释为“工作的”,而不是“工人的”。在我看到的英文书中一般将这一组织称为 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照字面译,应为“社会党国际工作协会”或“社会党国际工作联合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的英文本(1922年伦敦版)在书名中把它简称为 Vienna Union,即“维也纳联合会。”我见到的法文译名为 L' Union des Partis socialistes pour l'action internationale,照字面译,应为“社会党国际行动联合会”^①。这些英文和法文译名同上面二十年代苏联文献中的译名是一致的,其中 Arbeitsgemeinschaft 一词的译法也与列宁的译法(дел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协作组)一样。

最后,我查了一下1980年莫斯科出版的两卷本《德俄大辞典》的 Arbeitsgemeinschaft 条,受到一些启发。该词条共有三条释文。第一:小组;第二:(由各个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各个不同组织的)联合会;第三:(行动上的)合作,共同的工作。这里的第三条说的是抽象意义,《杜登德语大词典》有这一释文,与我们这里谈的含义无关,但第一、二两条的解释却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建议将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译为“社会民主党小组”或“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将 Internationale Arbeitsgemeinschaft Sozialistischer Par-

① 参看法国历史学家伊·布尔德编辑的《鲍威尔和俄国革命。四封未发表的鲍威尔致考茨基的信》的一个注(《国际社会史评论》1970年第3期第477页)。

teien 译为“社会党国际协作委员会”^①或“社会党国际联合会”。是否恰当，希望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提出宝贵意见。

① 《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下册的鲍威尔传已使用这一译名。最近初步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条目表》则把这一条目定为“社会党国际协作会”。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1—9辑总目录

(括号中的数字指第几辑,“布”指《布哈林专辑》,

“卢”指《卢森堡专辑》)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维利希-沙佩尔

集团的斗争……………胡文建(2)

空想与科学的一次冲突

——魏特林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胡文建(1)

马克思严格区分敌友的范例……………张文焕(1)

第一国际初期马克思同马志尼派的

斗争……………洪肇龙(7)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流亡者的

援助……………吴惕安(3)

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张文焕(7.8)

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研究……………胡文建(7)

布朗基与第一国际……………承中(9)

施蒂纳无政府主义思想评述……………张文焕(4)

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

——《新莱茵报》……………方安(3)

关于巴黎公社多数派和少数派的

评价问题……………曹特金(3)

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

传播者保尔·拉法格 沈炼之 (5)
楼均信

保尔·拉法格在巴黎公社时期的

活动 李兴耕 (3)

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义纲领——哈佛尔纲领 李兴耕 (9)

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许力夫 (6)

围绕米勒兰事件的一场斗争 李兴耕 (2)

德雷福斯案件和法国社会主义

运动 李兴耕 (1)

一次大学生和文学家的骚乱

——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 殷叙彝 (1)

俄国民粹派的英雄史观 宋洪训 (1)

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空想 王家华 (3)
纪涛

“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周邦 (9)

饶勒斯与中国 马胜利 (6)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殷叙彝 (3)

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 殷叙彝 (2)

英国工党的建立和它的组织机构 王小曼 (6)

工联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陈慧生 (9)

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 殷叙彝 (6)

卢森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对罗莎·卢森堡的重新评价 程人乾 (4)

论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 李宗禹 (8)

朝气蓬勃的“新兵”

——罗莎·卢森堡 1898—1899 年

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周懋庸(3)

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关于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评论……………李兴耕(4)

关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争论资料……………周亮勋(4)

张启荣

卢森堡与中国……………周懋庸(8)

关于卢森堡的两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李宗禹(卢)

卢森堡的《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和出版

及其影响……………周懋庸(卢)

介绍保尔·弗勃利希的《罗莎·卢森堡》。

思想和事业》……………辛 夷(卢)

超帝国主义论·历史·辩证法……………张启荣(8)

近三十年来西德和民主德国的考茨基研究……………李兴耕(8)

关于斯巴达克派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问题……………李宗禹(7)

卡·李卜克内西在 1917—1919 年……………周懋庸(2)

敌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郑异凡(3)

列宁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宋洪训(3)

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一场争论……………宋洪训(7)

1918 年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

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夏道源(布)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国内政策和列宁对

它的批判……………杨彦君(2)

1918—1922 年国际共运中的“左”

倾思潮和列宁对它的批判……………李宗禹(1)

论共产国际的创立·····	陈再凡(8)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 和教训·····	杨彦君(4)
新经济政策和联共(布)党内的左倾反对派·····	杨彦君(5)
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宋洪训(布)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	蔡恺民(布)
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郑异凡(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关于 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争论·····	蔡恺民(2)
苏联建国初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争·····	郑异凡(1)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 起义的“十月事件”概况·····	郑异凡(8)
葛兰西与共产国际·····	毛韵泽(5)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杨云若(6)
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制定与 共产国际的帮助·····	黄修荣(9)
关于苏南冲突·····	姜琦(5)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兴衰·····	张友伦(7)

人物传记

巴枯宁传略·····	顾家庆(2)
威廉·李卜克内西·····	梁建华(3)
弗米茨·梅林·····	周容(3)
卡尔·赫希柏格·····	殷叙彝(7)
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	袁延明(1)
克鲁泡特金·····	陈之骅(4)
安东·潘涅库克·····	李宗禹(5)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张海滨(6)
片山潜·····	刘 焱(6)
厄尔·白劳德·····	刘庸安(9)

读书读史札记

马克思和海德门断绝关系的原因·····	薛 希(9)
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有没有认错?·····	陈启能(4)
卢森堡提出过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吗?·····	辛 夷(4)

史料考证

关于伯恩斯坦的若干历史资料·····	于沪生(6)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逮捕和杀害 列宁的问题·····	杨彦君(布)

名词和典故

“按劳分配”渊源初探·····	顾家庆(1)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由来·····	丁世俊(2)
“修正主义”一词的由来·····	于沪生(1)
“列宁主义”一词探源·····	郑异凡(4)

代表大会介绍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69—1914 年

历次代表大会介绍·····	于沪生(7.8)
---------------	----------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图尔代表大会·····	彭 光(9)
---------------	--------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

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海滨(8)
--------------	--------

党派和报刊介绍

“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威斯特伐利亚

汽船》杂志……………葛 斯(8)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各社会主义党派

介绍……………王以平(2)

陈双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

报刊介绍……………于沪生(2)

卢森堡和梅林编辑的《国际》杂志……………陆世澄(8)

组织机构介绍

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夏道源(5)

国外研究机构介绍

访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杨威理(1)

意大利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概况……………毛韵泽(6)

法国社会史研究所图书馆访问记……………承 中(9)

西德艾伯特基金会……………刘敬钦(8)

国外研究动态

饶勒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马胜利(6)

日本的卢森堡研究概况……………周懋庸(9)

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法〕菲·罗勃里厄(4)

英共筹备建立工运档案馆……………黎 明(5)

回 忆 录

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张 报(7)

大 事 记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大事记

(1876—1905年)……………陈双苑(1.2)

王以平

英国工党大事记(1900—1918年)……………王小曼(9)

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

大事记……………〔苏〕A. И. 娜尔齐索娃编(5.6)

传记资料

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俄〕列·格·捷依奇(4)

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

主义者(摘录)……………〔俄〕列·格·捷依奇(9)

罗莎·卢森堡传略(摘录)

……………〔苏〕罗·雅·叶夫泽罗夫 (卢)
英·谢·亚日鲍罗夫斯卡娅

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

政治传记(摘录)……………〔荷〕弗·梯歇尔曼(5)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布哈林自传……………(布)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布哈林”条……………(布)

1930—1975年苏联几种《百科全书》

有关布哈林词条选译……………(布)

文献和资料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1871年2月9日) (9)

保·拉法格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8年11月27日) (9)

保·拉法格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9年2月14日) (9)

1845年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讨论 (3)

论货币的本质 [德]莫·赫斯(7)

共产主义信条问答 [德]莫·赫斯(7)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德]海·泽米希(7)

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 [德]鲁·马特伊(7)

巴黎公社印象记 [法]保·拉法格(3)

公社和它的法令 [法]阿·阿尔努(3)

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 [法]保·拉法格(5)

革命的次日 [法]保·拉法格(5)

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 [俄]米·亚·巴枯宁(2)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

补充(一) [俄]米·亚·巴枯宁(2)

俾斯麦和拉萨尔 (2)

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节译) [俄]彼·克鲁泡特金(2)

1875—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组织章程 (3)

费边社纲领(1887年通过) (3)

费边社纲领(1919年修订) (3)

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 (6)

费边主义·····	[英]乔·肖伯纳(3)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	[德]格·福尔马尔(1)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	[德]格·福尔马尔(1)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上批判福尔马尔的发言(摘要)·····	(1)
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	
年代(摘录)·····	[德]爱·伯恩施坦(6)
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	[德]卡·考茨基(3)
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	[德]卡·考茨基(3)
不顾一切!·····	[德]卡·李卜克内西(2)
考茨基关于列宁的一封信·····	(9)
共产国际的五年·····	[苏]A·季维尔编(5.6)
桑巴、加香、勃鲁姆、弗罗萨尔和龙格	
在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的	
发言(摘录)·····	(9)
洛里欧和苏瓦林致法国社会党图尔	
代表大会的信(摘录)·····	(9)
从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到图尔	
代表大会(摘录)·····	[法]沙·安·于连(9)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波]罗·卢森堡(卢)
论俄国革命·····	[波]罗·卢森堡(卢)
再论群众和领袖·····	[波]罗·卢森堡(卢)
俄国的悲剧·····	[波]罗·卢森堡(卢)
国民会议·····	[波]罗·卢森堡(卢)
斯巴达克同盟想要	
什么?(摘录)·····	[波]罗·卢森堡(卢)

一篇新发现的卢森堡手稿·····	(9)
布哈林论国家的两篇文章的有关文献·····	(7)
有关“十月事件”的几个历史文件·····	(8)
“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	(1)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规律(节译)·····〔俄〕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2)
关于过渡时期规律性	
的问题(节译)·····〔俄〕尼·伊·布哈林	(2)
在革命的名义下	
(选译)·····〔俄〕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	(9)
十三人声明	
(1926年7月)·····〔苏〕	
列·托洛茨基	
格·季诺维也夫等	(9)
八十四人声明	
(1927年5月)·····〔苏〕	
列·托洛茨基	
格·季诺维也夫等	(9)
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摘录)	
(1928年7月11日)·····	(布)
对布哈林的审讯	
(1938年3月5日和7日)·····	(布)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1938年3月12日)·····	(布)
葛兰西论工厂委员会·····	(8)
车间代表纲领·····〔意〕安·葛兰西	(8)
关于《新秩序》报纲领的	
论战(摘录)·····〔意〕安·塔斯卡	(8)
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	

- 的一篇报道 (3)
- 孙中山的顾问 [苏]Φ·C·鲍罗廷娜(6)

外论选译

保尔·拉法格和他对资产阶级

社会的批判 [法]克洛德·维拉尔(5)

法国杂志发表关于巴枯宁

的新材料 [苏]娜·米·皮鲁莫娃(5)

第二帝国末年的工人活动家

欧仁·瓦尔兰(摘录) [法]让·布吕阿(5)

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摘录) [西德]玛蒂亚斯(8)

让·饶勒斯与马克思主义 [法]马·雷贝里乌(4)

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

态度(摘录) [德]克·蔡特金(卢)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一些未发

表的手稿》前言(摘录) [德]费·魏尔(卢)

《俄国革命》导言

(摘录) [西德]奥·弗莱希特海姆(卢)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

的作用(摘录) [东德]安·拉席察(卢)
君·拉聪

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

(摘录) [意]莱·巴索(卢·4)

俄国的革命(摘录) [英]彼·奈特尔(4)

集中制与分散制的

辩证法——罗莎·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

的思想 [日]伊藤成彦(4)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三卷

前言(摘录)……………〔西德〕约·施莱夫斯泰因(卢)

《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

1973年版后记……………〔西德〕伊·费恰尔(卢)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摘录)……………〔南〕普·弗兰尼茨基(布)

尼古拉也夫斯基谈布哈林……………(布)

让历史来裁判(摘录)……………〔苏〕罗·麦德维杰夫(布)

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的神话……………〔美〕西·海特曼(7)

书刊简介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辛 庚(1)

《共产国际人名辞典》……………夏道源(1)

《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辞典》……………毓 才(1)

《国际工人运动人名辞典》(第一分册)……………费新录(1)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葛 斯(7)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刘敬钦(6)

《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方 达(2)

《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鲁 魂(2)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梁建华(2)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

问题的争论》……………唐春华(2)

《巴黎公社1871—1971》……………肖 牧(3)

六十至七十年代西德出版的伯恩施坦

著作和有关伯恩施坦的著作……………商 鼎(3)

《奥托·鲍威尔著作集》……………辛 庚(3)

卡尔·考茨基的回忆录

——《回忆与探讨》……………启 迪(5)

《罗莎·卢森堡致利奥·约吉希斯书信集》·····	辛 夷(3)
《普列汉诺夫传》·····	谷 松(4)
《布哈林文选》(社会主义建设部分)·····	宋洪训(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	蔡恺民(7)
《共产主义 ABC》·····	伊 哲(4)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周尚文(4)
《苏联的左倾反对派》·····	杨彦君(1)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	方光明(5)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24—1927 年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叙 一(5)
一本关于马林的传记·····	商 鼎(5)
一本回忆斯兰斯基的书·····	范达人(9)

其 他

罗莎·卢森堡年表·····	龙 琰(卢)
罗莎·卢森堡著作目录·····	(卢)
研究卢森堡的参考书目·····	(卢)